

热风学术

月刊

秋 第14期

2019年9月

回复 643 赞 122 转发 158 收藏 190

无糖糖 收藏到豆列 总言

禁糖糖 收藏到豆列 生活啊 是一团麻

收藏

#全国猪价地图出炉#，附#全国猪价地图#近日，猪肉价格上涨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1500元/头的利润或许也能让养猪成为最眼热的职业，雷军收购小米被嘲不如去养猪，卖一辆车利润不如卖两头猪……“猪”似乎有成为“新货币单位”的趋势。

收藏

欢迎来到热风社区，请注册

请仔细阅读 [热风使用协议](#)、[隐私政策](#)

人脸识别

昵称

填写雾霾指数

获取伙伴认证：☒ 是 ☐ 否

经认证后伙伴可获得帐号继承权，最终解释权归热风社区所有

注册热风帐号

已有热风帐号 | 第三方登录：[当代文化研究](#)

如何看待称「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高校老师因「师德失范」遭停课两年？

中熊

既然老师可以利用权力随意打压学生的意见，对于争议问题不加解释，对于论文“生吞活剥”，为什么学生就不能利用舆论“斗倒学阀”呢？闹学闹闹……

100% 赞同 10 感谢 10 评论 0 回复

知乎匿名用户

随着学生接受自己错误观点的学阀老师以退事不决和帽子的手段使学生，去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0 赞同 0 感谢 0 评论 0 回复

你爱吃猪肉吗？

爱吃	1万人
不吃	3056人
吃素的，猪肉涨无所谓了！	4102人
偶尔吃	7979人

9-4 18:42 来自 EXO超话

#金钟大0921生日快乐#

【EXO吧钟大生日应援公告】

2019年，为了庆祝EXO成员CHEN 金钟大的生日，自9月9日起，EXO吧在首尔地铁惠化站B13投放了为期一个月的广告牌应援。

祝钟大生日快乐🎉~

评论

喜欢

匿名用户

知乎文编成啥样了，什么事？有看吗？早些年被各种导师逼死的学生该怎么？这下，终于有老师提前被处理了，只是可惜，当初被欺负学生……

100% 赞同 10 感谢 10 评论 0 回复

《防弹少年团0613出道六周年快乐#》防弹少年团出道六周年快乐！原来是你放的玫瑰 太浪漫了吧

❤️

@太婆到臣臣：防弹少年团0613出道六周年快乐超话

打卡北京新街口！

谢谢姐姐站的应援@BTS姐姐应援站给胖蛋带了玫瑰（虽然有点蔫了呜呜呜）六周年大发！北京·新街口[地铁站]

取消关注

匿名用户

还有谁记得2006年时的杨坤事件吗？当时，华东政法大学的教授杨坤在自己的博客上发文，说有俩个女生到公安局和教委把他告了，告他是“废事……

0 赞同 0 感谢 0 评论 0 回复

海糖大糖子 收藏到豆列 食品安全？hello? ??

Vivian 收藏到豆列 人类不行

赞

643

122

158



目录



点击文章标题
自动跳转至内容

- 4 **编辑手记**
- 7 **内容提要**
- 15 **专题 _ 数码公民在亚洲**
- 16 **编者按**
- 20 **亚洲青年的数字公民权：从数字行动到数字素养**
Audrey Yue, Elmie Nekmat, Annisa Beta, Yingchen Kwok
(许多 译 | 张淳 校)
- 33 **行动主义与数码公民权的二重性**
Natalie Pang (许多 译 | 张淳 校)
- 47 **青年是否正在虚度青春：作为菲律宾千禧一代新兴政治的数字公民**
Cleve V. Arguelles
(郝玉满 译 | 张淳 校)
- 63 **香港青年的网络“聊骚”与“民间男性气质”**
陈锦荣 (梁成林 译 | 罗小茗 校)
- 77 **墨尔本的中国留学生与社交媒体的移动场景**
马嘉兰 (郝玉满 译 | 张淳 校)
- 89 **特稿 _ 体制内的功夫：实现目标的艺术**
墨美姬 (张淳 译)

殊音 _

- 115 **朝解放之歌迈进的听觉笔记：听新工人乐团和《从头越》**
刘雅芳

来稿 _

- 129 **官僚风起之后：高校学生会为何需要政治实践**
梁成林

现场 _

- 146 **墨守成规的生活会更容易吗？雷纳 · 温特教授谈文化研究**
雷纳 · 温特 （张少璞 张淳 整理）

n 地域 _

- 161 **我在多伦多送外卖**
徐道衡
- 174 **一粒原子的实践进行时**
树彧

- 184 **书讯书评 _ 《思想的分断：陈映真与朴玄燊》**

- 186 **推荐序：回望一个相信新世界的年代**
陈信行

- 191 **光州“五 · 一八”与“民众论”的悖论**
延光锡

- 209 “n 地域”投稿指南

- 210 《热风学术（网刊）》稿约

- 211 封面故事 & 网刊信息、下载方式

编辑 手记

八月的最后一天，艳阳高照。在黄浦江畔，等候进入上海 ABC 艺术书展的队伍，正越排越长。清一色的年轻面孔，安静而雀跃地等待着，仿佛是去参加派对。楼上那个地方不大的书展则拥挤异常，考验着人们凑热闹的体能和耐性。我大惊小怪地拍照记录，转告在北京搞艺术的朋友：“现在居然有这么多年轻人热爱艺术呀！”她的回复却淡定异常：北京的队伍更长，但他们追捧的不是艺术吧。

想来也是。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自如地穿梭于艺术中心、美术馆和剧场打发时间，当他们活跃在各类讨论现场，问出最基础的问题，当他们自称也被标记为“文艺青年”展开自己的流动生活的时候，大概很少有业内人士打心眼里认为，他们是合格的。可究竟为什么不够合格？到底哪里不太对劲？在城市经济高度发达和文化被迅速产业化之后，艺术和文学成为有待消费和自我标榜的商品，自然是一大原因。但这样的解释，真的可以打发掉这支“等候入场”、越排越长的队伍吗？

毕竟，他们正在等候进入的，不光是书展、商场或剧院，更是那一个嘈杂摇晃、令人不安的社会舞台。如何面对这样一支遵守秩序、期待前方入口内的一切可以消解生活烦闷的候场队伍，大概是这个时代里绕不开的问题。

本期专辑“数码公民在亚洲”，围绕“数字素养”这一概念，讨论了同样在亚洲各地等候入场的青年们，在网络和现实世界中的

表现、行动与可能性。正如《亚洲青年的数字公民权：从数字行动到数字素养》一文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亚洲青年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参与世界的力量，他们的视野和能力影响着未来的走向；但另一方面，这一股力量又是新自由主义的压制、高速增长的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富不均和对丧失文化身份的恐惧的综合产物。在此，感谢特别编辑马嘉兰（Fran Martin）和作者们的慷慨供稿。这组文章，让我们了解到，在亚洲其他地方——比如，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青年人的入场态势，潜在的转机与可能的危险。这一亚洲社会之间的横向参照，将构成理解当代中国这只等待队伍时的重要坐标。

和他们比较起来，中国青年的处境既极为类似，又差异极大。这自然是因为中国的网络环境与众不同。从2003年公开讨论“孙志刚事件”，推动废除收容遣送条例，到2019年的周杰伦蔡徐坤的打榜之争，这一轨迹是对网络环境不断退化/恶化的最为简洁的说明。而这样的变化与越发拥挤的等候人群，让人不由想起齐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中的讨论：正因为在其他方面无从发挥，时尚（就今天而言，也包括了各色文艺，甚至于令人炫目的理论），成为人们投注所有热情和精力的所在。在某种程度上说，正因为缺乏提高公民素养的机会和空间，人们才正日益聚集到“文艺”的大旗之下吧。

于是，当社会舆论越来越和谐，而美术馆前的等候队伍也越排越长的時候，更为准确的当代文化艺术的定位及其有待开掘的巨大能量，也就成为急需定睛思考的议题。这也是本期“殊音”关心的重心所在，即在一个因各种力量与形势的变化，不得不越来越聚焦于“文艺”的时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创作、怎样倾听，并由此展开自检、给予评价，乃至积蓄力量？藉由“新工人乐团”推出的最新专辑《从头越》，我们希望把这样一个现实任务带回到文化思考

的领域。它要求我们抛弃一切顺其自然的“随便”（听觉的、行动的、理论的、立场的……），以更加绷紧的神经，以越发深耕细作的劲头，面对这个时代里文化创造和累积的任务。

同时，需要预告的是，围绕《从头越》的讨论，将在冬季刊中继续。欢迎大家点击专辑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iVIJDgUlxAJn20YQXjZvg>），共同参与这一场倾听和思考，就该专辑的阅听感受及文化创造的话题向我们积极投稿。投稿方式详见《热风学术（网刊）稿约》

本期内容中，值得介绍的文章还有不少，在此不一一赘述。希望这一期《热风》，成为正在漫长等待中的人们的手捧读物，为这一支队伍，带来一些不同的神情，不同的期待，不同的方向。

《热风学术（网刊）》

2019年9月12日

亚洲的年轻人已经占到了全世界年轻人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且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上网，已经成为亚洲重要的一支公民力量，可是目前对年轻人数字公民权的讨论绝大多数都关注西方国家。亚洲的数码技术覆盖率已位于全球领先水平，智慧城市创新也在蓬勃发展，因此更需要从公民权的角度来研究年轻人是怎么使用技术的。此外，亚洲在 20 世纪经历了反殖民的独立运动，21 世纪又在新自由主义的压制下努力保持经济高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越演越烈的贫富不均和对丧失文化身份的恐惧，亚洲的年轻人身逢其时，亲历着这一场历史巨变。

—— Audrey Yue, Elmie Nekmat, Annisa Beta, Yingchen Kwok
《亚洲青年的数字公民权：从数字行动到数字素养》

专题

研究者有必要反思一下“好公民”的前提。如果有人断言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选择成为“好公民”的机会，那就太自以为是了。“好公民”仅限于那些有“财产”（goods）的人，用 Batstone 和 Mendieta (2001) 的话说，有足够物质条件，有余裕去实践公民权利，才可能成为“好公民”。比如工作稳定、有空闲时间的人投票意愿更高，更乐于参与政治活动。但是这种看法只看到了结构性的优势或劣势。新媒体正在积极传播和推动新形式的行动主义，个人行动主义也能够影响参与者理解何谓“好”的公民权，同时仍然会受到既有的公民权规范所驱动。

—— Natalie Pang 《行动主义和数字公民权的二重性》

自菲律宾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精英家族持续主导着国家的政治。这种精英“王朝”的统治甚至渗透到本应迎合年轻人的政治机构，如青年议会和国家青年委员会等。参与主流政治被视为一种相当徒劳的做法。它被那些腐败、自私并可疑的人占据了。另外，缺乏有吸引力的政治选择，也是助长青年政治疏离感的因素。他们对政客和政府机构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也延伸到了运动团体与和公民社会团体中。自从菲律宾向民主过渡以来，公民社会已严重分裂，并频繁发生内讧。尽管这些团体在倡导进步事业的同时，经常与主流政治人物进行接触与合作，但这并未让情况得以改善。他们的声音被压制，他们塑造未来的能力被忽视，因此，一种为他们独有的政治诞生了。

——Cleve V. Arguelles

《青年是否正在虚度青春：作为菲律宾千禧一代新兴政治的数字公民》

大多数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移动社交媒体时，民族、国家的问题都因其对地方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跨地方的）专注吸纳而被淡化了：微观层面的物质和情感纹理，以及一个人所处或者所忆的特定地方的感觉不断延伸，将墨尔本和家乡连接到一起。社交媒体的状态更新是鲜活的，因为其中充满了具体的、日常的、因一个馒头而激起的思乡之情，金色的叶子在夜光中唤起的忧郁，一个朋友，一杯咖啡，一朵云彩，一曲旋律，一片记忆中城市窗外的模糊景色。如果我们能把这看作是一种数字公民的形式，那么，与其说这是一个国家范畴下的抽象实体，不如说是一个由多重社会 and 空间归属感（以及疏离感）构成的网络。数字社交媒体的移动场景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绕开国家，将日常的、切身的地方体验与跨国层面的文化联系起来。这种对跨地方数字归属的概念化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公民、地方、流动性、主体性以及城市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时代而言是非常紧迫的。

——马嘉兰《墨尔本的中国留学生与社交媒体移动场景》

特稿



INSTITUTIONAL KUNG FU: On the Arts of Making Things Happen.

Meaghan Morris

永远不要因为那些悲观的、无所事事的现实主义者而感到气馁。

—— 墨美姬《体制内的功夫：实现目标的艺术》

殊音

图片来源：“大地民谣全国巡演” <https://mp.weixin.qq.com/s/zBucVU0LBSIU7bkogz3dt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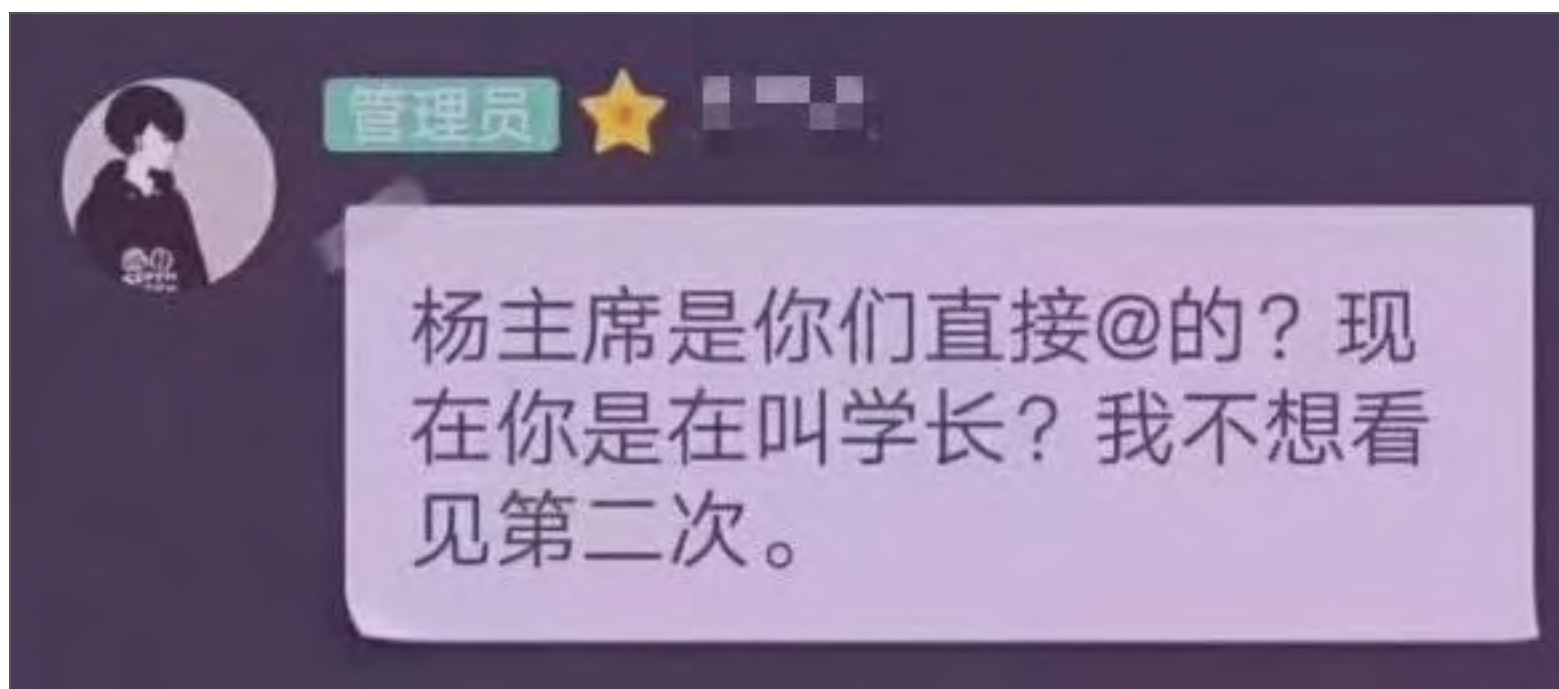


10

在这稍有一点点热情（不管是兴趣或是关怀），就很容易被判定不够冷静的理性幻觉时代，怎么听新工人乐团的音乐却成了一个不简单的问题。他们一直拥有的那份热爱音乐的初心催促的不是我们仅各取所需地解读他们的实践，而是把身体（我们时常忘记听觉也是身体的一部分）、情感、想象也交给他们的音乐——更是理解他们整体实践的钥匙。

——刘雅芳《朝解放之歌迈进的听觉笔记：听新工人乐团和〈从头越〉》

来 稿



图片来源：<https://zhuanlan.zhihu.com/p/45918477>

学生会干部在讲台上“挥斥方遒”的场面、在学生会等级制度作用下的权威不像一线城市的房价那样难以企及，一个学生会成员只需要两到三年的业余工作，就有机会站在那样的位置上扮演既得利益者的角色。这个“能力过人”的幻象虽然在外界看来或许像过家家一样可笑，但作为一个能够触摸到的“成功”的象征显然对高校学生们有着相当的效力，不断地吸引着学生们积极地投入到学生会的工作当中，以看得见的“成功”缓解有关就业的远虑。

—— 梁成林《官僚风起之后：高校学生会为何需要政治实践》

现场



我想我在中国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人，他们对我说他们做文化研究，但他们做的是文化的形式、文化符号，但不是文化研究、跟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等等完全没有关系。我对文化研究中的政治条件更感兴趣，因为文化本身是不够的。

——雷纳·温特

《墨守成规的生活会更容易吗？雷纳·温特教授谈文化研究》



这么说起来，我躲避工作这一最常见的社会实践方式，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似乎都在违背自身所学。这带给了我一种知行不一的羞愧。……但每当这时，我就会就拼命思考真正具有批判力量，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实践和“常规”工作之间的“根本区别”到底在哪，仿佛想以此作为自己不积极面对工作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令我颇感绝望的是，其实我心里明白，这根“救命稻草”不会已经长在某个地方，等待我找到，而应当通过不断的亲身投入和探索逐渐“培植出来”。

13

——徐道衡《我在多伦多送外卖》

除了累，东游西逛一番后的成果是，我终于发现，这可能不是选择哪条路继续走下去，或是什么“道路越走越窄”的问题，而是压根无路可走——我在文化产业的大逻辑之下探索文化研究，在“文化自由”等于“文化商品化”的大前提之下尝试独立创造，这个思路本身，是否就是个错误？那如果不这样，又该怎么办？

——树或《一粒原子的实践进行时》

图片来源：2019年8月10日《思想的分断：陈映真与朴玄埰》新书座谈会现场。



书讯书评

严格来讲，促发如此转向的“后冷战”，毕竟是“外部”因素，因此，这个冲击所引起的“转向”也是非主体性的。或许这是过于冷酷的批判，但是正确地讲，南韩的“后冷战”局面，并不是透过主体性努力而得到的，反而是藉着“外部”所赋予的，因此，如此的外部因素却带来这么庞大的转向，似乎就证明了那些“转向主体”本身的历史轻浮性。

14

作为新殖民性具体表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层次产生了广泛的民众。但是在现实中，即使有“民主化”逻辑和运动，历史地持续下来的反共意识形态仍然起着强大的作用；因此，分断被整体社会成员所内在化，导致了逻辑认识和现实实践的结合可能性，充其量只不过是可能性。以此判断来说，朴玄埰总是注意到逻辑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同时也提出了以实践作为媒介来克服两者间差距的方向与路径。

——延光锡《光州“五·一八”与“民众论”的悖论》

专题

数码公民



在亚洲



编者按

■ 马嘉兰 *

许多 ** 译 | 张淳 *** 校

无论全球还是亚洲大部分地区，如今社会生活已经充满了数码技术，对这个现象的观察已经是老生常谈了，甚至相关讨论也显得多余。宽带网络日渐普及，智能手机等移动数字设备几乎人手一部，日常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各种“应用程序”（“appification”），大都市拥有先进的技术，以至于都市人生活越来越依赖网络。网络不仅可以满足物质上的需求，如用手机打车、网购、提交大学课程作业，而且越来越深地影响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如网上聊天、就当下社会议题与人争辩、加入宗教团体和参与政治行动。因此，近年有关数字公民权的学术研究正在兴起。数字公民权宽泛来说指的是数字形式的社会实践（digitalized practice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包括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的正式框架内进行的，也包括日常生活中公民非正式的沟通。以前对公民权的理解有一些规范，现在，对公民权的界定更宽泛、更动态，数字通讯不仅是激发“真正”公民参与的有效工具，而且从根本上塑造公民参与的形式，甚至可能从中创造出全新的形式，特别当年轻人参与进来时，因为他们最擅长利用数码技术。然而，对青年和数字公民权的研究往往局限在经济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

这个专辑收录的 5 篇论文源于 2018 年 10 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会议由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文化调研中心（传播和新媒体系刚成立的研究机构）主办和资助，由三家机构承办，分别是亚洲文化调研

.....
* 马嘉兰（Fran Martin），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 许多，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 张淳，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研究兴趣为文化研究、批判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电影。

网络（墨尔本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人文学和创意写作系（香港浸会大学）和亚洲研究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与会学者来自新加坡、马尼拉、香港和墨尔本，讨论这些地方年轻人数字公民权的状况，以及新的动向。

Audrey Yue、Elmie Nekmat 和 Annisa Beta 合写的“亚洲的数字公民权：从数字行动主义到数字素养”提纲挈领，考察了研究数字公民权的各种理论，明晰了本次专辑的概念基础。文章综述了研究数字公民权的两种规范方法：自由范式和控制范式；广泛研究了当下亚洲的数字行动主义，案例跨越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和印度，进一步指出两种范式都不能彻底把握数字公民权的实践。作者们相应地提出第三种研究范式，即关注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更有效地呈现青年通过网络实践塑造他们作为公民行动者和参与政治的复杂面向。

Natalie Pang 的《行动主义和数字公民权的二重性》同样尝试厘清相关概念，关注区域性问题，研究对象是 2000 年代中期以来，数字化的政治行动主义在亚洲各地区的兴起。既有对行动主义的研究大多关注社交媒体对政治和公民参与带来的积极效应，比如激励公民投票、参加集会、捐款和做志愿者，但是 Pang 强调数字公民权的概念也在变化，从规范性的观念向参与性和思辨性更强的公民权转变。Natalie Pang 认为，网络行动主义既是公民声张权利的一种形式，也反映了公民权的构成和变化：在公民利用社交媒体参与公民行动的过程中，网络行动主义在塑造着公民权，反过来对公民权的不同理解也会影响行动的方式。其次，她观察到，尽管具体的议题主要是本地性的（文中主要以新加坡的“粉红点”和“穿白衣”两项社会运动为例），然而社交媒体的效用会跨越边界。因此 Natalie Pang 提出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亚洲特色的数字景观（digital Asia-scape）？如果存在，在行动主义不断涌现，以及数字公民权正在变化的背景下，我们如何理解亚洲的数字景观？

接下来三篇论文是对亚洲数字社会 / 社交 (sociality) 的个案研究, 调研范围横跨菲律宾、香港和墨尔本, 进一步探讨相关主题。Cleve V. Arguelles 的《青年是否正在虚度青春: 作为菲律宾千禧一代新兴政治的数字公民》采用数码民族志的方法, 对菲律宾推特上引起争议的“另类”(Alter) 社群展开调研, 找到了全新的视角去理解当代菲律宾年轻人为何表面上不关心政治。Arguelles 认为, 用前几代人的经验和标准去衡量千禧一代的政治参与度是无效的。相反, 他发现菲律宾年轻人对公民活动的热情另有来处, 他们热衷新型的、有创意的、破坏性 (disruptive) 的公民参与形式, 只不过很多人不认为这些活动算政治。年轻人同时生产和消费数字化的内容, 锐意创新, 介入社会, Arguelles 认为这正是在菲律宾千禧一代中涌现的政治形式。

陈锦荣的《香港青年的网络“聊骚”与“民间男性气质”》讨论的议题与前文类似, 认为性行为的形式、规范和价值观在剧烈变化, 并且是网络社交文化的重要面向。互联网上的“聊骚”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实践, 主要受男性的追捧, 因此网络聊天室或论坛也是建构特定男性气质的空间。这篇论文的材料来自香港高登论坛 (Hong Kong Golden Forum. GF), 香港以盛行网聊著称, 高登论坛尤其红火。陈锦荣通过分析“聊骚”的主题和语言, 讨论香港青年文化中“民间男性文化”的形成。本文认为, 日常生活中稀松平常的事也有重要意义, 通过考察“聊骚”, 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性行为价值观的理论意义和政治能量。

马嘉兰 (Fran Martin) 的《墨尔本的中国留学生与社交媒体移动场景》利用对 56 名在墨尔本的中国女留学生的田野调查材料, 研究她们每天使用移动数字媒体的过程是如何产生地方体验的, 目前这项调研仍在持续展开。这篇论文探讨留学生置身的多重媒体世界, 如网络游戏、跨国在线工作、微信、微博、QQ 等移动社交媒体, 研究她们对移动媒体的使用如何

塑造了在地经验（locality）和移动经验（mobility）。本文特别与孙玮的研究成果展开对话。孙玮对微信现象进行了概念上的阐释，认为微信带来了三种新现象：移动场景（the mobile scene）、实践的地方（practiced place）和节点主体（the nodal subject）。孙玮的理论建构颇有启发性，本文顺着孙玮的思路，将视野扩展到微信之外，涵盖留学生使用的各类移动媒体，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分析这些移动媒体是如何生产出对一个地方的感觉（producing place）。

这个专辑收录的5篇论文方法和角度各不相同，都关注由数字技术激发的公民参与，超越了对公民权的经典定义，不再局限在与政府和国家的合法关系上。相反，这几篇论文把触角延伸到非正式的领域中，如年轻人有机的行动主义、都市日常生活和网络聊天，进一步深化和修正对公民权和公民参与的理解，数字时代的公民权对亚洲青年（不仅限于亚洲）有什么意义。已有的研究显然还不够完备，数字技术正在高速发展，新现象层出不穷。毫无疑问，这些论文发表后，其中讨论的文化状况已经改变了，需要新的研究跟进变化的速度，还要呈现亚洲青年使用数字媒体参与公民活动的多重面向和复杂图景。我们希望这次专辑能够启发更多研究者，吸引更多的学术资源在未来投入数字公民权的研究。

亚洲青年的数字公民权 ——从数字行动到数字素养

■ Audrey Yue, Elmie Nekmat, Annisa Beta, Yingchen Kwok *

许多 ** 译 | 张淳 *** 校

导言

本文试图勾勒亚洲新兴的青年数字公民权的概貌。首先，文章回顾了目前研究数字公民权的两种规范方法：自由范式和控制范式。通过批判性地考察当下亚洲的数字行动主义，文章进一步展现了亚洲数字公民权的种种实践如何在上述两种范式之间游移。笔者为了解释这种紧张关系，提出第三种研究范式，即关注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以呈现青年人通过网络实践塑造他们作为公民行动者和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复杂面向。

数字公民权：自由和控制

宽泛地说，数字公民权指的是在网上参与政治的能力，也是社会融入过程的延伸。数字公民权不是一般意义上公民权的另一个面向或特征，而更像是一种实践，使得不同面向的公民权的社会行动得以发生。因此它指

.....
* Audrey Yue, 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与新媒体系主任、教授。
Elmie Nekmat, 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与新媒体系助理教授。
Annisa Beta, 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与新媒体系博士后。
Yingchen Kwok, 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与新媒体系研究助理。

** 许多,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 张淳, 文学博士,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 研究兴趣为文化研究、批判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电影。

的是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和行动，以此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有关公民权的方方面面计划、组织和施展社会行动。互联网可能成为社会活动和社会参与的空间，也可能只是使种种行动得以发生的工具。

数字公民权是比较新的概念，尚有争议，有着各种不同的含义和广泛的应用范围。当代世界的数码技术已经无处不在了，既许诺了新的政治参与模式，也带来了一系列威胁和挑战，数字公民权在这个形势下应运而生。因此数字公民权是非常重要的切入口，由此可以发现数字媒体的不同功能以及潜力，例如增强年轻人的政治参与意识，从中找到归属感。从数字公民权到数字素养的一系列议题，已经反映在目前欧洲国家的政策中，推荐其进入学校的课程规划，所以国家不仅要提供机会让年轻人学会设计、创造、制作、混合和分享有创意的数字内容，还要学习一些更宏大的议题，包括数据的所有权、隐私权以及在各种数字平台和社交网络上开展的运动 (Mcgillivray, McPherson, Jones, & McCandlish, 2016)。两种对立的规范性研究方法强有力地塑造了目前有关数字公民权（尤其是与年轻人相关）的研究，即自由范式和控制范式。

在自由范式看来，数字公民权大体上可以被定义为“网络参与的能力” (Mossberger, Tolbert, & McNeal, 2008, p.1)。这一范式涵盖了一系列有关社会接触和社会融合的议题，换句话说就是数字参与和数字融合。他们的观点是，网络技术已经彻底重塑了公民权的意义和功能。而对公民权的规范理解是传统意义上的或类比的，即沟通是线性和单向的（政治家和政府向公众讲话。公众只能回应或者保持沉默）；数字公民权强调多层面的、开放的政治互动，个人在其中能够“辨认出支配着他们的权力，与之斗争，并展开协商” (Coleman, 2006, p.259)。自由范式理解的数字公民权类似于网众的概念 (netizen)，即一种在网络空间中形成的政治主体，拥有政治变革的潜能，因为他们同时投身于网络空间上的国家、互联网和全球性的政治空间 (Poster, 2002)。

自由范式在年轻人中产生了广泛的共鸣。已有研究证明，年轻人在传统形式的公民运动中越来越难以发声，在正式的参与形式中感到越来越不满足；很多年轻人倾向于另辟蹊径，在互联网上发声，实践自己的公民权利 (Harris, Wyn, & Younes, 2010; Ward, 2013; Rahim, Pawanteh, & Salman, 2011)。当代年轻人的主要特征就是“网络青年公民” (networked young citizen)，即喜欢在网络空间中实践公民权 (Loader, Vromen, & Xenos, 2014)，不喜欢传统的政治组织或市民组织，更喜欢参加不那么等级化的、水平结构的组织，倾向于以项目制为主导，能迅速接收到反馈，还能参与以改变生活方式为目标的政治行动。换句话说，年轻人更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公民参与，并不遵守以责任和义务为核心的公民权（传统的公民权模式是围绕权利和责任而确立的）。

控制范式是第二种研究数字公民权的路径。在这里，年轻人被视为主流社会中还没有成年的人，需要被保护和教导，由此年轻人在网上展开的公民权也还是不完备的公民权 (Bennett, Wells, & Freelon, 2011; Livingstone & Helsper, 2007; Jones & Mitchell, 2016)。如果成年人这么理解年轻人，就有了管控年轻人的数字公民权的合理理由，从目前围绕数字素养而制定的国家法规就可见一斑，如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的《数字公民权指南》（2018）和加拿大政府颁布的《数字公民权政策发展指南》（2018）。成年人有权力规定什么是好的数字公民权；年轻人则必须学习沟通礼仪，努力学做优良公民。有关讨论集中在规范性的观念上，即公民应负什么责任和尽什么义务，如数字公民权应该是什么样的，数字公民的行为规范，如何正确利用技术，数字媒体可能带来什么危险（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上网的时候），隐私、安全和媒体素养等议题 (Ribble, 2011)。因此数字公民权是通过网上行为规范被定义的，所谓的数字公民教育就是帮助年轻人迈进成人世界的手段，让他们成长为负责的公民，有能力参与公民活动 (McGillivray, McPherson, Jones, & McCandlish, 2016)。这里的重点就是通过教育让年轻

人掌握良好的行为规范，让这一代从小就会上网的年轻人成长为“良民”，就跟年轻人从小被教导在社会上要“举止文明”如出一辙。

控制范式被批评为无助于他们想要保护的年轻人，因为过分强调保护他们免受危险，却忽视了他们参与和发声的权力。如前所述，年轻人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无法正式参与政治活动，才倾向于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参加非正式的政治讨论，只有在这些开放的空间里才能学习到政治和社会的议题。

这两种范式对于理解亚洲青年的数字公民权都很有意义，但也都存在不足。亚洲的年轻人已经占到了全世界年轻人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且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上网，已经成为亚洲重要的一支公民力量，可是目前对年轻人数字公民权的讨论绝大多数都关注西方国家。亚洲的数码技术覆盖率已位于全球领先水平，智慧城市创新也在蓬勃发展，因此更需要从公民权的角度来研究年轻人是怎么使用技术的。此外，亚洲在20世纪经历了反殖民的独立运动，21世纪又在新自由主义的压制下努力保持经济高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越演越烈的贫富不均和对丧失文化身份的恐惧，亚洲的年轻人身逢其时，亲历着这一场历史巨变。下文将详细阐述亚洲青年的数字公民权如何继承了历史的动荡，以及为何数字公民权是分析理解这些问题的有效工具。

亚洲数字公民权的背景：数字行动和网上政治参与

自由范式和控制范式都把“亚洲年轻技术公民”的一面理想化了，认为他们都是具有数字素养的人，因此这种形象成为两种范式之间张力的纽带，由此可以帮助理解上文所述的今天亚洲青年面临的困境。对亚洲青年数字行动进行批评性的研究，可以揭示这一困境的复杂面向。

现有的关注信息通信技术、年轻人的数字运动和亚洲政治的研究大多

没有清晰地采用数字公民权的框架。即使缺乏可靠的数字公民权理论，这些学者也说明了自由范式和控制范式共有的缺陷，即都不能从根本上描述数字青年（digital youth）在经验上的复杂现实。

具体的例子很多。韩国学者 Epstein 和 Jung(2011) 认为，韩国 20 世纪下半叶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一种高度压缩的现代化和数字化进程（p.84），这种现代化特点在亚洲国家屡见不鲜，同时给身处其中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期许、不安和焦虑。他们还指出，尽管韩国的网民运动常常让年轻人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2008 年的烛光游行就是鲜明的例子，然而近来运动也出现了一些阴暗面，一些年轻男性躲在屏幕背后充当键盘侠，骚扰和侮辱年轻女孩，只要在他们看来女孩作风不检点，不符合儒家父权制价值观，有点像在网上进行的迫害女巫活动。无独有偶，Therwath（2012）颇为忧心指出，虽然跨越国界的印度教运动让来到东非的劳工和移民可以与自身的宗教文化保持联系，但是近年来在网上传播印度教文化的人却变得越来越暴力，越来越仇恨伊斯兰教（徒），利用数码技术去逃避印度乃至别国的法律诉讼，同时掩护隐藏在幕后的跨国组织结构和幕后金主。

亚洲数字公民权运动的种种实践不能被简化成任何单一的叙事，这既不是数字抵抗（自由范式），也不是不恰当地使用技术（控制范式）。年轻人宣称数字技术带来了一些自由，但仍然受制于等级制的社会力量，挑战了一些压迫性的规范，却强化了另一些同样压迫性的规范。Lim（2013）指出，在印度尼西亚，虽然社交媒体上的活动分子有时候能成功动员大众，使被压迫的大众起来反抗腐败官僚，但是这些运动只有跟城市中产阶级对接，得到主流媒体支持时，才可能激起比较大的声势。Latham（2007）认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管控媒体的方式已经失效了，根本不足以控制年轻人使用媒体时混乱无序的内容生产和消费行为，年轻人觉得国家的政治宣传不是垃圾就是扯淡；然而混乱无序的媒介生产导致信息变成了商品，同时广告泛滥成灾，让年轻人失去了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力量，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正是造成贫富不均的罪魁祸首。Zhang（2013）在新加坡观察

到的现象是，年轻活动分子与老一辈政治活动家划清界限还是倍感压力，他们更关心环保、人权和地缘政治等议题，并不采取激烈对抗的姿态，在网上开博客，生产不一样的内容，不愿意直接参与政治。

另一派研究者更为乐观，强调数码技术作为“弱者的武器”是很有潜力的（Scott 1985），认为数码技术的潜力使得公民在参与政治很受限制的情况下，也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力。Tapsell（2018）使用 Scott 的“弱者的武器”来分析马来西亚 2018 年大选。这场大选堪称里程碑，推翻了执政 61 年之久的“国民阵线党”。作者认为这场政党轮替应归功于互联网越来越深的介入，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流行，不仅因为反对党更擅长在网上开展竞选活动，而且 WhatsApp 和脸书是极为有效的平台，可以发布和散播各种信息，让自上而下的宣传话语失去民心。Sreekumar 和 Vadrevu（2013）在 2011 年新加坡大选中观察到了类似现象，推特上的一些账号发布讽刺性的恶搞段子，挑战政府的单一叙事，让所谓的“进步、经济繁荣、生产力和效率”（p.244）等宣传话语失去效力。虽然这种利用网络技术的讽刺账号无意政治动员，但是其高人气也逼迫官府不得不应对“民主批评和政治活动”，放宽审查尺度（p.246）。Rauchfleisch and Schäfer（2015）认为，虽然中国的微博是世界上审查最严的数字平台，但是仍然满足了一些公共领域的核心标准。网民们大开脑洞，使用各种隐语来替代敏感的政治内容，成功地规避审查，与审查权力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目前研究数字公民权的两种规范性范式，即自由范式和控制范式之间的张力，已经被上文对数字行动主义的批判性考察揭示出来了。上文举出的案例表明，塑造年轻人网上政治参与的力量很复杂，绝不是解放或管控就能涵盖的。下文将提出“数字素养”的概念作为第三种范式，将更好地理解数字公民权面临的困境。

数字公民权是一种数字素养

本节将把数字素养作为研究数字公民权的第三种范式，超越自由范式和控制范式的对立。数字素养不满足于强调在网上使用信息的技巧，更关注网络公民参与的质量，可以产生与公民权有关的话语和行为。数字媒体的文化消费越来越盛行，生产领域越来越转向数字媒体平台，因此近年来数字素养的研究开始蓬勃发展。这个概念一般指的是个人有关数字媒体的知识和行为，同时特别指熟练操作和利用数字平台的能力。“数字素养”这个术语描述的是个人参与数字化社会所需的技能。Gilster(1997)首先用这个概念指称“理解和使用数字信息的能力”(p.2)，重点毋宁是掌握一些观念，而不单指掌握一些技术。前者强调观念上的熟稔，后者关注的是标准化的操作(Lankshear & Knobel, 2006)。Gilster 很强调观念层面，关注数字素养不仅要求个人拥有一些社会认知能力，能够对信息进行评价、分析和综合；而且经过综合的信息能够促成行动、介入世界。这个概念所指的能力不仅包括阅读和书写的能力，更包括了解信息是如何被呈现和被人理解的。Lankshear 和 Knobel(2008)沿着这一侧重点，认为数字素养就是一种社会实践，关乎意义的生产过程，而信息的生产、接收、传播和交换都是数字化的。两位学者还指出，这种社会实践不仅仅指人们阅读文本的方式，也包括人们讨论、利用和解读各种信念和价值的方式，还包括这些文本如何穿越不同的社会语境并产生互文效果。因此“数字素养”是更适用的框架，可以更好地理解人们使用和阐释数字文本的各种方式，还能了解多种多样的数字媒体是如何不断发展的。例如稍微考察一下早年亚洲学校里数字素养培养项目就会发现，这个方式为社会行动和民主参与奠定了基础，而且比只关注技能的方式更有持续性(Lim & Nekmat, 2008, p. 274)。数字素养这种宽泛的视野帮助我们理解数字社会的种种实践，以及相伴随的政策意涵，而且对教育和学习也有益处。

最近，Luke(2017)结合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把对数字素养的问题

放到批判能力的框架下加以审视。批判能力不仅指批评政府或大企业，还包括理解“文本是怎么影响人们和一个地方的，如何挑战这个过程，更重要的是如何朝着对人民和共同体有利的方向创造性地重新制作和阐释文本”（2017, p. 11）。Luke 认为数字工具有很多可用性，如多模态性、互动性强、方便合作、文本之间的多重联系和有利于建立身份认同，这些特征都对增强批判性的考察至关重要。这项研究也在回应有关数字媒体产生区隔的问题，焦点从物质和技术层面（如技术能力）转移到了精神和使用权限（usage access）（如批判能力和文化素养）（e.g., van Dijk, 2004; D' Haenens, Koeman, & Saeys, 2007）。

上述学术成果已经说明，数字素养不仅是社会实践，而且是一种批判能力。这些研究有两个共同点。首先，它们不太关注技术上的能力，而认为技术和素养是批判性探究所规定的一种社会实践。对这一素质的强调使得人们可以质询语言、技术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更可以参与社会行动和追求正义。其次，这些研究都强调学校的读写能力教育，重视培养儿童和青少年的能力。这源于新读写素质研究（new literacy studies）和教学法的发展所产生的理论影响，特别是关注技术对从小就生活在数字媒介中的年轻人的影响，以及强调学校应该教给年轻人必要的技能来应对数码社会。数字公民指的是“惯常运用技术的人，利用技术来表达政治观点的人，使用技术来行使公民责任和获得经济利益的人”（Mossberger et al., 2008, p. 2）。

如此理解数字素养跟 Bennett 区别于（围绕权利义务组起来的）“恭顺型公民”（dutiful citizenship）的“求证型公民”（actualizing citizenship）密切相关。“求证型公民”是公民参与的一种模式，其特征是个人与同伴群体的参与，利用可以使个人诉求最大化的社会技术收集信息和组织公民行动（p. 834）。由于互联网使得人们可以学习和践行各种各样的公民权，“求证型公民”正是在通过参与式媒体在数字网络里蓬勃发展起来了，这种媒体模糊了生产和消费的界线，没有等级，信息来源

多元，用户自己生产内容，富有创造性，可以发出自己的观点，允许非常个人化的表达方式。在网上践行政治和经济上的公民权不仅需要每天上网，还需要各种教育和技术上的准备，数字公民权同样要求在社会领域广泛参与的能力，不仅要求人们在网上参与，还必须与线下生活产生联系和互动 (Coleman, 2006; Bakardjieva, Svensson, & Skoric, 2012; Couldry et al., 2014; Choi, 2016)。

这一范式将数字公民权视为技术、社会、政治、法律和商业复杂地综合起来的过程，培育了分散的、差异巨大的、互相争辩的数字公民和数字空间 (McCosker et al., 2016)。数字公民权的含义不仅包括网上参与本身，还包括“公民权的各种行为”，“数字公民是权利斗争的结果，而且在不断斗争中”，无论这些权利是否已经存在 (Isin & Ruppert 2015, p. 62)。这种理解方式打破了一系列思考公民权时的二元对立，如数码世界和真实世界、权利和责任等。因为公民权与日常生活实践是一体的，所以公共与私人、网上和线下、本地和全球等界限都变得模糊了。数字公民权不应该只是被看作公民权的另一个维度或侧面，而应该是一种实践，公民权的方方面面都可以通过实践活动达成。

在新加坡，年轻人在脸上收集全球各类资讯，公开讨论 LGBTs 议题 (Yue, Nekmat and Beta, 2019, forthcoming)。他们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和对公共议题的理解，获得了一种分析社会的批判能力，评价和选择相信哪些信息时不再只依靠国家设定的议程，还回应了从自身生活经验出发产生的意识。印度尼西亚也有类似的状况，年轻穆斯林妇女的政治地位受性别和宗教习俗的限制，然而其数字公民权就表现在每天在 Instagram 发布的内容上，女性表达自己的看法，也忠于传统要求的服从，线上和线下的共同体创建也支持了新的女性群体和创造意识，女性可以成为创造另一种公众的政治主体 (Yue, Nekmat and Beta, 2019, forthcoming)。虽然这些女性没有直接参与激烈的政治行为，也没有大声疾呼，但是默默地践行公民权也会对争取公民变革产生很大的影响。

以上案例证明了，数字平台的流行创造了多样化的公民表达，形成民意，塑造个人和集体身份认同，重塑政治行动和商业文化。各种民主参与活动将批判能力转换成真实的社会实践：新加坡的年轻人从各种渠道和群体收集大量材料，讨论各种价值观和身份认同上的共识和分歧，然后再将各类信息加以吸收、混合、排列和阐释，最后形成公共舆论；印尼妇女在社交媒体上表现自己，在宗教、政治和商业领域发表自己的观点，增强了女性在印尼社会中的存在感。虽然这些实践在公众当中形成了集体性的声音，但是由于媒介融合和平台同质化，进一步加强了以个人为单位的公民参与模式。当然关键问题不在于网上参与的范围，而在于网上参与如何转化成具体可感的物质形式，让更多人实际参与进来，具有社会性的认知。正是通过这些具体的模式，素养作为公民和城市的条件才成为最好的行为模式。

结论

本文批判性地回顾了既有的数字公民权研究的两种规范方法，即自由范式和控制范式。文章指出目前主流研究的西方中心色彩，把数字公民权理解成普世的概念，忽略了年轻人的特殊性和面临的困境。笔者先考察了数字行动主义的张力，进而提出第三种研究范式，即数字素养，希望能够推进数字公民权的研究，尤其可以深入讨论亚洲年轻人的状况。由于数字素养兼具批判能力和社会实践的特点，所以关注重点就在于如何通过网上参与实现数字公民权，从而实现实际的公民参与。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亚洲，（数字）公民权是高度不平等和分裂的。因此，数字素养的批判能力和社会实践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可以阐明这种差异。尤其是亚洲很多地区的媒体还处在国家严格管控之下，这一方法可以更好地理解亚洲年轻人如何通过践行数字公民权形成一种新的模式，逐渐塑造出新的公民文化。

参考文献

-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8). Digital citizenship. Office of the eSafety Commissioner. Retrieved 12 December 2018, from <https://www.esafety.gov.au/education-resources/classroom-resources/digital-citizenship>
- Bakardjieva, M., Svensson, J., & Skoric, M. (2012). Digital citizenship and activism: Questions of power and participation online. *Ejournal Of Edemocracy & Open Government*, 4(1), i-v.
- Bennett, W. L., Wells, C., & Freelon, D. (2011). Communicating civic engagement: Contrasting models of citizenship in the youth web sphe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1(5), 835-856.
- Choi, M. (2016). A concept analysis of digital citizenship for democratic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the Internet age. *Theory & Research In Social Education*, 44(4), 565-607.
- Coleman, S. (2006). Digital voices and analogue citizenship: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young people and the democratic process.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3(4), 257-261.
- Couldry, N., Stephansen, H., Fotopoulou, A., MacDonald, R., Clark, W., & Dickens, L. (2014). Digital citizenship? Narrative exchange and the changing terms of civic culture. *Citizenship Studies*, 18(6-7), 615-629.
- D'Haenens, L., Koeman, J., & Saeys, F. (2007). Digital citizenship among ethnic minority youths in the Netherlands and Flanders. *New Media & Society*, 9(2), 278-299.
- Epstein, S., & Jung, S. (2011). Korean Youth Netizenship and its Discontents.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141(1), 78-86. <https://doi.org/10.1177/1329878X1114100110>
- Gilster, P. (1997). *Digital literacy*. New York: Wiley Computer Pub.
-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8). Digital citizenship: Guide for parents. Retrieved 12 December 2018, from <https://www.getcybersafe.gc.ca/cnt/rsrscs/cmpgns/cmpgn-06/gd-prnts-en.aspx>
- Harris, A. J., Wyn, & Younes, S. (2010). Beyond apathetic or activist youth: 'Ordinary' young people and contemporary forms of participation. *Young: Nordic Journal of Youth Research*, 18(1), 9-32.
- Isin, E., & Ruppert, E. (2015). *Being digital citizens*.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 Jones, L. M., & Mitchell, K. J. (2016). Defining and measuring youth digital citizenship. *New Media & Society*, 18(9), 2063-2079.
- Lankshear, C., and Knobel, M. (2006). Digital literacies: Policy, pedagogy and research considerations for education. *Digital Competence: Nordic Journal of Digital Literacy*, 1(1), 12-25.
- Lankshear, C., & Knobel, M. (2008). *Digital literacies: Concep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Peter Lang.
- Latham, K. (2007). Sms,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China's Information Society. *Critical Asian Studies*, 39(2), 295-314. <https://doi.org/10.1080/14672710701339493>
- Lim, M. (2013). Many Clicks but Little Sticks: Social Media Activism in Indone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3(4), 636-657. <https://doi.org/10.1080/00472336.2013.769386>
- Lim, S. S., & Nekmat, E. (2008). Learning through 'Prosuming' Insights from Media Literacy

- Programmes in Asia.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13(2), 259-278.
- Livingstone, S., & Helsper, E. (2007). Gradations in digital inclusion: Children, young people and the digital divide. *New Media & Society*, 9(4), 671-96.
- Loader, B. D., Vromen, A., & Xenos, M. A. (2014). The networked young citizen: Social media,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civic engagemen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7(2), 143-150.
- Luke, A. (2017). Critical literacy, school improvement, and the four resources model. In P. Albers (Ed.), *Global Conversations in Literacy Research: Digital and Critical Literacies* (pp. 1-13). New York: Routledge.
- McCosker, A., Vivienne, S., & Johns, A. (2016). Digital citizenship as fluid interface: Between control, contest and culture. In A. McCosker, S. Vivienne, & A. Johns (Eds.), *Negotiating Digital Citizenship* (pp. 1-18).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 McGillivray, D., McPherson, G., Jones, J., & McCandlish, A. (2016). Young people, digital media making and critical digital citizenship. *Leisure Studies*, 35(6), 724-738.
- Mossberger, K., Tolbert, C. J., & McNeal, R. S. (2008). *Digital citizenship: The internet, society, and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Poster, M. (2002). Digital networks and citizenship. *PMLA*, 117(1), 98-103.
- Rahim, S. A., Pawanteh, L., & Salman, A. (2011). Digital inclusion: The way forward for equality in a multiethnic society. *Innovation Journal*, 16(3), 1-12.
- Rauchfleisch, A., & Schäfer, M. S. (2015). Multiple public spheres of Weibo: a typology of forms and potentials of online public spheres in Chin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8(2), 139-155. <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14.940364>
- Ribble, M. (2011). *Digital citizenship in schools*. Eugene Oreg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 Scott, J.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reekumar, T. T., & Vadrevu, S. (2013). Subpolitics and Democracy: The Role of New Media in the 2011 General Elections in Singapor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18(2), 231-249. <https://doi.org/10.1177/0971721813489458>
- Tapsell, R. (2018). The Smartphone as the “Weapon of the Weak”: Assessing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Malaysia’s Regime Change.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37(3), 9-29.
- Therwath, I. (2012). Cyber-hindutva: Hindu nationalism, the diaspora and the Web.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51(4), 551-577. <https://doi.org/10.1177/0539018412456782>
- Vadrevu, S. (2015). Young people, new media, and citizenship in Asia. In L. Hjorth & O. Khoo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New Media in Asia* (pp. 105-117).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van Dijk, J. (2004). Divides in succession: Possession, skills, and use of new media for societal participation. In E. P. Bucy & J. E. Newhagen (Eds.), *Media acces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new technology use* (pp. 233-254).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Ward, J. (2013). Youth and websites: Exploring how young people use the internet for political

- participation, in R. Scullion, R. Gerodimos, D. Jackson and D. Lilleker (Eds.) *The Media,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ment* (pp. 192-204). London: Routledge.
- Yue, A., Nekmat, E., & Beta, A. (2019, forthcoming). “Digital Literacy Through Digital Citizenship: Online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Evaluation of Youth Minorities in Southeast Asia.”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7:2.
- Zhang, W. (2013). Redefining youth activism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in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5(3), 253–270. <https://doi.org/10.1177/1748048512472858>

行动主义和数字公民权的二重性

■ Natalie Pang *

许多 译** | 张淳 校***

导论

本世纪头十年的中期，互联网朝着更大程度的互联互通的方向发展，社交媒体迅速崛起，带来了一场由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传播和推动的行动主义（activism）运动。在选举和社会运动的视域下对行动主义的研究，大多关注社交媒体对政治和公民参与带来的积极效应，比如激励公民投票、参加集会、捐款和做志愿者。但是这类研究大多局限于美国的状况，或者只是套用从美国语境中生发出的概念 (Skoric, Zhu & Pang, 2016)。虽然很多研究的前提是考察社交媒体的影响，但是很少有人搞清楚数字公民权的发展和角色，广大公民意识到了数字公民权的存在，并不断践行它。数字公民权通常指的是公民有效地利用互联网以及积极介入社会的能力 (Mossberger et al, 2008)，因此是行动主义的核心原则。然而数字公民权的概念建立在西方传统之上，即在自由主义、公民共和主义和归属性等级制度的语境下践行公民权利（citizenry）。因此关于数字公民权的讨论一直有规范性的模式，关注公民的政治参与，以及阻碍个人参与政治的各种障碍。

尽管有关数字公民权的观念正在变化，从规范性的观念向参与性和思辨性更强的公民权转变，但是在亚洲的语境中，什么是好的公民权并不总是很清

* Natalie Pang，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传播与新媒体系、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 许多，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 张淳，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研究兴趣为文化研究、批判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电影。

楚。例如亚洲国家或地区的民主形式多种多样，某些地方的民主被认作是“有缺陷的”（Hoey, 2018; Freedom House, 2018）。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认为一些亚洲国家还“不够自由”（partly free），可是其根源却各有不同。以新加坡和香港为例，二者在公民自由和选举程序方面的发展程度不同。这些差距正说明了研究亚洲的数字公民权问题已是当务之急。在新加坡，公民参与和成为一名优秀的数字公民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还并不清晰，也远非不言自明。

网络集体行动

虽然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不是新现象，但是它们的形式变化很大，并没有沿着既有的套路一直发展下去，行动主义也涌现出各种过渡形态。研究者采用一些方法尝试着解释这个现象。Morozov（2011）认为，由于互联网让各种群体更方便、更经济地采取集体行动（p.180），因此理应有更多人加入集体行列，参与进来。一些研究者也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行动主义令人不安。在他们看来，参与者对行动原因的理解也许并不透彻，加入行动的动机不过是展示自己（self-representation），会削弱互联网和议题的民主潜能。Breindl（2010）承认互联网的潜力在于增强公民参与他们所关心的议题的意愿，但是最终会导致国家出台一些规章制度，对公民实施监管。

Bimber 等人（2005）描绘了蓬勃的网络行动主义之后发现，在当下媒介环境中理解集体行动，应该秉持一个原则，即打破公共和私人的界线。这就是说原本私底下的交流很容易变成公共话题，会触发集体行动以及公共协商，不需要任何中央权力来协调。集体行动已今非昔比，相对更容易爆发，不需要一帮掌握核心权力的活动分子，也不需要组织或机构来做协调工作。

Bennett 和 Segerberg (2012) 的观点建立在类似的原则上，认为社交媒体平台促进了人们越来越多地展示自我和形成身份认同，尤其是在社交网站上。集体行为的范围很宽，小到个人之间的沟通联系，大到拥有共同目标的集体行动。两人的看法与 Bimber 等人打破公私界线的观点类似，同时另一种观点更显而易见了，即“个人化的内容可以跨媒介传播”，以此为基础形成特定类型的集体行动，进而塑造“行动”的本质，无论是集体行动还是沟通性的行动，后者包括个人表达、个人展示和分享信息。Bennett 和 Segerberg 展示了集体行动和沟通行动的三种类型，数字媒体在其中的位置和函数各有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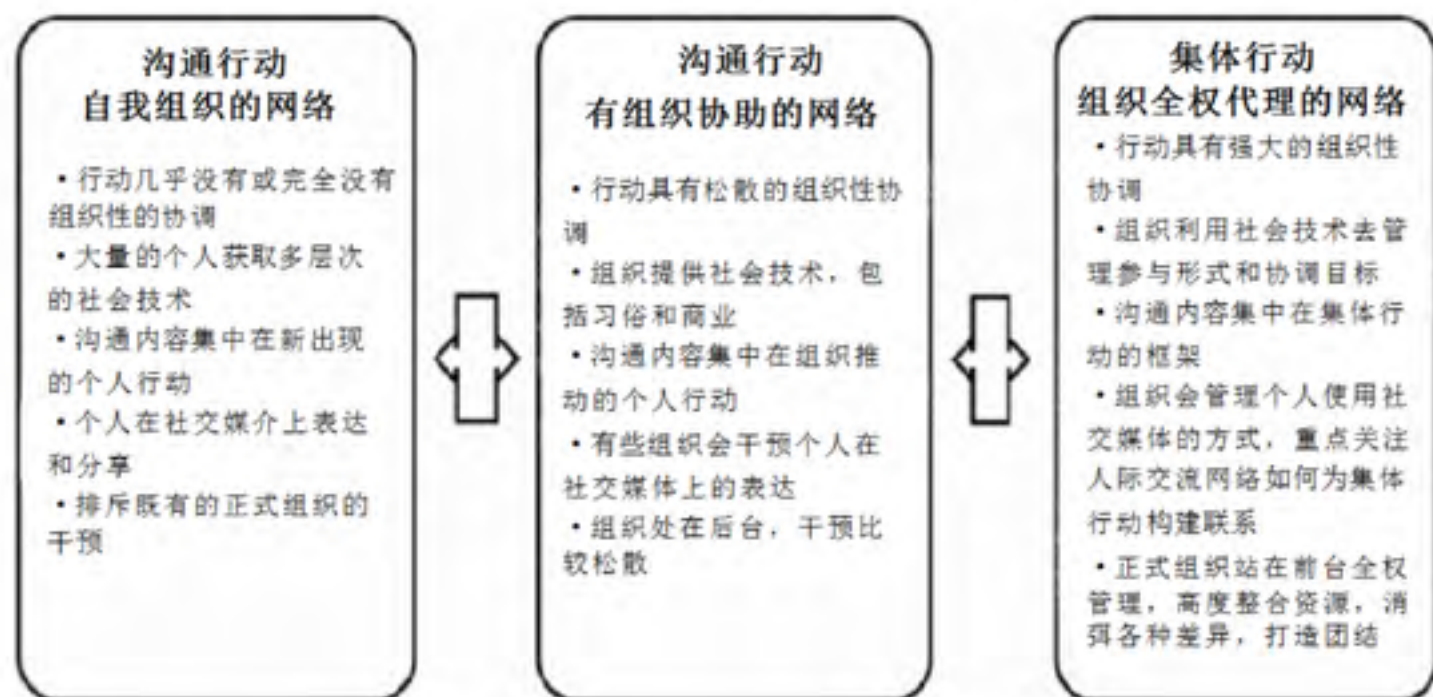


图 1 沟通行动和集体行动网络的要素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社会身份会促成集体行动或沟通性行动。《集体行动的社会身份模型》(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08) 一书收录了支持该论点的论文，认为社会身份是影响集体行动的强有力因素。

有些问题与社会身份密切相关，尤其是当目标群体普遍感知和经历到歧视时，比如，非裔美国人 (Postmes & Branscombe, 2002) 和移民 (Bourguignon et al., 2006)。女性作为一个群体，面对各种各样的歧视，Metoo 运动引起了对性骚扰的广泛关注。在此，女性作为被歧视的对象形成了一个明确的利益群体。如果一名妇女加入 Metoo 运动，随着她对群体的认同加深，身心上的负面感受也会得到疏解。这就是所谓的“从拒绝，到认同，最终重获幸福的保护疗法” (Branscombe et al, 2012, p. 119)。由此可见，集体行动和沟通行动都使得个人认同他 / 她的目标群体，加强他们对群体的归属感，而且可以提高幸福感。这些行动可以壮大参与者队伍，让成员更坚信斗争目标，让行动更有存在感，让集体事业延续下去。

上述主张正得到各项研究成果的证实。Schumann 和 Klein (2015) 的研究发现，人们参与网络联署和在脸上点赞的成本很低，也没有太大风险，就不太愿意参加面对面的小组讨论和现实中的请愿活动了，但是这些在网上开展的行动促进了个人的身份认同，加强了对群体的归属感。个人越觉得自己是群体的一员，就会变得越关心群体的福祉，而不会拘泥于一己私利，将来参加其他集体活动的动力也更强。Thomas 等人 (2012) 的研究证明了，集体讨论有助于让成员感到自己对集体是有用的，从而鼓励成员持续参与集体行动。

个人行为塑造了社会身份，反过来社会身份也在被个人行为所塑造，两者之间固然存在着一种“二重性”。比如 Metoo 运动的参与者绝大多数都是女性，她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开讲述自己被性骚扰乃至被性侵的遭遇。参与 Metoo 的女性都经历过性骚扰和性侵，有类似的经历，同时也有了一个共享的社会身份，她们都是女人。参与 Metoo 运动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诉求，分享个人的遭遇，支持其他受害者，这些行动可以让女性更有力量，还可以增强女性的身份凝聚感，为共同的目标奋斗。

寻找“好公民”

Dalton (2015) 和 Zuckerman (2014) 等研究者将公民在网上广泛参与集体行动与公民权理想改变的可能性联系起来。Dalton (2015) 提出了一串问题：

在今天的美国，做一个“好公民”意味着什么？开动脑筋，不必着急回答。什么是衡量“好公民”的标准？投票？交税？遵纪守法？从事志愿者服务？反抗不法行为？关心他人的安危？入党？还是信任政府官员？(Dalton, 2015, p. 4)

一个人如何回答上面的问题，体现了他心目中好公民的标准。同时这个标准又决定了他如何应对政治议题。例如一些人认为责任是公民的根基，更信任也更愿意投票，觉得这是更合法的行动方式；相比之下，另一些人更像是参与式的公民，更倾向于直接行动，比如抗议游行。标准的转变会造成很大影响，比如公民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容忍不同的政见，以及从被动的治理转变为更多的参与和协商。Dalton (2015) 由此推想，由于美国的社会状况已经变化了，因此在美国的公共领域中，公民权的标准已经不再是责任，而是参与性。同时这一标准的变化导致介入和参与的模式也不一样了，由投票之类的传统模式转变成抗议等更直截了当的行动。

基于责任的公民权“体现在过去所定义的正式的义务、责任和权利之中；参与式公民权强调公民应该更有自信和主见，同时要拓宽公民权的范围，社会责任感和关心他人福祉都应该是公民权的题中应有之义”(p. 5-6)。在今天的美国，出生在 1980 年到 2000 年之间的年轻公民常常被称作千禧一代，有观点认为这代人是公民权标准变化和社会资本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Dalton, 2015; Putnam, 2000; Stein, 2013)。换句话说，年长一代认为公民应当承担责

任和义务；年轻一代对基于责任的公民权有更多怀疑，愿意在各种问题上采取直接行动。

研究者有必要反思一下“好公民”的前提。如果有人断言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选择成为“好公民”的机会，那就太自以为是了。“好公民”仅限于那些有“财产”（goods）的人，用 Batstone 和 Mendieta (2001) 的话说，有足够物质条件，有余裕去实践公民权利，才可能成为“好公民”。比如工作稳定、有空闲时间的人投票意愿更高，更乐于参与政治活动。但是这种看法只看到了结构性的优势或劣势。新媒体正在积极传播和推动新形式的行动主义，个人行动主义也能够影响参与者理解何谓“好”的公民权，同时仍然会受到既有的公民权规范所驱动。

虽然公民权的理念可以理解成公民权和国家的关系，国家机构是主要的代表，但是也可以想象成由社会身份所中介的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这就是说，虽然有一些社会身份让人确信什么算好公民，但是另一些社会身份也许会跟上述标准发生龃龉。有部分人信奉公民权的基础是责任，却也会感到自己与那些被种种问题困扰的人很接近，他们可能会不得不面对公民权的另一种框架和观念的挑战，思考要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直接行动。

对立的公民权框架

Kliger-Vilenchik 和 Thorson (2016) 认为公民权的概念正在变化，研究公民权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去考察围绕公民权的各种对立框架。框架分析法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行动者如何安排自身的处境，定位自身的经验 (Goffman, 1974)。很多研究领域都在运用框架分析法，比如新闻媒体中的各类议题是在什么框架下生产出来的 (Gamson, 1992)，以及公民如何利用相应的框架来理解个人经历所生发出的一些问题 (Nisbet & Scheufele, 2009)。

从宏观角度看，规定了议题或现实的框架不只一个，而且可能会有冲突 (Vliegenthart & van Zoonen, 2011; Kliger-Vilenchik & Thorson, 2016)。这显然与规范、资源和权力等要素有关——换句话说，某些特定的框架之所以占支配地位，要么与掌握权势、占有资源的个人或群体绑定，要么与既有规范和实践吻合。然而，也应该通过作为参与范围的沟通行动和集体行动的视角来考察对立的框架，因为这些行动也可以反过来塑造公民权的框架，或增强身份意识，或削弱认同感。

我们还需要考察集体行动所采用的框架，因为社会运动的组织者会采用一些框架，去说服参与者、安排行动和进行动员。例如 Goh 和 Pang (2016) 研究发现，白皮书抗议的主导框架是激励，次要一点的框架还有诊断和预测¹。然而这些研究只考察了组织者用什么框架来开展运动，忽略了运动中不断涌现的有关公民权的新思想。

我们以新加坡的两个社会运动为例。“粉红点”类似于同志骄傲节，于 2009 年发起；2014 年出现了号称“穿白衣”的反同志运动。“粉红点”一年一度集会，声援 LGBTQ+ 群体；“穿白衣”运动在 2014 年由一位穆斯林教师发起，宣扬传统家庭观，强烈反对同性恋。这场运动见证了新加坡基督徒和穆斯林前所未有的团结，一些基督徒在 2016 年投身抗议，在运动中取得了领导地位。这个现象表明，社会运动可以打破看似颠扑不破的群体界线，无论在新加坡还是亚洲大部分地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是截然不同的群体。

Dalton 和 Welzel' s (2014) 对两项运动 2014 年到 2017 年间在网上发布的大量帖子进行了主题分析，区分了效忠型公民和主见型公民。笔者打算借鉴他们提出的概念。两场运动中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公民，其差异体现在四个关键的领域，即价值的优先顺序、对机构的信任程度、行动方式和知识类型。本文接着要分析两场运动中互相冲突的公民权框架。

1 2013 年新加坡议会通过了一项白皮书，计划引进移民，让新加坡人口在 2030 年达到 690 万。2013 年 2 月 16 日，数千市民在 Hong Lim 公园集会，抗议这项决议。——译者注。

价值的优先顺序

Inglehart (1990) 的研究关注社会价值观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例如老一代人由于成长时经历过的重大事件，倾向于重视物质方面的价值；相反，年青一代生于战后，更倾心于 Inglehart 所谓“后物质主义”价值。Dalton 和 Welzel (2014) 认为，这些价值观反映在公民权的概念中，效忠型公民更看重物质方面的价值，渴望稳定的秩序。而有主见的公民更看重参与，希望别人倾听他的观点，崇尚“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要求身心的解放感。

研究进一步证明，“粉红点”的参与者身上同样体现了效忠型和主见型的公民权框架。2017 年新加坡颁布新法令，禁止“粉红点”收取国外资助，只有拥有新加坡国籍或取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才允许集会。一些运动成员反对新法令，强烈批评法令带来的高压管控，认为运动不可以缺少公开的参与，要让各种声音有表达的渠道。同样的情况下，另一些“粉红点”的支持者反倒积极支持新出台的法令，甚至有时候还为法令辩护，认为这些法令也有合理的成分，可能对运动有利。这些争论暴露出，在双方心目中什么算最重要的事有区别，不仅体现在“粉红点”的预期成果上，还体现在认为秩序和规则究竟有多重要上。主见型公民框架也会批评“粉红点”运动，呼吁一年一度的机会不要沦为“大型野炊”，要采取更直接的行动。另一方面，“穿白衣”运动发布的种种信息都在捍卫传统价值观，更强调稳定的秩序。

对机构的信任程度

效忠型公民比主见型公民更相信机构的力量。这一点也应置于新加坡的背景下去理解，比起其他国家，新加坡人对机构的信任程度往往要高很多 (Gallup, 2017)。“粉红点”在应对法令制裁的过程中，暴露出运动中存

在着对立的框架，要么觉得法令对运动有利，要么认为法令会破坏运动。“穿白衣”运动关注的问题毋宁是现有政策是否健全有效，相当信任机构的力量。

公民行动的方式

两种公民对机构的信任程度颇为迥异，于是双方评价、支持和想象公民行动的方式也大相径庭。效忠型公民由于更看重物质方面的价值，所以觉得传统的行动方式才是正道，与合法权力机构合作才能推动变革。因为主见型公民更珍视让身心解放的价值观，对机构的信任度较低，所以 Dalton 和 Welzel（2014）说他们更可能支持那些以非暴力的形式挑战精英阶层、挑战命运的公民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粉红点”参与者发布的帖子体现了主见型公民权的典型特征，但仍然留下了一些效忠型公民权的痕迹。主见型公民行动英勇（“不畏艰险，勇敢抗争”），“粉红点”运动内部众声喧哗，这些状况都与效忠型公民的要求相抵触。当“粉红点”需要采取一些更传统的行动，比如写信向部长请愿时，行动的意义就会受到争议，有人会认为是在随波逐流。两项运动都存在效忠型公民权的框架，对框架的阐释却各有不同。“粉红点”成员的依据是为民请命，因为政府本来就许诺过相应的公民权益；“穿白衣”参与者挪用的是政府“保卫家庭”的政策。两种类型的公民理解自身行动时，都征用了政府的符号和政策，区别只在于支不支持“粉红点”运动。

“穿白衣”人士采取行动，刻意与 LGBTQ+ 人士保持距离，自诩为“保守的大多数”。LGBTQ+ 人士显然又被看作“边缘群体”了，再次证明社会身份是行动的触媒。

知识类型

知识是公民权的一个重要面向。Carpini 和 Keeter (1996) 认为一个人掌握必要的知识才能成为优秀公民。他要了解民主制度的程序，要获取足够的知识，要做出理性的判断，要清楚该投票给谁，要知道在不同的社会议题上该支持何方。由于信息的来源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更应该关注公民获取知识的方式和渠道，以及哪些信息来源是权威和可信的。

虽然各个信源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多种多样，但是对于效忠型公民和主见型公民来说，对知识的讨论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因为效忠型公民相对更信任机构的力量，所以无论在“粉红点”还是“穿白衣”中都把“研究证据”作为可信的消息来源。宗教典籍也被视为知识来源之一，很多帖子都引用过典籍里的教条。

对主见型公民来说，个人经历的故事既给运动带来灵感，也是信息的来源。他们与效忠型公民不同，认为私人故事以及人际交往也是公民行动的一部分，并不把“研究证据”当作唯一的信息源。

结论

亚洲的数字公民权研究

集体行动和沟通活动的范围很广，不仅包括在网上评论、分享、点赞和发帖，还包括那些更传统的行动方式，如参加集会。就拿“粉红点”来说，虽然一年一度的集会地开展运动的主要方式，但是在网络上开展活动也是确立和捍卫公民权的必要手段，而且可能更有意义。前文的分析已指出，即使在同一个社会运动中，也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公民权框架，研究者必须重点关注这个现象。我们考察公民权的确立方式，以及不同公民权框架之

间的冲突时，社会运动也是有效的视角。因为社会运动可以把各种行动背后的社会身份揭示出来，也可以“打破”（disrupt）固有的社会身份。

社会议题既是本土的，也是全球的

研究亚洲的公民权问题后不难发现，因为今天的社会已经高度网络化了，所以很多相似的议题会推动不同形式的社会运动，还会带来多种多样的集体行动和沟通活动。例如，“粉红点”本来致力于性别问题，同时也容纳了一些别的文化议题，如保护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但是在同一个案例中，公民权框架也会呈现不同的样貌。很多议题也不会局限在任何单一的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中。如果想准确描绘某个文化或议题内部的复杂关系，将多个文本和语境进行互文分析会是有效的方法。

本文通过对社会运动、集体行动、沟通活动的分析，描述了公民权形式的变化轨迹，考察了公民权不同形式之间的区别。网络数字媒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作为平台可以支持利益攸关的事业和议题，而且还是公民权得以确立和实践的关键模式。

行动主义的二重性

本文讨论了个人的公民行动（或行动主义）具有的二重性。一方面，社会身份是个人行动的动力，行动主义又反过来塑造个人的身份意识和归属感。另一方面，既有的公民权规范塑造了公民行动的样态，个人的行动主义也会反过来影响他/她对公民权的理解。我们通过研究社会运动，考察运动关注的议题和斗争目标，可以揭示不同公民权框架的冲突以及演变轨迹。

参考文献

- Batstone, D. & Mendieta, E. (1999). *The good citizen*. New York: Routledge.
- Benford, R.D. & Snow, D.A. (2000).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611–639.
- Bennett, W.L. (1998). The uncivic culture: communication, identity and the rise of lifestyle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31(4), 741–761.
- Bennett, W.L. (2003). Lifestyle politics and citizen-consumers: identity,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action in late modern society. In: Corner J and Pels D (eds) *Media and the Restyling of Politics* (pp. 137-150). London: SAGE.
- Bennett, W.L. (2008). *Civic Life Onlin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ennett, W.L., Wells, C. & Rank, A. (2009). Young citizens and civic learning: two paradigms of citizenship in the digital age. *Citizenship Studies*, 13(2), 105–120.
- Bennett, W. L. & Segerberg, A. (2011).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technolog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rotests against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4, 770–799.
- Bennett, W.L. & Segerberg, A. (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5), 739-768, doi: 10.1080/1369118X.2012.670661.
- Bimber, B., Flanagin, A. J. and Stohl, C. (2005). Reconceptualizing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 *Communication Theory*, 15(4), 365-388.
- Bourguignon, D., Seron, E., Yzerbyt, V., & Herman, G. (2006). Perceived group and personal discrimination: Differential effects on personal self-estee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 773–789. doi: 10.1002/ejsp.326
- Branscombe, N. R., Fernandez, S., Gomez, A., & Cronin, T. (2012). Moving toward or away from a group identity: Different strategies for coping with pervasive discrimination. In J. Jetten, C. Haslam & S. A. Haslam (Eds.), *The social cure: Identity, health and well-being* (pp. 115-131). New York,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Breindl, Y. (2010). Critique of the democratic potentials of the Internet: A review of current theory and practice. *Triple 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8(1), 43-59.
- Carpini, M., & Keeter, S. (1996).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from <http://www.jstor.org/stable/j.ctt1cc2kv1>
- Dalton, R.J. (2008). Citizenship norms and the expansion of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Studies*, 56, 76–98.

- Dalton, R.J. (2015). *The Good Citizen: How a Younger Generation Is Reshaping American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Washington, DC: CQ Press.
- Dalton, R.J. & Welzel, C. (2014). *The civic culture transformed: From allegiant to assertive citiz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rury, J., Evripidou, A., & van Zomeren, M. (2015). Empowerment: the intersection of identity and power in collective action. In: Sindec, Denis, Barreto, Manuela and Costa-Lopes, Rui (eds.) *Power and identity. Current Issues in Social Psych* (pp. 94-116). Psychology Press, Hove.
- Freedom House. (2018). Freedom in the World. Available at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18/singapore>
- Gallup. (2017). Gallup World Poll: 2017 Global Law and Order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s://news.gallup.com/reports/214607/gallup-global-law-order-report-2017.aspx>
- Gamson, W.A. (1992). *Talking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 (1986).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 Goh, D. & Pang, N. (2016). Protesting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The role of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and social media mobilization. *Telematics & Informatics*, 33(2), 525-533. <https://doi.org/10.1016/j.tele.2015.07.008>
- Hoey, J. (2018). *2017 Democracy Index*.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 Inglehart, R. (1990).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ligler-Vilenchik, N. & Thorson, K. (2016). Good citizenship as a frame contest: Kony2012, memes and critiques of the networked citizen. *New Media & Society*, 18(9), 1993-2011. doi: 10.1177/1461444815575311
- Kligler-Vilenchik, N. (2017). Alternative citizenship models: Contextualizing new media and the new “good citizen.” *New Media & Society*, 19(11), 1887–1903. doi: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7713742>
- Morozov, E. (2009). Iran: downside to the “Twitter Revolution.” *Dissent* 56(4): 10-14.
- Mossberger, K., Tolbert, C., & McNeal, S. (2008). *Digital citizenship*.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Nisbet, M.C. & Scheufele, D.A. (2009). What’s next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Promising

directions and lingering distra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 96(10): 1767–1778.

Postmes, T., & Branscombe, N. R. (2002). Influence of long-term racial environmental composition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African America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 735–751. doi: 10.1037/0022-3514.83.3.735

Schumann, S., & Klein, O. (2015). Substitute or stepping stone?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low threshold online collective actions on offline particip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5(3), 308–322.

Skoric, M., Zhu, Q., Pang, N. (2016). Social media, political express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Confucian Asi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9(4), 331–347. <https://doi.org/10.1080/17544750.2016.1143378>

Smith, R. (1997). *Civic Ideals: Conflicting Visions of Citizenship in U.S.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Stein, J. (2013, May 21). Millennials: The Me Me Me Generation. Time, <http://time.com/247/millennials-the-me-me-me-generation/>

Thomas, E. F., Mavor, K. I., & McGarty, C. (2012). Social identities facilitate and encapsulate action-relevant constructs: A test of th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5(1), 75–88. <https://doi.org/10.1177/1368430211413619>

van Zomeren, M., Postmes, T., & Spears, R. (2008). Toward an integrativ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synthesis of three socio-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4), 504–535. <http://dx.doi.org/10.1037/0033-2909.134.4.504>

van Zomeren, M., Leach, C. W., & Spears, R. (2012). Protesters as “Passionate Economists”: A Dynamic Dual Pathway Model of Approach Coping With Collective Disadvantag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6(2), 180–199. <https://doi.org/10.1177/1088868311430835>

Vliegenthart R and van Zoonen L (2011) Power to the frame: bringing sociology back to frame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6(2): 101–115.

Westheimer, J., & Kahne, J. (2004). What Kind of Citizen? The Politics of Educating for Democracy.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41(2), 237–269. <https://doi.org/10.3102/00028312041002237>

Zuckerman E (2014) New media, new civics? *Policy and Internet* 6(2): 151–168.

青年是否正在虚度青春

——作为菲律宾千禧一代新兴政治的数字公民

■ Cleve V. Arguelles *

郝玉满 ** 译 | 张淳 校 ***

摘要

菲律宾千禧一代在政治上冷漠吗？本文通过对菲律宾备受争议的推特在线社区“改变”（Alter）的数字民族志研究，为理解当代菲律宾青年表面上的政治冷漠提供了另一种途径。从代际的角度出发，本文认为当代青年的政治之所以被误读，是由于塑造其政治倾向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条件已然不同。以往几代人的经验标准来衡量千禧一代的政治参与水平是无效的。我们在菲律宾青年中看到的，是对新颖的、创造性和破坏性的公民参与形式的热情，而这种公民参与形式的政治意义尚未被充分认识。这其中就包括了数字公民的实践，或者说作为创造和介入社会之手段的数字内容的生产与消费，我在这篇文章中要展示的正是这种菲律宾千禧一代的新兴政治形式。

导言

根据近年来很多文章的说法，政治参与已然是千禧一代放弃的众多事物之一。公共对话中反复出现一个主题，即年轻一代对数字技术——从 Grindr 和 Tinder 等移动交友应用，到 Twitter 和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平台——的依赖，可能会把世界变得更糟糕。人们强调当年轻年轻人沉迷于上网，指责他们是只专注于性和约会等琐碎事务的自我陶醉的一代。然而，这是事实吗？千禧一代在政治上是冷漠的吗？

* Cleve V. Arguelles，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和社会变革学院博士研究员，研究领域集中于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地区的政治、青年及数字公民问题。

** 郝玉满，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 张淳，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研究兴趣为文化研究、批判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电影。

本文通过对菲律宾备受争议的推特在线社区“改变”（Alter）的数字民族志研究，为理解当代菲律宾青年表面上的政治冷漠提供了另一种途径。文章以社会学的代际理论为基础，指出由于塑造其政治倾向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条件已然不同，当代青年的政治与以往几代人的政治有着极大的不同（Mannheim 1952）。用以往几代人的经验标准来衡量千禧一代的政治参与水平是无效的。我们在菲律宾青年中看到的是一种对新颖的、创造性和破坏性的公民参与形式的热情，而这种公民参与形式尚未被前人充分认识。这其中就包括了数字公民的实践，或者说作为创造和介入社会之手段的数字内容的生产与消费，我在这篇文章中要展示的正是这种菲律宾千禧一代的新兴政治形式。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本文将重新审视菲律宾和世界其他地方对千禧一代政治冷漠的指控；第二部分，我将采用代际研究的方法，分析过去到现在几代菲律宾青年是如何参与政治的；最后，论文的第三部分将阐述菲律宾千禧一代数字公民实践的兴起，以及它如何重新定义了政治和政治参与。

青年与政治参与

像菲律宾这样的年轻社会，国家的政治前途取决于年轻人的参与。社会期望青年通过他们的新思想、力量和活力来引领政治革新。然而，菲律宾千禧一代介入或放弃政治的方式，已不再是之前菲律宾青年政治参与的历史中常见的形式。在世界其他地方，当代青年与政治的关系也饱受类似的争议。对先进民主国家青年政治参与的诸多研究，都指出了其公民参与水平与选举投票率的下降以及对代议制机构、政党和政治家信任的削弱

(Nye 1997; Pharr and Putnam 2000; Torcal and Montero 2006)。研究者指出，这些社会中的青年公民已与政治渐行渐远（Wallace 2003）。这一观察是否符合菲律宾的经验，是目前学术界以及公众讨论的主题。

在全球范围内，年轻人都面临着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指责 (Zukin et al 2006)。大批的千禧青年被指已放弃选举，放弃了主流政治 (Pattie et al 2004; Dalton 2008)。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代人在政治上的倦怠是许多社会民主危机的根源 (Farthing 2010)。如不明确履行传统公民民主的职责（如投票、加入政党或参加集会等），他们就将危及当代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 (Putnam 2000; Mycock and Tonge 2012)。在菲律宾，公共舆论也反映出类似的论调。从民粹主义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 (Rodrigo Duterte) 的当选到对军事戒严时期支持的回升，菲律宾很多政治上的不幸都被归咎于年轻人所谓的冷漠。批评者认为，他们脱离了政治，沉浸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消费主义世界中彼此较量。他们不是在政治贡献方面相互竞争，而是要在性、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方面彼此超越 (Tolentino 2016)。

然而，实际情况比这些研究所描绘的更为复杂和微妙。一项关于年轻人政治参与的研究表明，尽管他们对主流政治可能不满意，但他们仍然投身于“在制度化政治领域之外的新兴公民参与形式”之中 (Stolle and Hooghe 2011, p 119)。年轻人，即便是菲律宾的年轻人，都开始从事志愿活动 (Cornelio 2016; Fiorina 2002; Fisher 2012)。一种注重数字领域的责任和倡导的新型公民身份也正在显著兴起 (Loader 2007; Bennett et al 2011)。研究指出，在传统的政治参与方面，千禧一代主导的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等社会运动也极具意义 (Milkman 2017)。有的学者还注意到，青年对政治的参与似乎拓宽了政治参与的范围，比如非异性恋身份的公

开表达 (Kiesa et al 2007) 以及在选择商品和服务时对伦理和环保标准的关注 (Micheletti 2003; Micheletti and Stolle 2009)。我们有理由相信，道德恐慌再次混淆了人们对当今青年如何重新定义政治参与的理解 (Quintelier 2007)。千禧一代正在创造新的方式去定义政治参与，因此，研究者的责任在于揭示这种政治的变化。理解这些看似不明朗的青年政治取向，可以为有关青年政治参与的公共与学术对话提供更多的基础，也可丰富我们对千禧一代的理解。

代际视角与千禧政治

曼海姆 (Mannheim 1952) 曾经在运用代际视角来理解青年和政治方面做了基础性的研究。他认为，个人会受到其青年时期社会条件的显著影响。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更有可能被历史经验塑造其政治意识和信仰。然而，个人在阶级、性别或种族等不同方面的社会位置，会将一种世代意识变得更多样化。在本节中，我将使用这一框架分析菲律宾的经验，并大致描绘二战之后几代青年的历史和政治脉络。

那些出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菲律宾人是作为二战的受害者和士兵成长起来的 (Kerkvliet 1977)。日本对菲律宾的侵占让这一代人别无选择，只能参战。很多人成为了烈士，有的则成为慰安妇，即使幸存下来的人也难免遭受创伤 (Constantino and Constantino 1978)。日本人的残暴和对战争的记忆构成了这一代人的身份与记忆 (Jose 2001)。随后，30 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由于饱受战争蹂躏的菲律宾亟待重建，这一重任便落在了这一代人肩上。他们被迫提早成熟，积极为当时年轻的共和国建立从政府到政党的各种机构 (Abinales and Amoroso 2017) 而奔走

努力。1946年，这两代人迎来了菲律宾的正式独立。在战争悲剧的影响下，这些年轻人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支撑起一个有效运转、自由和独立的菲律宾。

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菲律宾青年成为了激进60年代的先驱(Weekley 2001)。他们出生于战后，在一个独立、相对和平繁荣的菲律宾长大。他们激烈地批判上一代人的成就，认为他们的重建工作没有达到国民的期望(Guerrero, 1979年)。他们涌上街头，反对越南战争，抗议工人和农民所面临的困境，并在大学校园内外倡导激进的政治。菲律宾共产党由热切的大学生联合起蛰伏在乡村的战争老兵创建，并在同一代人手中重组(Weekley 2001)。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躁动的时代。尽管没有被继续殖民占领，但当时的菲律宾青年对普遍存在的社会弊病感到失望，他们尝试展开进步事业，抓住政治机遇推进社会改革。

多年的动乱让这个国家进入了一个更加动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最终制造了70年代的第一季度风暴(First Quarter Storm)(Pimentel 2006)。他们绕开上一代的进步政治，转而支持革命。从中国文化大革命到欧美反战运动，再到全球南方的独立运动，这一代人身在国内却深受国际激进思想的影响(Abinales 1984)。然而，同样热衷政治的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却不满意青年对国家政治的积极干预。独裁政府颁布实施了军事戒严，平息了反叛的50一代青年制造的风暴。这一代人中最优秀、最智慧的人成为了领导反独裁运动的现代殉道者。他们在马科斯时期(一个普遍存在侵犯人权和治理不当的时期)历经磨难，造就了年轻的革命者和菲律宾革命政治。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菲律宾人被称为“马科斯之子”，他们将马科斯视为永远的总统，这一代人将马科斯的遗产当成自己的梦

想，同时也是他们的噩梦 (Cimatu and Tolentino 2010)。他们中有些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寻找一个不那么悲惨的未来，但更多人留下了。那些留下来的人在 1986 年临时选举中自愿保卫投票，在尼诺·阿基诺 (Benigno Simeon Ninoy Aquino Jr.) 被暗杀之后悲愤抗议，并在 EDSA 人民力量革命 (EDSA People Power revolt) 中直面独裁政府。马科斯时代之后，许多菲律宾青年都把推动政治民主化视为自己的事业。无论是创立基层非政府组织，还是搭建政府参与渠道，他们都最大限度地创造并扩大了新政权所提供的民主空间。在重获自由与国家向民主过渡的鼓舞下，这一代菲律宾人以务实的改良主义取代了激进主义政治 (Thompson 1998)。

80 年代出生的菲律宾青年把其希望寄托在国家的民主化和全球化之上。他们中有人肩负起重建国家的重任，但也有人追随先辈脚步，就职甚至移民海外，去寻找更灿烂的前程。他们平淡无奇地做着良好公民：定期投票、勤勉纳税，偶尔为慈善事业捐款，每天努力工作。他们缺乏集体精神，也从未发起如二战游击队、第一季度风暴和人民力量革命那样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就像今天的年轻人一样，他们也因采取了政治冷漠的生活方式而被指责。

菲律宾千禧一代，即出生于 90 年代至今的青年，是在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严峻的环境问题和日益加剧的社会隔阂中长大的 (Milkman 2017)。他们生活在一个经济系统日益脆弱的时代。不稳定就业类型的扩大、劳工权益和福利的倒退以及巨大的收入不平等，使他们的升迁期望大大受挫 (Hewison & Kalleberg 2013)。千禧一代的跳槽文化被解读为一种不良的工作态度，但事实上，这种文化反映的是就业市场上弥漫的不安全感 (Ofreneo 2013)。同时，他们成长的家庭模式也日益跨国化 (transnationalized)。近年来，很多身在海外的菲律宾父母靠远程情感

联系与异地育儿，将这一代年轻人抚养长大 (Parreñas 2005; 2001)。虽然飞速发展的信息通讯技术有助于弥合他们之间的地理间隔，但许多子女仍渴望有大人的陪伴 (Madianou 2012)。由于为数众多的上一代人背井离乡，两代人的集体记忆共享，以及传统上由父母、家庭发挥作用的政治社会化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模式均可能受到影响。更糟的是，国家政治的封闭性，造成了普通菲律宾青年政治上的疏离感。自菲律宾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精英家族持续主导着国家的政治 (Tadem and Tadem 2016)。这种精英“王朝”的统治甚至渗透到本应迎合年轻人的政治机构，如青年议会 (Sangguniang Kabataan) 和国家青年委员会等 (Malaluan et al. 2014)。参与主流政治被视为一种相当徒劳的做法。它被那些腐败、自私并可疑的人占据了。另外，缺乏有吸引力的政治选择，也是助长青年政治疏离感的因素。他们对政客和政府机构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也延伸到了运动团体与和公民社会团体中 (Abinales 1996; Kusaka 2017)。自从菲律宾向民主过渡以来，公民社会已严重分裂，并频繁发生内讧 (Hedman 2006)。尽管这些团体在倡导进步事业的同时，经常与主流政治人物进行接触与合作，但这并未让情况得以改善 (Juliano 2015; Sanchez et al 2018)。他们的声音被压制，他们塑造未来的能力被忽视，因此，一种为他们独有的政治诞生了。

菲律宾推特在线社区“改变”中的数字公民

与前几代菲律宾青年相比，千禧一代的政治明显是个人化、流散的 (Arguelles, 即将出版)。一方面，个人导向的政治诉诸于日常的真实性和真实性，而不是宏大的政治叙事。它要求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而不是在重大但不连续的历史关头，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另一方面，这种政治也是流散的：

它拒绝等级森严、组织严密的参与形式。相反，他们更喜欢无领导、众包（crowdsourcing）及其他灵活的组织形式。当代青年对数字公民身份的热衷，正反映了他们对不稳定的个人导向政治的偏好。

作为数字原住民，他们更倾向于利用互联网提供的各种功能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花很多时间上网（Ahn 2011），同时还依靠网络实现其他功能，如学术需求、社交联系，甚至是政治参与。通过利用各种网络平台，从社交媒体到移动应用程序，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合适的空间去倡导自己的主张，并实现网络的物善其用（Loader 2007; Bennett et al 2011）。数字公民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年轻人的实践：作为数字技术原住民专家，通过生产和消费数字内容来创造与介入社会。尽管受到主流舆论的诋毁，但推特在线社区“改变”便是这种实践之一。

在菲律宾，“改变”是一个匿名推特账户组成的秘密网络，用来保护用户的“另类身份”：一个除了“改变”社区之外无人知晓的身份，包括他们家人和朋友在内。这个社区最初的目的是为成员提供一个约会和性活动的空间，在这里他们可以寻找性伴侣、性暴露癖的观众，或创建色情资料交流的网络等，从而探索他们的另类身份。许多用户也把“改变”社区的账户称为“饥渴”账户，因为它满足了他们各式各样的性欲。虽然被当作是离经叛道，但该社区的成员数量和影响范围多年来一直在增长。最受欢迎的社区账户拥有数十万的粉丝，甚至被广告公司招募来进行品牌推广与宣传活动。

正如预期的那样，这个社区遭到了公共舆论的贬损，特别是在那些年纪较长的群体中。这被视为“年轻、狂野、自由”一代不负责任的终极证明，对他们而言，与完全陌生的人勾搭很酷，消费色情产品也很正常。更糟糕的是，千禧一代这些被认为有问题的行为，打破了人们对其参与政治

的期望。他们似乎只在性方面变得活跃，而不是在政治上。然而，批评者没有看到的是，事实上，正是这些空间和实践展示了千禧一代参与政治的方式，并重新定义了什么是政治参与。在他们参与“改变”这个小众社区的常见方式中，蕴含着其数字公民实践中的政治踪迹。

“改变”社区成员常见的活动之一是使用推文来相互交流。和其他推特用户一样，他们会在社区表露自己的行踪、正在进行的活动以及当前的想法。然而，这个社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会直言不讳地寻求线上或线下的性活动。另外，这里也流行着一些真实或虚构的有关性接触的系列故事。虽然这些内容似乎反映了这一代人的政治冷漠，但如果进一步细读他们的推文，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性相关的内容间穿插着严肃的议题，包括提倡安全的性行为、定期接受性传播疾病的检测等，但这些内容都是以年轻人的方式书写的。很多还参与讨论、澄清对生殖健康的普遍误解。

“改变”用户也会推广其他宣传组织提供的资源，尤其是性健康方面的资源。这就意味着，除了生理健康，有尊严的关系、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污名化以及性少数群体经历的歧视等相关对话在这里也得以展开。其中最鲜明的例子，是有名的“改变”用户经常利用他们的网络影响力来提醒他们的关注者，要始终坚持安全和自愿的性行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受欢迎的社区成员 @laguna_tripper 如何漫不经心地告诉其近 15 万的粉丝（数据截至 2019 年 5 月），¹ 无安全措施的口交也可能导致某些疾病的传播。另一个例子是像 @imafivefootsix 这样的帐户，² 本身就是为了分享关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故事而创建的。尽管比较微妙，但这些实践表明，“改变”社区用户在网上谈论和进行他们的性生活的同时，也在谈论和进行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在内的倡导。此举同样不乏政治意义，尤其是在一个保守团体常期公开鼓动反对生殖健康相关政策的国家（ABS-CBN News 2012）。

1 详情请参见：https://twitter.com/laguna_tripper/status/1093364295939682304

2 详情请参见：<https://twitter.com/iamfivefootsix>

发布照片是“改变”社区常见的另一项活动。就像推文一样，这些照片可能只是展示用户的日常生活，或者更为性相关的活动。该类照片通常会是模糊的、隐蔽的，有时会将用户自身或性伴侣或两者的面部都遮盖住。这些照片有的是从其他网络平台上抓取的，有的是他们在任意地点偷拍的，有的是在真实的性交过程中拍摄的，也有的只是他们展示身体某一性感部位的图片。尽管这可能看起来是琐碎并自我陶醉的，或者是一种加强身体物化的行为，但它实际上是一种赋权（Empowerment）的形式，特别是对社区中很多女性用户而言。她们拒绝身体需要被遮盖的理想化女性概念，而拥抱了一种解放的可能，愿意在账户中展示被控制的自我意识和性感的女性身体。例如，他们会有一种特殊的做法，即在发布裸照时，会在标题中加入性与身体相关的正面主张。其他女性用户则会在这些照片下面留言评论以示鼓励。我们可以看到像 @salomesalvi 这样自我身份认同为酷儿的用户，她展现自己赤裸的身体的同时，会宣告她对自我身体的接受。³ 她在推特上发布的这些照片甚至激励了很多粉丝，使她们同样采取积极的态度看待自己的身体。⁴ 她们每天都在分享自己的裸照或性感照片，试图倡导一种自我关爱、积极看待性和身体的新兴女权政治。在这些简单的数字公民实践中，女性“改变”用户找到了一个空间，去挑战规训女性身体的父权规范，它们规定了女性身体的欣赏方式。

“改变”社区中最流行的活动是视频的生产、消费和共享。这些视频大多明确地与性相关，有的是一般性行为的记录，有的是专业制作的色情作品。前者中的个人通常是匿名的，而专业色情演员通常会公开姓名并成为名人。泄露他人性行为的隐私视频，在社区中多被称为“丑闻”，但也

3 详情请参见：<https://twitter.com/SalomeSalvi/status/1077728675854835712>

4 详情请参见：<https://twitter.com/shyhuhubadera/status/1126500930977845252>

很常见。还有一些视频是社区成员的跳舞、唱歌、锻炼或分享自己的故事的内容，但这类视频并不太受欢迎。他们将这类内容称作是“少儿适宜”的。尽管社区看起来对越轨行为持宽容态度，但成员普遍认同安全和自愿性行为的理念，反对剥削和虐待儿童，并非正式地强制执行这些道德标准。这一般是通过羞辱那些违反共同规范的用户来实现的，也有人也会向其他“改变”成员发起呼吁，停止传播这些用户的内容，藉此让他们流失粉丝、评论，限制他们参与社区的方式。对于那些希望在社区中建立影响力的人而言，后者尤其具有威慑力，因为在推特这样的网络平台上，用户内容的受欢迎程度就等于他持有的货币。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一个拥有巨大关注数量的名为 @AlterDadGensan 的用户，⁵ 在传言称他在发布的性爱视频中没有戴安全套之后，不得不出来说明他从未进行过无保护的性行为。他在辩护中解释，因为他使用的是一种非常轻薄的安全套，所以不易被发现。这一澄清之举非常重要，因为抵制发布无安全措施性行为内容的行为在社区中已是大势所趋。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些视频内容中涉及儿童或未成年人的用户，在“改变”社区同样受到了攻击和抵制。⁶ 违反规定的账号将会被举报至推特管理层，他们会被封杀，并从平台上删除。尽管发布色情视频的行为可被视作年轻一代狂野的表现，但是他们在自己的社区建立起普遍共享的伦理原则及其他规范，这表明，他们对社区建设是积极而负责的。

在“改变”社区还存在着其他形式的数字公民实践，但上述这些是最常见的。问题在于，人们轻易地将这些实践视为不负责任、政治冷漠的一代人的行为而不屑一顾。人们错误地认为，积极的政治参与只可能发生在日常生活之外的制度化政治空间中。这种基于前几代人政治参与传统的假

5 详情请参见：<https://twitter.com/AlterDadGensan/status/946632446652456960>

6 详情请参见：<https://twitter.com/tabsuki/status/682251328958038016>

设，造成了人们对数字公民的政治行动的视而不见。通过不同形式的政治实践（个性化的宣传）和将政治带出其传统领域（带进个人空间）的努力，这一代人的政治形式经历了个人化的转变，但这被错误地解读为政治参与度的下降。将推特这样的数字空间当作一个舞台，个人可以在这里表达、倡导及反思其政治承诺（简而言之，公民实践），这是千禧一代重新定义政治参与的独特贡献之一。

数字公民的实践有时也可能采取符合传统政治参与定义的形式。例如，“改变”用户有时会明确表达他们对传统政治问题的立场，如在政府政绩或立法动议等方面。然而这些内容往往较少获得社区成员的推广和参与。相反，更普通、更平凡、更日常的数字公民实践才被视为更真实的。

结语

正如上文所言，千禧一代其实无可厚非。在被指责因政治冷漠而虚度青春的背景下，他们重新诠释了政治和政治参与，使之适应他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和愿望。在这个经济脆弱、家庭结构变化和政治封闭的时代，菲律宾千禧一代在寻找自己独特的政治时，更倾向于一种个人化和流散的政治参与方式。在包括数字公民实践在内的日常、直接、个人的政治表达中，而不是在公开的政治表达中，年轻的菲律宾人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声音。这种实践是真实的，因为政治承诺就反映在他们日常数字世界里的个人选择中。种种数字化的参与形式，如在社交媒体上推广宣传或创建在线政治团体等，都反映了这一趋势。有人批评说，比起街头动员或社区组织，数字公民参与的形式是不足的。这种声音无法吸引那些日常生活沉浸在数字世界中的千禧一代。对于菲律宾的年轻人来说，数字行动就是现实世界中的行动。尝试在社交媒体上影响舆论或让他人意识到当前的热点问题，其重

要性不亚于挨家挨户的社区组织。因此：不，千禧一代在政治上并不冷漠。当代菲律宾青年是重视政治和政治参与的，然而，其方式已与前几代年轻人大大不相同。

参考文献

- Abinales, Patricio and Donna Amoroso, 2017.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Philippines*, 2nd edition. New York and Oxfor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Abinales, Patricio, editor. 1996. *The Revolution Falters: The Left in Philippine Politics After 1986*. New York: SEAP Publica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 Abinales, Patricio. 1984. "The Left and the Philippine Student Movement: Random Historical Notes on Party Politics and Sectoral Struggles." *Kasarinlan: Philippine 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
- ABS-CBN News. 2012. Anti-RH bill groups hold rally at EDSA.
- Ahn, June. 2011. "The effect of social network sites on adolescents' social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Current theories and controvers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2 (8): 1435-1445.
- Arguelles, Cleve. (Forthcoming). "Apathetic millennials? Reflections on the emerging politics of an isolated generation." In *Filipino Millennials: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a Misjudged Generation*, edited by Jayeel Cornelio. Manila: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Publishing House.
- Bennett, W. L. & A. Segerberg. 2011.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Technolog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rotests Against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4(6), 770-799.
- Cimatu, Frank & Rolando Tolentino. 2010. *Mundo Marcos: Writings on Martial Law and the Marcos Babies*. Pasig: Anvil Publishing.
- Constantino, Renato and Letizia Constantino. 1978. *The Philippines: The Continuing Past*. Quezon City: Foundation for Nationalist Studies.
- Cornelio, Jayeel. 2016. *Being Catholic in the contemporary Philippines: Young people reinterpreting religion*. New York: Routledge.

- Dalton, R. 2008. *The Good Citizen: How a Younger Generation is Reshaping American Politics*. Washington, DC: CQ Press.
- Farthing, R. 2010. "The Politics of Youthful Antipolitics: Representing the 'Issue' of Youth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13(2), 181-195.
- Fiorina, M.P. (2002), "Parties, Particip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America: Old Theories Face New Realities",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edited by I. Katznelson and H. Milner, 511-541. New York: Norton.
- Fisher, D.R. 2012. "Yout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ridging Activism and Electoral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8: 119-137.
- Guerrero, Amado. 1979. *Philippine Society and Revolution*, Oakland, C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ilipino Patriots.
- Hedman, E. L. E. 2006. *In the Name of Civil Society: From Free Election Movements to People Power in the Philippines*.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Hewison, K., & Kalleberg, A. L. 2013. "Precarious Work and Flexibilization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7(4), 395-402.
- José, Ricardo. 2001. "War and Violence, History and Memory: The Philippine Experience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9(3), 457-470.
- Juliano, H. A. 2015. "Tensions and Developments in Akbayan's Alliance with the Aquino Administration." *Kasarinlan: Philippine 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 30(1).
- Kerkvliet, Benedict. 1977. *The Huk Rebellion: A Study of Peasant Revolt in the Philipp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iesa, A., Orlowski, A. P., Levine, P., Both, D., Kirby, E. H., Lopez, M. H., & Marcelo, K. B. 2007. *Millennials Talk Politics: A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 Political Engagement*. Center for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on Civic Learning and Engagement (CIRCLE).
- Kusaka, Wataru. 2017. *Moral Politics in the Philippines: Inequality, Democracy and the Urban Poor*.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 Loader, B. D. 2007. *Young Citizens in the Digital Age: Political Engagement, Young People and New Media*. New York: Routledge.
- Madianou, M. 2012. "Migration and the Accentuated Ambivalence of Motherhood: The Role of ICTs in Filipino Transnational Families." *Global Networks*, 12(3), 277-295.

- Malaluan, A.C., J. Baja, G. Carandang, J. Vergara, & M. R. Tamayo. 2004. "Performance of Sangguniang Kabataan Officials as Mandat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Code of 1991."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Arts and Sciences* 1 (2): 86-95.
- Mannheim, Karl. 1952. "The Sociological Problem of Generations."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306.
- Micheletti, M. 2003. "Shopping With and For Virtues." *In Political Virtue and Shopping*, edited by M. Micheletti, 149-168.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Micheletti, M., & Stolle, D. 2012. "Sustainable Citizenship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Consump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44(1), 88-120.
- Milkman, R. 2017. "A New Political Generation: Millennials and the Post-2008 Wave of Protes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2(1), 1-31.
- Mycock, A. and J. Tonge. 2012. "The Party Politics of Youth Citizenship and Democratic Engagement". *Parliamentary Affairs* 65: 138-161.
- Nye Jr, J. S. 1997. "The Media and Declining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3), 4-9.
- Ofreneo, R. E. 2013. "Precarious Philippines: Expanding Informal Sector, "Flexibilizing" Labor Marke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7(4), 420-443.
- Parreñas, R. 2005. "Long Distance Intimacy: Class, Gender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Mothers and Children in Filipino Transnational Families." *Global networks*, 5(4), 317-336.
- Parreñas, R. S. 2001. "Mothering from a Distance: Emotions, Gender,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Filipino Transnational Families. *Feminist studies*, 27(2), 361-390.
- Pattie, C., P. Seyd and P. Whiteley. 2004. *Citizenship in Britain: Values,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imentel, B. 2006. *UG an Underground Tale: The Journey of Edgar Jopson and the First Quarter Storm Generation*. Pasig: Anvil Publishing, Inc.
- Pharr, S. J., & Putnam, R. D. 2000. *Disaffected Democracies: What's Troubling the Trilateral Countri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Quintelier, E. 2007.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etween Young and Old People." *Contemporary Politics*, 13(2), 165-180.
- Sanchez, Emerson, Anabelle Ragsag and Teresa Jopson. Progressives in an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The Duterte Administration. Presentation at the 2018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2-5 July 2018, University of Sydney.
- Stolle, D. and M. Hooghe. 2011. "Shifting Inequalities: Patterns of Exclusion and Inclusion in Emerging Form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uropean Societies* 13: 119-142.
- Tadem, Teresa & Tadem, Eduardo. 2016. "Political Dynasties in the Philippines: Persistent Patterns, Perennial Problems."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24(3), 328-340.
- Thompson, Mark. 1998. "The Decline of Philippine Communism: a Review Essay."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6(2), 105-129.
- Tolentino, Rolando. 2016. *Kabataang Kulturang Popular at mga Sanaysay sa Kartograpiya ng Disaster at Aktibismo sa Filipinas*. Manila: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Publishing House.
- Torcal, M., & Montero, J. R. 2006. Political Disaffection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Social Capital,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 Wallace, C. 2003. "Introduction: Youth and Politics."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6(3), 243-245.
- Weekley, K. 2001.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1968-1993: A Story of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 Zukin, C., S. Keeter, M. Andolina, K. Jenkins and M.X. Delli Carpini. 2006. *A New Engage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香港青年的网络“聊骚”与“民间男性气质”

■ 陈锦荣 *

梁成林 ** 译 | 罗小茗 校 ***

摘要

通过考察网络“聊骚”（sex chatting）这一流行行为，本文将迅速变化中的性的形式、行为规范与价值观视为互联网社交文化的一个重要面向，并试图将其理论化。基于互联网的“聊骚”行为是指和性有关的观念、流言与行为的民间观点的非正式交换。社会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与性别研究都已表明，有关性话题的网络社交是一种主要受到男性追捧的非正式社交行为，因此网络聊天室或论坛也常常被人视为正在形成特定男性气质的空间。本研究基于对香港高登讨论区（Hong Kong Golden Forum）——一个在网络社交文化发达的香港非常流行的社交网站——的详细实证的网络民族志研究。在对论坛“聊骚”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以及聊天者的具体用语（包括文字形式与图像形式的“黑话”、隐喻、腔调与语域）进行调查之后，我探究了这些“聊骚”的主题与语言如何促成了香港青年文化中“民间男性文化”的形成。如同口语一样，“民间男性气质”使用那些稀奇古怪的、令人反感的，甚至低俗不堪的表达。希望这一民族志研究有助于形成对被司空见惯的日常意义构建所形塑的性价值观的理论上与政治上的重新理解。

引言

网络“聊骚”（sex chat）行为是指在一个受监管或不受监管的环境下，以同步或异步的方式进行的，有关性的观念、流言与行为的民间观点的非正式交换。这种讨论既可以由聊天者自己发起，也可以由与性有关的社会争议和道德恐慌所触发。聊天通常包括用户生成的文字或表情符号，并且常常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文字或图像“黑话”、隐喻、腔调与语域。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聊骚”参与者的网络社交进行实证的民族

.....
* 陈锦荣（John Nguyet Erni），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与创意写作系主任。

** 梁成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研究生。

*** 罗小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师。

志分析，重新审视当代香港的性价值观。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认为，以性为话题的社交讨论无论是否在互联网上发生，都是以男性（至少在自我认同的层面上属于男性）为主要参与者的（如 Adamse and Motta, 1996; Bowring, 2005; Gill, 2012; Greenfield and Subrahmanyam, 2003; Wolak et al, 2008）。批判的大众文化研究则认为这种讨论的非正式性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不仅首先使得“聊骚”这一特殊行为成为可能，也构成了聊天内容的文化特征（e.g. Kammeyer, 2008; Ray, 2007; Waskul, 2003, 2004）。与此同时，性别研究认为“聊骚”呈现出的“男人性”（maleness）源于一种普遍的文化许可，它往往使得男性在进行公开的性讨论时要比女性更加坦率（如 Del-Teso-Craviotto, 2008; O’ Riordan and Phillips, 2007; Ringrose et al, 2013; Soukup, 1999）。不论怎样，“聊骚”的聊天室或论坛是由男性主导的空间。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建成男性气质的特定风格的空间。

通过调查网络“聊骚”来重新认识性价值观，是对日常生活数字化之后迅速变化的性形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必要回应。这一数字化发生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之中，它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消费社会所强调的创意互动、社会效率、即时满足所导致的结果。这种数字化生活和强调它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一样，并没有被文化监管机构忽视。如今，性话题与互联网相互媾和的动态空间正在受到严格且频繁的社会审查与法律审查。

本项目是一项对“香港高登讨论区”（Hong Kong Golden Forum，下称 GF）的详细的实证研究。¹ 此论坛作为香港本地非常流行的聊天网站，也是一个访客主要为年轻人（同时也有老年人）的站点，曾在 2009 年被 Alexa 评为香港最受欢迎的网站之一。到目前为止，香港还没有出现关于网络男性气质的民族志调查，现有的少数关注中国男性气质建构的著作集中

.....

1 在本研究中，我们雇佣并训练了六名大学男生研究助理，让他们在 GF 网站中进行参与式观察。这项对网站社交的参与式观察在 2018 年持续了六个月，每周平均时长约为 10 个小时。

在电影研究（如 Enns, 2000; Lo, 1996; Shu, 2003）与媒介消费研究（如 Lin & Tong, 2007; Young & Chan, 2005）当中。这项研究是第一次经由一种流行并且看似持久的休闲方式，来深入研究当地男性气质的具体形式。我在本研究中聚焦于“聊骚”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以及聊天者的语言特点（包括文字与图像形式的黑话、隐喻、腔调以及语域），它们都试图将性的意义（例如性词汇、性行为以及性关系）作为聊天的一种功能（而非性在社会中的规范概念）进行重构。通过观察这些主题与语言，我探究它们如何促成了香港特有的，并且在其网络聊天文化中也别具一格的“民间男性文化”。我在这里将民间男性气质定义为一种非正式的“家伙们的文化”，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任何与性和身体相关的事情的持续好奇，一种诉诸本能，乃至低俗不堪的情感，以及一种不是建立在阶级差异与教育水平，而是建立在街头知识与大众品味基础上的“社会时尚”（social cool）。就像口语一样，这种男性气质使用那些稀奇古怪的、令人反感的，甚至是低俗不堪的表达。

网络民族志：关于方法论的说明

本研究采用了网络民族志的方法对“聊骚”进行了批判的质性研究。虽然当下对于互联网以及计算机媒介传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简称 CMC）的研究数量众多，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质性研究（Garcia et al, 2009），民族志研究则是质性研究中占比更少的一类。传统的民族志研究坚实地立足于线下的社交世界，网络民族志则有所不同，它凭借着文化研究所采纳的工具，因循泼拉·苏科所说的“更真实地反映人们现实生活”（Saukko, 2003, 56; see also Gray, 2003）的行为与文化分析模式，逐渐成为了一种影响力日益增强，并且适宜被用在计算机媒介传播语境下，研究各种社群与文化的质性研究方法（Kozinets, 2002; Langer

表 1 供调查使用的初步主题分类

1. 综合
1.1 性价值观与性冲动
1.2 性行为与性关系
1.3 性偏好与性观念
2. 性与健康
2.1 怀孕
2.2 身体部位与生殖器有关问题
2.3 性传播疾病与艾滋病
3. 性行为
3.1 性交
3.2 自慰
3.3 触摸、爱抚、亲吻
3.4 口交
3.5 贞操
3.6 色情描写
3.7 其他性习惯与性偏好

& Beckman, 2005)。²

在将传统民族志的经验迁移到网络民族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说明一些具体且必要的考量因素。它们包括：

一、研究者进入研究对象的路径以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共同在场：由于网络民族志的使用者们不是与研究目标在物理空间中共同在场的，因此他们必须制定一种策略，使得他们在访问在线社区时，既尽量减少对其话语的干扰，又能在文本和视觉媒介中管理他们的身份和自我呈现。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们是否有能力表现出其所研究群体的文化规范。这

.....
² 在本项目中，我放弃了招募论坛用户进行面对面采访的想法，因为这样做将会大大延长项目的时间。此外，本项目的宗旨在于研究性言语与男性文化，这些是由网络情态，而不是由线下采访时的后续反映所表现出来的。

需要我们从初始阶段传统的“参与式观察”适当地转向沃尔斯特龙（2004）提出的正式阶段的“参与式体验”。³

二、文本与图像化数据的管理：目标网站越受欢迎，讨论就会越发活跃和激烈。这样的话，各种讨论主题就会生成一个巨大的数据池，需要被仔细地分门别类和规范。在本研究中，我开发了一套初步的主题分类，作为对数据进行分类的粗略指南（见表1）。

三、为聊天者保密：传统民族志中对于研究对象的保护也应当扩展到线上聊天者身上。在互联网聊天室中做研究的好处在于，大多数人都是使用假名的。但研究者们也提醒会这样的可能：一些话题参与者使用的仍然可能是真名，或者是在不同的聊天网站上使用相同的身份，他们最终还是有可能被认出来。因此，增加一层额外的保护是极其必要的。为了使聊天者保持匿名状态，我们在这项研究中给他们分配了新的代码，以区别于他们的网站用户名。虽然许多聊天者的用户名已经是假名了，但是在这项特定研究中，我们还是提供了额外的保护。

根据对互联网环境中研究方法论与研究伦理的简短讨论，可以说，尽管研究者在面对这个快速变化的虚拟空间时遇到了诸多问题与困境，但我们还远远没有就一组通用的行动准则、预防措施与补救措施达成共识。⁴

.....
3 根据沃尔斯特龙的观点，参与式体验者“需要在被研究的群体中扮演积极贡献者的角色”。这具体是指研究者对论坛用户正在讨论的核心问题有所参与。在最初的努力（也就是“潜水”）之后，这（即参与核心问题的讨论）意味着他们能够在社群中活跃地发帖和阅读，来了解线上社交的环境。“潜水”（lurking）行为包括耐心观察正在发生的核心讨论，拾取可用的线索，以及观察参与者可能不愿谈论的话题的边界何在。这种沉默的观察的行为，也就是“潜水”，是被其他网络民族志学家们认可的做法。Kozinets 和 Handelman(1998) 主张首先用“潜水”的方式开始对网络现象的参与式观察研究。这两位研究者过去常常通过潜水来获取有关消费者抵制行为的信息。最初的观察阶段为他们设计采访问题提供了信息。与此类似，在 Shoham(2004) 对以色列聊天室的民族志研究中，他先是潜水来获得讨论者的信任，随后再将他自己作为一个从事网络民族志研究的网络社区新人介绍给整个社群。

4 随着互联网渗透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社区已经成为了研究者无法忽视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在互联网的流动性中，研究者依旧很难坚持和遵循固定的指导原则。比方说，研究者如何在一个参与者随时可能出现和消失的在线论坛中获得研究许可？研究者如何能有信心识别出频繁更换id的人？有许多类似的挑战存在。研究者由此需要在一个不断变动的环境中，在他们的研究兴趣与保护研究对象之间勘定出创造性的、且合乎伦理的平衡。

讨论：性语言的创新

社交论坛中语言使用的特点之一就是广泛地运用表情（icons）、短句和黑话，这些语言构成了特定论坛的网站文化。香港高登讨论区中的图像表情用法极具原创性和创意性，其论坛讨论中的对话则集中体现了所有本地网络论坛特有的语言用法。

图像表情：性与揶揄

讨论主题中的诸多图像表情都是对某个常见表达的直接替代，比如输入[👊]就表示“操你妈的”，而这个一跳一跳的表情[🐸]则表示又大又弹的女性乳房。不过并非所有表情都是这样直接对应起来的，其中一些符号表现出的隐含意义是GF中独有的。论坛的核心表情之一[🤡]被人称为“小丑神（Clown God）”，⁵其中文表达“胶神”（粤语发音gao sun）中，“胶”（gao）的发音近似于“鳩”（粤语发音gao），在粤语中指男性生殖器（或者广义地指一切让人感到很蠢的事情）。因此“胶神/鳩神”就成为了一个极趣味的语言结构，意为“屌神”或者“蠢货之神”。这个图标经常被当做一种缩写，用来回应论坛讨论中一些令人感到很蠢或者没有说服力的内容。GF的用户们非常喜欢这个表情，他们将它当作神来崇拜，并且将它印在T恤、马克杯以及许多其他物件上，以便论坛用户们能够在线下轻易地相互辨认出来。

GF另一个特有的表情是这个挥手图标[👋]，除了简单地表示“你好”之外，它还有多重含义。它可以表示对讨论中某个观点的同意，也经常被

.....
⁵ 这个表情最初用于美国公司Snitz Communications开发的论坛Snitz Forum 2000，当时的高登讨论区使用了与之相同的论坛操作系统，因此高登用户也可以使用这个表情。那些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会认为这个图标是由高登讨论区所创造的。尽管如此，这个表情已经被高登用户广泛使用，并被认为是论坛的代表表情。（<http://evchk.wikia.com/wiki/%E5%B0%8F%E4%B8%91icon>）

用作于在论坛中“留明（名）⁶（leaving name）”。当用户在论坛中回复某个特定的讨论主题时，该主题会被自动保存在用户的个人历史中，因此如果有人对某个特定帖子感兴趣却又没有时间参与进去，或者希望将帖子保存下来以供之后查阅，他们就可以简单地在帖子中回复一个表情、字符等等，最快速度地将它归档到个人账户中。这个过程被叫做“留明（名）”。在这种情况下，表情经常用于存档特定的讨论，挥手表情则是最常用的。不过，这个表情在 GF 中还有另一种特定用法，具体用在有关性的讨论中。在香港，直接在论坛中发布显示身体私密部位（如乳头或女性生殖器）的裸露照片是违法行为，想要分享这些资源的讨论者只会发布一个直接导向色情内容来源的网页链接。但当一些讨论者不了解或者忽视了有关条例，直接将违法内容发布在论坛中，或者意外地上传了裸露照片而非网页链接时，其余的论坛用户就会揶揄发帖者，威胁着要将他通过论坛管理者移交给警察。此时，贴出这个挥手表情就意味着嘲讽式地和发帖者告别。当然，这种举动只是一种纯粹的嘲弄，那些发表情的人并非真要把这种违法行为报告给当局。这些表情的使用甚至不能起到善意提醒违法行为的作用。就算论坛用户总是在准确地使用这些表情，但所有这一切却都只是 GF 中吹嘘、揶揄和假意恐吓文化的一部分。

语言游戏

除了创意性地使用图像表情，GF 的讨论者们还采用了一套他们自己的黑话（idioms）进行性话题的讨论。总的来说，这些黑话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提取于原本的粤语词汇，它们随着（语义或语音上的）变化而被讨论者创造性地改编了；另一组则是从 GF 社交文化中的层层转化与发展历程中提炼出来的。以一组流行的“术语”“孝子”（filial son）和“不孝子”

.....
⁶ 原文为“留明”，但在大陆网络社区中普遍写作“留名”或者 mark。——译者注。

(un-filial son) 为例, GF 论坛中存在着大量“色情资源帖”, 这些帖子或评论中包括一些性经验的叙述以及色情作品。论坛用户们希望发帖人将讨论提及的资源链接张贴出来, 发帖者不这么干的话就会挨骂。在粤语中, 最常用的咒骂就是“屌你老母”。因此, 发与性话题有关帖子的论坛用户如果附上一个易于下载相关资源的链接, 他就会因为让自己的母亲免于“被屌”而被赞誉为“孝子”。至于“不孝子”自然就是对那些忘记或是没能为论坛用户提供便捷链接的发帖者的咒骂。这个例子能够扩散到一系列 GF 论坛中的类似黑话, 像是“不孝有三, 无 seed 为大 (seed 指能够下载的资源种子)”以及“借你老母一用”,⁷ 所有这些粗俗并且有厌女情节的黑话都是源于同一个用户社群, 他们依靠对性事的共同兴趣建立起了一种兄弟情谊。

论坛中的对话通常由上面这些不同的创造性元素组合而成, 用在论坛对话中的“黑话”含义变化如此之多, 以至于外来者很难理解它们或是跟上讨论节奏。以 GF 论坛中“与未成年女孩发生性关系”这一主题中的某个句子为例:

报警向左走向右走召唤👮👮👮

对于不熟悉 GF 社群文化的阅读者而言, 这句话是无法被理解的。它需要这样被分解:

a. 报警: 它来自 GF 中的吹嘘文化。每当有人号称自己有过一些违法行为, 比如与未成年女孩性交, 其他的论坛用户就会假装要报告警察来嘲弄或是恐吓那些 (假冒的) 罪犯。

b. 向左走向右走: 被社群成员当作是“屌” (dick) 或者“操” (fuck) (可以用粤语方言中的“燃”字概括) 的同义词。这个词更多地被用来称呼某人为“蠢货” (dickhead)。该词背后的含义源于 2003-2005 年间, 当时

7 “不孝有三, 无 seed 为大”改编自孟子的谚语: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这是一个将中国传统伦理孝道与色情资料的分享创造性地连接在一起的行为。“借你老母一用”是另一种说法的“屌你老母”。前者较后者更为戏谑。

GF 论坛的站点管理者对论坛中的脏话进行了过滤和屏蔽处理。由此，每当有人输入脏话时，和谐系统就会自动将违禁词汇 / 短语转换成另一段文字。这种自动和谐系统会将对话中的“屌”换成“向左走向右走”，类似状况频繁地发生，所以论坛用户后来干脆就输入“向左走向右走”，好让其他用户明白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

c. 召唤：该词与众多喜爱电子游戏与日本动画的宅男有关。“召唤”魔法或者性感女神在这些动画与游戏中极为常见。

d. 句子最后的表情🤔🤔🤔类似于“耶！”或是“击掌！”

把这些部分组合起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让我们找到那些报警的蠢货（并向当局报告这件事），耶！”就和前面提到的一样，用户们并不会真的报警，在人们的揶揄过后，什么都不会发生，这就是 GF 聊天文化中典型的浮夸行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持续的语言创造性与社群团结，最终催生出不寻常的、成问题的，甚至潜在的男性意识。

民间男性气质

在 GF 聊天文化中，一种粗俗而真实的浮夸的男性意识持续地存在着。面对由性话语架构起来（或再形成）的聊天室特有的男性文化，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批判性的理解。这也许要求我们暂时悬置自己的价值判断，以避免出现以下两种情况：要么就是对这种理所应当的男人“性天性”漠不关心（即所谓的“男人就是这样”的论调）；要么就是谴责整个大众男性文化，将其视为性物化（sexual objectification）和厌女症（misogyny）的温床。我觉得这种民间男性

气质——其粗俗、傲慢、浮夸和不拘小节——最终同时呈现了这两种倾向。问题在于：且不论这种男性情谊怎样粗鲁，它是如何在整个聊天室文化所打开的广泛的性空间中分布和运作的？就“性”的意义的本质——这个在虚拟空间中被不断重构的东西，它又告诉了我们什么？

在这些表现侵略性男性文化的讨论内容中，最突出的话题之一就是与女性身体或外貌相关的话题。许多帖子开启了分享、评价并且幻想女性身体（这些帖子大部分附有性图片，有时还有视频）的议题。以下是从 GF 中截取的例子：

- a. update!!EP III - 8 妹與果醬先生 - 第六回 - BLACK(#6 有圖)
(更新第三部分! -8 妹与果酱先生 - 第六回 -BLACK (#6 有图))
- b. 我的偏好是熟婦!! 更新 P.3, P.6 (相), P.9(相)
(我的偏好是熟妇!! 更新 P.3,P.6 (照片), P.9 (照片))
- c. (一人一張)靚女j圖 / 醜女嘔圖
((一人一张) 靚女J图 (指女性的性感照片) / 丑女呕图 (Ugly girls photos for vomitting))
- d. [J] 时间打造史上最強J圖职位
(J time 打造史上最强的J图贴)
- e. 法拉女神對咪咪真係好圓潤!!
(法拉女神的胸部真的是很圆润!!)
- f. 您地覺得邊類型既女為之“索”? _?
(您觉得那种类型的女生最性感?)
- g. 鍾唔鍾意欣賞女仔既陰部吗?(唔計陰毛)
(你喜欢欣赏女人的私处吗?(不含阴毛))

从这些材料中，我们能够识别出一些以女性身体为中心的“聊骚”主题类型。第一类是分享色情资料的帖子，例如 a 和 b。这些帖子含有色情资料的图片，并在大部分情况下都附有影片、网页链接或者下载来源。围绕着这些帖子可以轻易地生成超过几十页的对话以及超过百条的回复。第二类帖子的内容与第一种相似，它们都是对女性身体与色情资料的分享、讨论或者评价，只不过是围绕着女性名人或是公众人物的图片展开。这些图片大多是被意外捕捉到的各类走光照，还有一些图片显示的是泳衣或是紧身衣下的女性身材。

最终，我们的研究显示，网络社交中可能存在着一个引发道德争议的问题，网民们喜欢分享他们与性工作者见面的经历。这些所谓的报告会包括对整个事件来龙去脉的详细描述，从写明妓院的地点、描述女性性工作者，直到写清楚全部的参与过程。有时这些报告会以中篇小说的形式呈现，作者甚至会在整个故事中添加更多的细节，完善其故事情节、对话内容以及感受描写。比如《东莞的森林》的故事就是基于作者真实的“叫鸡”经历，它的受欢迎程度如此之高，且其写作质量近似于一部通俗的爱情小说，因此被拍成了一部名为《一路向西》（Due West）的商业电影，并于 2012 年年中上映。⁸

结论

“聊骚”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现场，用以考察一系列似乎在赛博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矛盾：那些公开与陌生人讨论的想法与言论，却被当作与我们的身体以及私密的主观性感受直接相关的东西来体验；呈现与再现的行为，其被生产的速度与被消费的速度一样快；互联网

.....
⁸ 媒体对 GF 小说《东莞的森林》被拍成热门电影的报道参见：http://www1.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120313&sec_id=462&art_id=16150337。

流动时空中身份的建构与解构；一种因为身体想象与技术想象结合而形成的相遇，但在这种结合中，肉体、言语和技术却似乎独立于彼此。这些都是创造奇特而迷人的性别表演，尤其是创造“民间男性气质”表演的诸种条件。因此，将网络言语、性别以及多样化色情作为相互关联的独立存在物进行解读是一项复杂的阐释工作。这项研究通过对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社交网站进行基于互联网的民族志调查，考察一种在香港很少被研究到的男性气质的形式，并试图建立一种分析模式。希望这个有关“民间男性文化”的研究能够重塑香港性别研究的方向，使得它从老掉牙的男性建构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如通过家庭、学校、体育、商业环境和媒体）更多地转向没有固定形式、由自由不定的想象构成的性言语的流动与交互。

参考文献

- Adamse, Michael & Motta, Sheree (1996). *Online friendship, chat-room romance, and cybersex: Your guide to affairs of the Net*. Deerfield Beach, Fla.: Health Communications.
- Alexa. Top Sites in Hong Kong. Available in <http://www.alexa.com/topsites/countries/HK>. Accessed on 18 Jan, 2015.
- Attwood, Fiona (2006). “Sexed up: Theorizing the Sexualization of Culture,” *Sexualities*, 9(1): 77-94.
- Bowring, Lyndon (ed.) (2005). *Searching for intimacy: Pornography, the internet and the XXX factor*. Milton Keynes: Authentic Media.
- Del-Teso-Craviotto, Marisol (2008). “Gender and sexual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in language use: the case of chatrooms,” *Discourse Studies*, 10(2): 251-270.
- Enns, Anthony (2000), ‘The spectacle of disabled masculinity in John Woo’s “heroic bloodshed” films’, *Quarterly Review of Film and Video*, 17(2): 137.
- Gill, Rosalind (2012). “The sexualisation of culture?,” *Social and Personality*

- Psychology Compass*, 6(7): 483-498.
- Garcia, Angela Core, Stanlee, Alecea, Bechkoff, Jennifer & Cui, Yan (2009). *Ethnographic Approaches to the Internet and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8(1): 52-84.
- Gray, Ann (2003). *Research Practice for Cultural Studies: Ethnographic Methods and Lived Cultures*. London: Sage.
- Greenfield, Patricia M. & Subrahmanyam, Kaveri (2003). “Online discourse in a teen chatroom: New codes and new modes of coherence in a visual medium,”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4: 713-738.
- Kammeyer, Kenneth C. W. (2008). *A hypersexual society : sexual discourse, erotica, and pornography in America today*. New York: Plagrove Macmillan
- Kozinets, Robert V. (2002). “The field behind the screen: using netnography for marketing research in online communitie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Vol. XXXIX, p. 61-72.
- Langer, Roy & Beckman, Suzanne C. (2005). “Sensitive research topics: netnography revisited,” *Qualitative Market Research*, 8(2): 189-.
- Lin, Angel & Tong, Avin (2007), ‘Crossing Boundaries: Male Consumption of Korean TV Dramas and Negotiation of Gender Relations in Modern Day Hong Kong’,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16(3): 217-.
- Lo, Kwai-cheung (1996). ‘Muscles and subjectivity: A short history of the masculine body in Hong Kong popular culture’, *Camera Obscura*: 104-125.
- O’Riordan, Kate & Phillips, David J. (eds.) (2007). *Queer online: Media technology & sexuality*. New York: Peter Lang.
- Ray, Audacia (2007). *Naked on the Internet : hookups, downloads, and cashing in on Internet sexploration*. Emeryville, CA : Seal Press.
- Ringrose, J., Harvey, L., Gill, R. and Livingstone, S. (2013). “Teen girls, sexual double standards and ‘sexting’: Gendered value in digital image exchange,” *Feminist Theory*, 14(3): 305-323.
- Saukko, Paula (2003). *Doing Research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 Shu, Yuan (2003), ‘Reading the Kung Fu Film in an American Context; From Bruce Lee to Jackie Chan’, *Journal of Popular Film & Television*, 31(2): 50-.
- Soukup, Charles (1999). “The Gendered Interactional Patterns of Computer-

- Mediated Chatooms: A Critical Ethnographic Study,”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 15: 169-176.
- Shoham, Aviv (2004). “Flow experiences and image making: An online chat-room ethnography,” *Psychology and Marketing*, 21(10): 855-882.
- Walstrom, Mary K. (2004). “Ethics and Engagement in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Analyzing Public Online Support Groups as Researcher/ Participant-Experiencer.” In Elizabeth Buchanan (ed.), *Readings in Virtual Research Ethics: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Hershey, PA: Information Science Publishing, 174-202.
- Waskul, Dennis D. (2003). *Self-games and body-play : personhood in online chat and cybersex*. New York: Peter Lang.
- Waskul, Dennis D. (2004). *Net.seXXX : readings on sex, pornography, and the Internet*. New York : Peter Lang
- Wolak, Janis, Finkelhor, David, Mitchell, Kimberly, Ybarra, Michele (2008). “Online ‘Predators’ and Their Victims: Myths, Realit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63(2): 111-128.
- Young, Sook Moon & Chan, Kara (2005). “Advertising appeals and cultural values in television commercials: A comparison of Hong Kong and Korea.”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22(1): 48-66.

墨尔本的中国留学生与社交媒体移动场景

■ 马嘉兰*

郝玉满** 译 | 张淳*** 校

刚来的那几天我都没有食欲，吃不下。[...] 是因为我没带手机过来，因为我爸爸让我直接在这边签一个。当时我在这儿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机，就相当于我什么都不知道，相当于与世隔绝了。那个时候，就连睡觉也根本睡不着，早上也很早就起来，然后就特别想家，就想妈妈想爸爸呀，想国内什么好吃的，想朋友，因为毕竟在这里什么朋友都没有。后来签了手机办了网络之后，啊，生活开始慢慢变正常了。[...] 一般的话，我就是平时上网跟我妈妈聊聊天之类的。手机吧毕竟也就是上一下看看那种娱乐新闻之类的，毕竟可以同时关注国内新闻还是挺好的。[...] 就可以讲一下心中什么什么感受，毕竟有一个人可以倾诉是不一样的。可以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就感觉他们一直在我身边。

—— 棉棉，19 岁，浙江¹

这是一个刚到墨尔本的中国大学生的故事，它提出了一种关于中国留学生、数字媒体、公民身份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特殊概念构想。棉棉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证，说明了当前像她这一代移动数字土著人如何把跨国通信的能力视作一个地方是否宜居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棉棉

* 马嘉兰 (Fran Martin)，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 郝玉满，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 张淳，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研究兴趣为文化研究、批判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电影。

1 此处“棉棉”音译自原文 Mianmian。

而言——用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的话来说——在与家重新建立联系之前，墨尔本根本就是一个“不毛之地”。她变成了一个没有网络的节点，失去了所有的信息，在一个根本无法体验的城市里“与世隔绝”。而要让墨尔本成为可居住的地方，对于棉棉来说，首先需要通过数字媒体把它跨地方化（Translocalize）：要重新连接回熟悉的流行文化以及她在浙江的家庭情感网络（Wilding，2006年）。如果我们能从棉棉的叙述中推断出一种公民观，那这种公民观并不是建立在民族和国家的基础之上，而是在城市和身体的基础之上。要让棉棉体验到墨尔本是一个可居住之地（也就是说，与世界相连的某个地方），并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有活力的生命的存在（也就是说，可以正常吃饭、睡眠和社交），她必须首先重新连接进她的跨国数字网络。这就指向了一个数字化的、跨地方的公民模式，这也将是我在本文中探讨的核心。

本文通过对在墨尔本学习、生活的56名中国年轻女性的民族志田野调查，研究移动数字媒体的日常使用如何产生这些教育移民的地方体验，并藉此探索一条理解“公民”问题的不同路径。本文所思考的“公民”有三个关键特征。首先，它不是规范性的模式——它不试图概述事物应然的样子——而是描述性的和分析性的：它解释的是“实际存在”的数字和城市实践形式，我认为这些实践构成了一种另类的公民身份形式。第二，正如前文所示，它不关心国家、政府、法律和规范化的权利义务等公民身份研究的一般领域，而是关注人们日常生活中短暂的、情感性的数字体验和切身（Embodied）体验，这些体验跨越了地方与国族的范围。第三，这种公民身份描述的不是一种主流经验，而是边缘经验：一个特定的少数民族群在一个城市常驻居住和生产的方式。在墨尔本，中国留学生在很多方面被排除在社交生活之外，包括就业方面（比如与签证状态相联系的工作权的行政规定，以及雇主的种族歧视）；校园的社交方面（比如当地学生的冷漠甚至敌意，以及尚无法系统解决中国留学生教育需求的高层管理部

门)；城市权利方面(比如公共空间中爆发的种族主义虐待)；以及在他们与澳大利亚国家的关系方面(在这一关系中，他们更多地被视为消费者，而不是作为有权享受社会和定居服务的移民群体)。然而，面对各种形式的排斥及被少数化(Minoritization)，这些教育移民仍然展现了在城市中生活的新方式。我将尝试证明，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很大程度上藉由日常的数字实践，生产出了城市的另类版本。

本文拒绝将切身体验(Embodied Experience)与技术媒介(Technological Mediation)从概念上对立起来的流行二分法，而是将研究基于这样一个预设：对一个地方(Place)的切身介入(Embodied Engagements)与媒介介入(Mediated Engagements)是相互构成、相互交织的——尤其是对这一代人而言，数字媒体和通信系统构成了他们日常经验中习以为常的一部分(Prensky 2001；张秀丽 2010)。我的核心论点是，对于这些留学生来说，造就墨尔本的(或者，我们可以说，他们塑造墨尔本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跨地域的媒体联系的扩散。我希望阐明，对他们而言，墨尔本是如何被日常生活的彻底媒介化所塑形，尤其是在棉棉所说的智能手机访问的各种社交媒体中。包括智能手机等通信技术在内的无处不在的移动和数字媒体环境，在最基本的经验层面上影响着我们对地方的体验。因此，日益强化的日常生活媒介化——尤其是通过移动设备——意味着在体验层面上，我们对一个地方的感受会从实质上发生转变，因为身体的体验和数字的体验相互交织、混合和转换(de souza e silva 2006；Silver Stone 2008:110-111；Lee 2010)。更具体地说，无处不在的媒体联系加强了跨地域的影响，使我们对居住地方的感受越来越不为地域所限制，而越来越多地受到与其他或远或近的地点相连接的广阔网络所影响。我们现在就转向对这一过程的分析。

移动场景

在我的研究项目开展的四年间，微信是生活在墨尔本的参与者的日常生活中最普遍、最具塑造性的应用程序（它也是本项目核心、有效的研究方法）。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每天都会多次使用微信，它是压倒性的最受喜爱的社交媒体平台。中国学生线下生活中的内部社区网络——合租公寓、选修相同的课程，在相同的企业工作——都反映在他们的微信联系中。对于这些社交联系的用户来说，其数字可视性让他们觉得墨尔本是个小地方：一个紧密联系的村庄式社区，“所有的人都互相认识”。

墨尔本学生移民使用微信的方式来源于他们先前在中国的使用习惯。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应用程序已经成为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核心。对于微信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社会、哲学意义，孙玮教授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丰富的理论研究。孙玮从海德格尔现象学对日常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地方性和主体性的理解出发，提出微信对空间体验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中介作用，意味着它可以被理解为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的“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孙玮，2015）。孙玮强调了微信的特殊性，将其与传统媒体和其他形式的新社交媒体（如微博）区分开来。这些特殊性包括微信依托智能手机的移动性、基于熟人或从属关系的多用户群体（微信群）的典型用户体验，以及它对其他新旧媒体提供的几乎所有意义、功能、形式的融合。基于这些特点，孙玮认为微信能够催生三种新的现象：移动场景（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融合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新的、融合的“场景”，这种“场景”既可随用户随意移动，也可在不同类型的“场景”之间穿梭移动）；实践的地方（一种全球化的地方感，产生于人们对应用程序的日常使用，并标记在其打开的屏幕图像中）；节点主体（不是指运用技术手段的操作主体，而是指如前文棉棉所描述的那样，是作为连接到多向交织的媒介技术网络的一种功能而产生的主体）。

在我看来，孙玮的论述中最有趣的是她对移动场景的讨论。她写道：

移动场景表明了这样一种状态，一个人可以同时置身于多个场景中，场景是随着人而移动、交织、拼贴、融合的，而且在这个场景中充满了即刻的互动。所谓移动，有两重含义。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实体空间之间的往来，人带着手机伴随微信，从一个物理场景移动到另一个物理场景中，这种移动展示的仍然是线性关系。移动的更深刻涵义是，人在物理场景、大众媒介场景、微信熟人圈等多个场景的频繁穿梭，形成了多重场景并置、交叉、融合的状态。（孙玮 2015：10）

换句话说，移动场景是图像、声音、社会关系和情感的集合，它通过用户在微信上用文本、图像、视频和语音时时刻刻进行互动不断地组合和重新组合。当人们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时，这种融合的场景会“随着人们一起移动”，并与他们所处的物理空间体验交融在一起。

孙玮将微信能“伴随”用户的另一原因归结于其“群”功能所产生的归属感，藉由这种归属感，人们在基于某种特定联系的虚拟社区中建立并保持对话。孙玮的研究案例是过去的同学群和校友群。我的研究项目中，参与者也加入了各种微信群：在某所大学攻读同一专业的中国学生群、居住在同一个澳大利亚城市的中国学生群、小组作业群、贸易活动群（代购）、亲属群，还有一些兴趣导向的同城群，比如猫本（墨尔本）吃货、好友群以及本研究本身的群。关于“群”功能，孙玮写道：“微信使用的最大特点，是群体感在日常生活中的伴随性”（孙玮 2015:13）。群体归属感，就像移动场景一样，“伴随”用户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跨越着不同的物理地点。孙玮还进一步将地理上的流动与微信对群体感的强调联系起来：“微信创造的特殊地方感在于，它在打破边界的同时营造了个人、群

体在地化的归属与认同。”（孙玮 2015:14）

孙玮的观察意味着，微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与地理位置解绑（微信移动场景“伴随”着移动用户；打破社会联系的空间边界），同时，它又可在特定群体中重建一种不同的归属感。正是这种与地理位置的解绑和虚拟归属的重建，构成了孙玮所谓的微信地方感的特殊性——或者说，在其论述中微信本身就是“作为一个新型的地方”（2005:14）。

孙玮将微信理论化为一种新的“在世存有”，这对我思考移动数字媒体、公民身份、城市空间和流动学生之间的关系帮助极大。然而，值得注意的两点是：

首先，孙玮的文章设置了一个中国的框架（而移动场景超越国界和打乱传统地理位置的能力，会让情况变得复杂很多）。她最终乐观的结论是：微信产生了一种想象的“群体的共同在场”“人类社会的一种崭新的‘共在’感”（2015:18），这里她诉诸的是一般“人类”，但是其分析框架却完全是中国的，并且，她有时又会将微信作为一种改变中国大陆社会生活和主体性的技术来呈现。这样一来，把孙玮的思考延伸到在中国之外旅行和生活的微信用户，就将是饶有意味的。在本文的案例中，棉棉这样的用户虽然进行了跨国移动，但却持续参与着微信构建的移动场景，这一移动场景是以中文为互动语言，而参与者无论身在何地，也几乎都同样来自于中国。那么，个人的跨国流动将如何与微信的原始国家的移动场景相互作用呢？其次，我们或也应将孙玮的思考延伸到更多的应用程序，尽管微信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但用户通常会使用多个平台。的确，当我（通过我们的微信群）与研究参与者讨论时，孙玮关于微信群能让人感觉日常生活时空中一直有朋友“伴随”的观点，在一个游戏玩家晓娟那里得到印证。² 群功能

.....

2 此处“晓娟”音译自原文“xiaojuan”。

确实让晓娟感到她的游戏玩伴们“伴随”她来到澳大利亚，但是他们使用的是 QQ 群，而非微信。这样的例子提醒我们，研究人们交际活动的有效途径不应是基于个别的平台，而是要通过多元媒体的视角，把“新媒体作为一个供给环境”来看（Madianou, Miller 2012）。换句话说，新媒体的移动场景可能不仅仅是使用微信的结果，而是类似晓娟所使用的包括在线游戏、QQ、微博等在内的多元媒体的结果。

到目前为止，我所提供的材料可能会被当作是对移动社交媒体负面社会效应的支持。像微信、游戏、微博等跨国移动媒体，是否会将留学生封闭在与澳大利亚公共生活严重脱节的碎片化的媒体圈中？我认为，如果我们从人们在城市空间的切身居住体验来思考数字公民的问题，可能会看到另一番图景。

在早前我与法扎勒·里兹维（Fazal Rizvi）合写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深入探讨了中国社交新媒体的跨地方特征（Martin, Rizvi 2014）。微信、微博、QQ 等的确都是中国开发和运行的应用程序，里面有很多许多留学生的联系人和国内熟悉的媒体内容；然而，当留学生在城市与郊区的实体空间穿梭时，他们使用智能手机时也常常会介入公共空间。就此，我们认为：

“外面”（国外）和“家乡”（国内）都变得碎片化、去区域化了，二者交织在一起，因为这一代留学生所居住的墨尔本，从根本上来说，是为波动的、媒介化的、共存于此的“家乡”元素所塑造的。这样的看法超越了媒体将地方变得双面或多样的讨论……认为由于跨国媒体联系体验的普遍性，地方本身的意义发生了更根本的转变。（2014：1018）

在这里，我们的观点与孙玮的移动场景概念有些共通之处（孙玮 2015）。然而，重要的是，我们认为跨地方社交媒体融合“这里”和“那里”的能力，并不意味着它们会将留学生从他们学习的地理城市中排除出去，恰恰相反，它们可能提供的是一种“进入城市的方式”（Georgiou 2011）。用孙玮的方式来说，这些海外用户的移动场景整合了墨尔本本地的元素，在很大程度上，在空间和社会意义上都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侨民中实现了本地化（孙玮 2015）。能佐证这一点的是：微信和微博等应用程序最广泛使用的功能之一，是帮助留学生在市区和郊区地理的微观层面上导览，来扩展他们的社会空间连接。这一现象尤其发生在学生订阅一系列公众号时，这些公众号为他们提供了有关天气、时事、食物、购物、一日游及娱乐等墨尔本生活多方面的新闻和信息。通过向留学生提供，告诉他们在墨尔本可以去哪里、如何去，如何理解和参与到当地人的活动中，这些功能特性可使“本地化”变得更为“纯正”（Thickening）（Andersson, 2012 年）。

这些观察让我开始反思，与中国留学生一起进行研究，沉浸在他们的数字媒体世界中，墨尔本——这个我成长并居住了几十年的城市——对我而言，发生了哪些改变。当我走在我所任教的大学校园周边的近郊街道，我开始特别留意从几个咖啡馆（七粒种子、微光、黑星糕点、露恩羊角面包店）里鱼贯而行的中国学生队伍，我从微信朋友圈得知这些都是中国“网红”喜欢的“网红店”，他们尤其迷恋风靡的早午餐文化（早午餐对中国学生来说，远比对当地人来得重要）。我也开始留意那些无处不在的快递店，学生们在里面把代购的维生素、奶粉和日用品打包寄回给中国的客户，并通过微信朋友圈状态不知疲倦地做着广告。我开始根据 86 号有轨电车的站数来思考附近社区的位置，（31 站附近，而不是诺斯科特（Northcote）；50 站，而不是邦多拉（Bundoora），等等），因为这是中国学生的在数

字媒体上的房屋出租广告里使用的说法。我眼前的城市图景逐渐呈现出改变，让我想起了加桑·哈格（Ghassan Hage）的“透镜体”理论，这是他在思考黎巴嫩移民在澳大利亚城市的生活世界时使用的一个概念：

透镜是一种图像，它如何呈现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想想那些表面粗糙的明信片，它们的图案会根据观看的角度而改变[...]. 与普通照片中拍摄的单一图像 / 现实相比，透镜表面包含着多重图像 / 现实，它们根据不同的视角呈现。[...] 透镜表面并不是只有一幅图像，随着观看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它包含许多 [...] 图像 / 现实，只有在观看的过程中找到一个特定的角度，某一个图像才浮出表面得以呈现。（Hage 2016）

在数字媒体的移动场景中，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交织在一起所呈现的正是这样一种透镜状的地理环境。透镜图像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内部移动——来移动的场景。它是一种城市的图像，展现着城市内部的多副面孔，其中有些适宜居住，有些不适宜，有些是开放的，有些是封闭的，这取决于你观看的视角和位置。

在留学生自己的社交媒体发帖中形成的澳大利亚城市与地方图景，本身也具有多重性和透镜性。首先，我们可以从学生的朋友圈更新中，观察到一个我所谓的“消费者城市”：充斥着没完没了、随时摆拍的早午餐美学，以及与朋友们的城市内外之旅。消费者城市的逻辑呼应了中国与澳大利亚政府、机构话语对这些流动中产阶级年轻人的质询，他们藉此学会将自己理解为主体，而不是政治参与者。另一方面，作为代购地的城市又是一个微型企业的城市，其视觉图景主要由超市和折扣药品店的内部照片构成，在那里，代购者仔细地拍下自己手持出售产品的照片，以证明这些产品是他们亲自从澳大利亚卖家处购入的（绝没有食品和药品安全的风险，而正是中国食品和药品安全丑闻首先为代购创造了市场）。第三，这里还

有一个反身性情感（reflexive-affective）的城市：一个特定的景观、味道和氛围会引发初步情感联想连锁反应的地方，人们的 Instagram 和微信朋友圈里充满了渴望、怀旧、爱和其他难以分类的情感。最后，当种族主义袭击和其他街头暴力犯罪的影响瞬间在整个数字社区激起涟漪时，这里则变成一个恐惧之城。小报式的微信公众号上耸人听闻的报道导致学生们躲在公寓里，避免晚上外出，害怕独自一人穿过城市、郊区。留学生数字媒介中的恐惧之城作为一种暗地，与“当地”城市居民——特别是那些被视为白人的居民——所体验的安全友好的城市伴生共存。

结语

我们可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框架来思考本文所讨论的数字制造的世界（world-making），这取决于我们采用哪种途径。一方面，这些数字实践，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共同国家背景人群的社会聚集，可以被视为澳大利亚保守派评论人士仇外的原因例证，他们担心移民聚集在一起——包括在他们的数字媒体世界中——因为移民的价值观和利益“与我们不同”。然而，我希望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一框架忽视了两个重要的考量。首先，它忽略了一种社会现实，即留学移民是在社会排斥的驱使下进入他们自己的微观世界（线上和线下），去寻求友谊和社会支持。其次，过分地以自己的公民为核心，忘记了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身上的（包括但绝不仅包括移民）不可避免的跨国归属感。正如我试图说明的那样，如今，跨国数字媒体是中国留学移民在澳大利亚城市生活的先决条件，它发展出一种另类城市地理，在这里，一个人对城市的权利是可以想象的，就像他的主体性和意识一样，与他跨越地方与国际多个空间和社区中的归属感交织在一起。回到我之前通过孙玮的研究提出的问题（“个人的跨国流动如何与微信的

原始国家移动场景相互作用？”），本文一直在试图展示，我的研究参与者使用移动数字媒体（包括微信和其他平台）的很多实践（即使不是大部分实践）在本质上并非就是国家性的。相反，大多数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移动社交媒体时，民族、国家的问题都因其对地方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跨地方的）专注吸纳而被淡化了：微观层面的物质和情感纹理，以及一个人所处或者所忆的特定地方的感觉不断延伸，将墨尔本和家乡连接到一起。社交媒体的状态更新是鲜活的，因为其中充满了具体的、日常的、因一个馒头而激起的思乡之情，金色的叶子在夜光中唤起的忧郁，一个朋友，一杯咖啡，一朵云彩，一曲旋律，一片记忆中城市窗外的模糊景色。如果我们能把这看作是一种数字公民的形式，那么，与其说这是一个国家范畴下的抽象实体，不如说是一个由多重社会 and 空间归属感（以及疏离感）构成的网络。数字社交媒体的移动场景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绕开国家，将日常的、切身的地方体验与跨国层面的文化联系起来。这种对跨地方数字归属的概念化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公民、地方、流动性、主体性以及城市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时代而言是非常紧迫的。

参考文献

- Andersson, Magnus. 2012. "Media and Migr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Mediat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 ICA Virtual Conference. Phoenix. http://www.icavirtual.com/wp-content/uploads/2012/04/No24_Andersson_VC_Template.pdf
- de Souza e Silva, Adriana. 2006. "From Cyber to Hybrid: Mobile Technologies as Interfaces of Hybrid Spaces." *Space and Culture* 9 (3): 261-278.
- Georgiou, Myria. 2011. "Media and the City: Making Sense of Pla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Politics* 6(3): 343-350.
- Hage, Ghassan. "Lenticularity: On the Entanglement of Realities," paper presented at Crossroads in Cultural Studies Conference, 14-17th December, 2016, Sydney.
- Lee, Dong-Hoo. 2010. "Digital cameras, personal photography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spatial experiences." *Information Society* 26(4): 266-275.
- Madianou, Mirca and Daniel Miller. 2012. "Polymedia: Towards a new theory of digital media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6(2): 169-187.
- Martin, Fran and Fazal Rizvi. 2014. "Making Melbourne: Digital Connectivity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perience of Localit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36 (7): 1016-1031
- Prensky Marc. 2001.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On the Horizon* (NCB University Press) 9(5), 20 October.
- Silverstone, Roger. *Media and Morality: On the Rise of the Mediapolis*, Cambridge and Malden, Polity: 2008.
- Wilding, Raelene. 2006. "'Virtual' intimacies? Families communicating across transnational contexts." *Global Networks: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Affairs* 6.2: 125-142.
- 孙玮. 2015. 《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学术月刊》第47卷，总第559期（12月）：5-18.
- 张秀丽. 2010. 《九0后一代大学生特点浅析》《读写算》第一卷：5-7.



体制内的功夫：实现目标的艺术¹

■ 墨美姬*

张淳**译

在过去的人生中，我有幸参与了一些机构组建的项目。当然，也有过一些比较“现实的”人警告说，这些项目不太可能成功。20世纪70年代，那时我20岁出头，我在悉尼与女性主义者、同性恋解放运动和反精神病学²的朋友一起，为“野性出版”（“Feral Publications”）小组工作。当时我们的工作没有学术上的认可，也没有报酬，在世界范围内，我们是最早一批将福柯和德勒兹的著作翻译成英文的人；曾经有一位老师愤怒地警告我说，我以后会成为一名“银行职员”（这是他在1974年能想到的最糟糕的工作）。1975年至1978年，我在巴黎第八大学（University

* 墨美姬（Meagan Morris），悉尼大学性别与文化研究系教授。

** 张淳，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研究兴趣为文化研究、批判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电影。

1 本文为墨美姬教授在2018年上海大学举办的Crossroads文化研究双年会上的闭幕演讲。

2 “反精神病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场重要的社会运动，受到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R.D. 莱恩（R. D. Laing）和大卫·库珀（David Cooper）思想的影响。如今已基本被遗忘的是，它认为对“精神病人”的管束是对社会上持不同政见的人行使政治控制，而不是帮助精神病患者，它在反对精神病院监禁、电击治疗和对病人使用药物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他们与同性恋解放活动人士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反对使用“厌恶疗法”来抑制同性恋的欲望。

of Paris-VIII Vincennes) 攻读硕士学位。这是一所激进的大学，以招收低技能的移民工人而闻名，他们有两年的工作经验，还拥有高中毕业证书。³ 当时许多最著名的法国思想家都在那里教书，但政府取消了哲学学位，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听课而拿到学位（德勒兹会说：“人类不能辜负哲学”）。二十年后，我再一次从事义务工作，担任《轨迹：多语种系列文化理论与翻译》（Trace: A Multilingual Series of Cultural Theory and Translation）的高级编辑。这本书以英文（香港）、日文（东京）、中文（南京）和韩文（首尔）出版，而且主持了四种语言的会议，而我只懂其中一种语言。我所担任的最持久的义务工作，是自1992年亚洲文化研究运动开始以来的事业，我一直参与其中。因此，我在2000年后在香港工作了很多年，担任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的讲座教授（Chair Professor）——这里是中文世界第一个授予文化研究学位的地方。

我从这些经历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如何从事实验性的工作，如何随着环境的变化来处理损失。其中一个教训就是，永远不要因为那些悲观的、无所事事的现实主义者而感到气馁。与此同时，我也认识到，你不可能永远成功，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当时的情况如何，也不管你自己的社会定位如何。预知到哪种风险是值得冒的，以及什么是实现目标的时机，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可以通过实践来学习，但是为了实践，你必须冒险，你必须愿意承受失败。一般来说，“现实主义者”不会冒险，因此他们不会学习，也不会发展新技能。他们对每一个机会都重复同样的反应（“哦，那行不通”），而这是陷入徒劳的犬儒主义循环的基础。

然而，走到另一个极端，对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具体情境中的障

.....
3 我在这篇文章中有所涉及：“In Praise of Experimental Institutions: After May 1968” in Philip Morrissey and Chris Healy, eds, *Reading the Country: 30 Years On* (Sydney: UTS ePress and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91—101. <https://epress.lib.uts.edu.au/books/reading-country-30-years>

碍和困难故意视而不见，也没什么帮助。例如，我刚才提到的那些项目所隐含的风险，就是对文化陌生人的敞开，以及遇到无法预见的事件。如今，劳动的不确定、绩效要求以及对空闲时间的无情侵蚀等等条件，使得学术工作者难以承担任何“外部的”、不是包含在本职工作之内的风险。西方“福利条件”和社会主义“铁饭碗”都被席卷而去，对不稳定的担忧与这些条件本身，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都在情感上以一种持续压力的形式将这些风险植入我们的内心：我们大多数人都在随时失去工作、以及其他威胁到安全的“风险”中度日。对于不了解其他就业模式的年轻学者来说，忽视这一点是鲁莽的，也是不切实际和迟钝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想要设想其他道路，我们必须能够认识到，我们目前所处的经济体制在历史上有限和短暂的，并对之进行讨论。

为了促成这一讨论，我想通过一个曾经代表了流行文化中的乐观主义和创造力的人物波莉安娜（Pollyanna），来思考日常英语使用中所经历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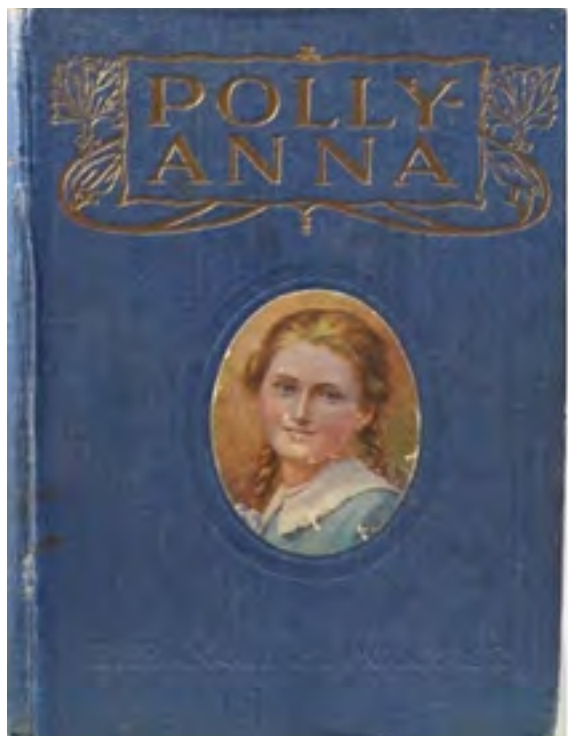


图1 小说《波莉安娜》于1913年出版

《波莉安娜》是美国作家埃莉诺·波特（Eleanor H. Porter）1913 年出版的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孤儿的故事，她积极的态度使她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茁壮成长。小说出版后，出现了不少于 15 部的续集，都是由不同的作者创作的，而且被多次改编为电影（1920 年、1960 年、1989 年、2003 年）和电视（1973 年，英国；1986 年，日本；2018 年，巴西）。稍后我会回到最初的故事，但我首先要说的是，在今天的日常英语中，“波莉安娜”（“Pollyanna”）是一个堕落的乐观意志的形象。她成为了一个负面形象，不管是母语人士还是外国人，不管他们是否知道这部小说，都学会用她作为一种愚蠢态度的代名词。没有人想被别人称为“Pollyanna”。因此，一个英语词汇学习的网站“A.Word.A. Day with Anu Garg”给出了这个例句：

“因此，积极思维的意思并不要求闭上眼睛，遮住耳朵，对世界不闻不问。这并不要求你成为波莉安娜，认为一切都是美好的，不管实际上多么可怕。”——“关于消极思维的思考”，《德干纪事报》（印度）；2012 年 9 月 16 日⁴

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很明显，《德干纪事报》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解释“积极思维的意思”，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波莉安娜也意味着消极，一种你不想采用的过度乐观。

波莉安娜作为一种修辞的形象，传播着一种天真乐观主义价值的低级犬儒主义，进入了社会科学的领域。在经济学中，“波莉安娜”一词指的是政府为了使国民经济形势看起来比实际情况好而调整统计数据的一种方式。⁵ 这个用法可以延伸到将灾难性的变化和彻底的失败描述成一个美好

4 <http://wordsmith.org/words/pollyanna.html>

5 参见 Condor Options, “Tinkering with Inflation Calculations: The ‘Pollyanna Creep’ Phenomenon”, April 16, 2008, <https://seekingalpha.com/article/72535-tinkering-with-inflation-calculations-the-pollyanna-creep-phenomenon>。

的未来,给人们呈现光辉的愿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所说的贸易战会“轻松获胜!”,以及快速修复与朝鲜和中东关系的假象,都是“盲目乐观者”。然而,图4中的“悉尼轻轨”的图像呈现了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的这种症状的平庸版本。该项目于2014年底宣布,旨在通过在中央商务区恢复有轨电车服务,缓解交通拥堵,改善行人体验,并创建优雅的城市景观,左上角艺术家所描绘的图片呈现的是这样的愿景。这个大型建设工程本应在2018年4月前完工,但很快就被推迟了。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完成时间被推迟到了2020年5月,而我们现在实景就是左下角的图片。作为一名长期居住在香港的居民,我在道路施工方面很反对“盲目乐观者”;在我多年沿屯门公路行驶的过程中,总是见到挖掘工程和路障,它们从一处移到另一处,从未停止。右图向我们展示了原因:在旧停机位被掀开之前,没有人真正知道下面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历史上分层的公用设施系统(这些系统可能已经被绘制出来,也可能没有)是如何与树根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

93

体制内的功夫：实现目标的艺术



图2 波莉安娜讨厌鬼(Pollyanna Creep):悉尼轻轨系统(Sydney Light Rail)。

我喜欢这幅深沉而浑浊的纠缠画面,因为对我来说,它生动地展现了文化研究工作的厚重媒介和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在一

个情境——包括环境、政治、社会、经济以及任何我们决定称之为“文化”的东西——中起作用的所有物质力量是如何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它们来自于哪些不同的地方，标志着什么样的变化，承载着怎样的历史痕迹？朝着这些边界之外的哪些方向发展，它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以及我们如何判断在何处进行干预是安全而明智的？干成一些事情需要这种特定的思维，而这种在泥淖中工作的必要性将文化研究与具有清晰脉络、宏大视野和光鲜愿景的“文化理论”区分开来，人们有时会把我们与“文化理论”弄混。当然，文化研究依赖于理论所提供的分析、视野和预测。但仅凭“理论”无法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一棵树的树根是如何影响这条水管的，以及，如果不小心切断了当地的住宅管道和通讯服务，该怎么办。

“波莉安娜讨厌鬼”（ Pollyanna Creep ）一词首先出现在经济学中，是一种向前看的对未来的幻想。在心理学上，“波莉安娜式的盲目乐观原则”美化了过去。这个短语指的是选择性记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所记住或想象的个人、公众或国家的过去，比真实的过去好得多。例如，我的母亲会真诚地使用这种陈词滥调：“我们很穷，但很快乐！”来描述她在1929年至1939年的大萧条时期，在当地一个矿工家庭中度过的童年。根据这种心理学，大多数人倾向于这样做，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的事件和环境的混乱细节从我们身边退去，只有那些倾向于认为前景黯淡的人才会抗拒盲目乐观的原则。这些人被认为会因“压抑的现实主义”而痛苦，这种性格在很多时候让人感觉很糟糕，但也让他们对世界上的事情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这些想法太简单了，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的目的只是举一些在日常用语和专业语言中常见的不相信乐观主义的例子，并找出这

种不信任所造成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倾向于假设乐观主义只是一种妄想，我们如何为行动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基础？“压抑的现实主义”可能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默认设置。在学院里，常常会有人无法耐心地以一种热情的精神长期致力于一个建设性项目，这是很常见的。压抑是孤立的，就好像除了“做我自己的工作”之外没有其他目标一样，孤立使人们丧失实际思考的能力。传递由投入工作带来的“感觉良好”的能量的能力可能是短暂的，而且总是受到当地周围条件的限制。然而，这样的时刻能够让集体坚持到底，并为体制给我们带来的困难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图3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同仁合影

我是在与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同事一起工作时了解到这一点的重要性。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机构创新时刻的照片，是经历了一整天漫长而痛苦的“战略规划”之后拍摄的。正如大卫·格雷柏（David Graeber）在《狗屁工作：一个理论》中对新自由主义管理下的劳动进行描述的那样，我们这些“仍然把自己首先当作教师和学者的人，也开始害怕‘战略’这个词，因为它是企业管理技术的一个主要手段，‘渗透到学术生活’的一个主要手段”。⁶ 我们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我

6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A Theory* (London: Allen Lane, 2018), p. 53.

们将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评估和证明（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而实际去做的时间却越来越少”。这张照片拍摄于2007年，当时的情况尤其糟糕，因为我们被高层管理人员告知，要撤销我们花了巨大精力创建的文化研究项目，该项目经过7年的实践才刚刚开始稳定下来。我们不得不编写一个全新的课程，减少学分，以调整和适应我们设计之外的整体学位的要求。不过，我们还是照做了，白板上写的是当天的结果。

我是否沉溺于“波莉安娜式的盲目乐观原则”，深情地回忆起十多年前的这一刻？不。你在照片中所看到的可爱的笑容和滑稽的姿势并不表示“乐观”，如果“乐观”指的是天真地相信既然我们已经完成了战略规划工作，一切就都会很好。我们知道，在下一轮的战略政策改革中，我们的劳动成果将荡然无存。我在这张照片中看到的是一种集体喜悦的表现，我们成功地运用我们的技能制定了一个符合大学要求的计划，同时为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创建了一个可行的框架。快乐是短暂的，结果无法预测。然而，它所释放的能量可以为接下来在体制内的空间中为你真正珍视的目标而努力提供一个基础。无论一个人的性格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都与技能的培养和运用无关，而这就是我所说的体制功夫。

巧的是，埃莉诺·波特小说中的波莉安娜特意实践了某些技能，下面我将回到她的例子。首先，让我借用小说家、环保活动人士和评论家陈冠中(Chan Koonchung)的一篇文章，进一步谈谈我所说的体制功夫是什么意思。这篇文章将广东话的Kungfu(“技巧”)与古希腊语的techne(“工艺”或“艺术”)进行了比较。我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今天的冒险对于学术生活来说既困难又不可或缺，那么什么样的技能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对自己周围环境之外的开放性（如果没有这种开放性，文化研究就会变成一堆杂乱无章的学科碎片）？为了思考这个问

题，我将简要地回顾早期的“风险”举动：亚际文化研究的创建，然后在结论中，我将报告我曾经做过的一个非正式的研究，以其中同事们的智慧和经验回答这个问题，在今天，作为一个思想开放的、向外界敞开的学者和教师，如何在各种机构中生存和发展。



图4 《少林弟子》(1975)

当我们广东人称赞一个外科医生的“功夫”或“技术”，我们所说的是通过勤奋学习得到的技术，是一种巨大的能力，包括书籍、理论、技巧、实践经验、重复训练、艺术、想象力、身体和灵魂、即兴创作、耐力、专注、伦理和道德品质、责任、承诺、诚信、奉献、敬业精神、良好的机构、骄傲、团队合作、智商和情商，以及一个坚定的服务意愿。——陈冠中《功夫仔》⁷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 Kungfu(功夫) 指的是通过练习和努力培养出来的一种技能，而不仅仅是武术。英语世界的人也越来越清楚这一点，尽管我们对这个词的熟悉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初香港功夫电影的流行，

7 Chan, Koonchung, *Living out the Contradiction of Our Time* trans. Alan Chan and Richard Hsiao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nd Jockey Club Design Institute for Social Innovation, 2014), p. 47. .

尤其是李小龙的电影。(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词在英语中是“Kungfu”，沿用了韦德·格尔斯(Wade Giles)的音译，成为主流的用法)。⁸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冠中列出的构成外科医生的功夫或“技术”的那些素质和经验，乍一看似乎对今天过度劳累的人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如何才能获得陈冠中所描述的所有“勤奋学习和巨大的能力”？然而，仔细琢磨和回顾他列举的这些术语，很明显，任何致力于良好的学术型教学、研究和服务的人都获得了这一套技术和能力。我们每天都在开发和使用这些能力。

这个列表中比较奇怪的一项是“良好的机构”。正如陈所说，一套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是一个高质量机构的“成果”，这一点很容易看出：好的医学院培养出优秀的外科医生。然而，与陈冠中提到的其他因素不同，机构的质量并不是投入的训练、道德的社交和自我修养的产物。很少有年轻的学者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生涯从哪里开始，大多数学者总会出于举家搬迁的困难或其他各种原因，最终都不得不适应他们所在的或好或坏的机构。此外，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与机构的历史传统和其所沿袭的地位相互作用，形塑着各种机构。领导层的变化和管理理念的转变，使机构也常常面对突然的变化，这些变化从根本上影响了它们的质量，这往往比其“品牌”受影响的速度快得多；古老而著名的大学实际上很可能是糟糕的机构。然而，也许正是这种机构的广博性，以及它们承载和接受公共生活的所有复杂影响的方式，使它们作为陈冠中《功夫仔》的生产者具有其重要性。

当陈冠中谈到广东话的功夫与西方古典的技术概念的相似性时，这点的意义就更加明显了。显然，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异，尤其是因为功夫在粤语流行文化中是一个活跃的概念，而 techne 的使用范围已经缩

8 英语中使用“gong fu”或“gung fu”，而不是“kung fu”的复杂情况，参见 Paul Bowman, *Mythologies of Martial Ar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17), pp. 84-90.

小，变成一个如今主要为学者所知的专业术语。然而，借鉴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陈指出，在古希腊思想中，“‘techne 这个词通常的意义与‘运气’相对”。⁹ 远比现代英语中这个词的衍生词“技术”和“技巧”的涵义范围更广泛，techne “不仅包括建造房屋、种植、狩猎、畜牧、铸铁、造船，而且还包括语言、写作、创作和文学性的设备，算术、天气预报、梦的解释、预言、知识、理论等等。”换句话说，“任何将人类从纯粹运气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的东西都被称为 techne，其目的是帮助人类追求幸福，过上更安全的生活方式。”因此，techne 涵盖了伦理、管理、政治，以及后来的精神锻炼、行为和道德。

陈冠中总结了这种对 techne 的古老而全面的理解与民间功夫概念之间的重叠，他的结论是：“相对而言，美好的生活应该排除厄运，实现通常意义上的技术，包括建立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机构。”¹⁰ 从最广泛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点，我们可能会猜测，陈冠中所指的机构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命运赋予我们的，已经存在于社会图景中现成的或好或坏的机构。相反，它们的品质是由我们自己的创造性工作产生的——就像构成高超的功夫训练和养成的元素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在现有的环境和框架中进行“创建”工作。例如，我在上面讨论的战略规划日是在岭南大学的一个已经成立的机构内举行的，但它是根本性的，因为我们能够利用这个机会为集体创造一些新的和好的东西。

这个例子对我的论点很重要，因为它很平常（一个系的聚会，一个白板），也是之前“情感劳动”的产物。如果没有与同事共享的美好精神，很难持久地获得积极的成果，而维持这种精神需要付出努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的体制功夫想要成功，陈冠中列出的一些“重要的能力”必须提前得到锻炼：耐力、专注、责任、承诺、奉献、专业、

9 Chan, Koonchung, *Living out the Contradiction of Our Time*, p. 48-49. 此段引用均出于此处。

10 Chan, Koonchung, *Living out the Contradiction of Our Time*, p.55.

自豪、团队合作、“智商和情商”，在此仅举这几个例子。（在我看来）还需要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一种由实践经验训练出来的“智商”，可以使我们理解我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劳动，这样我们就能想象地掌握在现有条件下可能采取的行动。让我们把这称为一种“明智的清晰愿景”，一种在体制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品质，就像在拳击或象棋等技能游戏中一样。有时，当正确的条件具备，而且具有清晰的远见和创新驱动的人们认识到这个正确的条件时，就是卓越的成果得以实现的时刻：也就是说，成立新的机构，产生其他时刻不可能形成的社会和政治项目。



图 5 作者与文化研究友人的合影

“亚际文化研究”运动就是这样在 1992 年和 1995 年由陈光兴和一群朋友在台北组织的几次小型会议（“轨迹计划”）中发展起来的。¹¹ 从 1998 年开始了持续二十年的区域性的集体努力（利用各种资金，同时借助志愿者和临时工），到两年一次在亚洲不同城市召开的亚际文化研究

.....
11 参见文集： *Trajector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Kuan-Hsing Chen with Hsiu-Ling Kuo, Hans Hang and Hsu Ming-Chu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协会双年会；2000年，创办了一份国际期刊，如今已被权威索引收录，并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到以设在韩国首尔圣公会大学亚际文化研究所(CIASCI)为中心的研究中心网络的成立；在课程建设、学生交流和在线教学方面开展合作实验，由地方和区域社会运动网络和非政府组织的联系提供支持；两年一次的暑期学校和一些为年轻学者举办的“教学营”。经过长期的努力，这其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变成了一个小型机构。2011年，一个正式的亚洲文化研究会成立了，它是一个伞形组织，拥有注册会员、一个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和一个位于香港岭南的国际办事处。

我们的学术选集中有一些关于这一运动的描述。¹² 与其重述这个复杂的故事，不如让我从 *techne* 的两个方面来谈，正是 *techne* 造就了亚际的成功。首先，重要的是，这一运动不是单靠会议或文章建立起来的。当今的全球评估系统越来越迫使我们严格聚焦于专业的学术活动，而陈光兴和他的同志们所做的则是坚持不懈地建立相互的信任、承诺、忠诚和友谊，通过走访、讨论和了解当地情况以及不同地方的社会运动所关注的对象，携手让可能永远也不会认识的人们走到一起，或相互关照，或在事件的进展中分享思想。这项工作是陈冠中所说的“坚定不移的服务意愿”的一个典型例子。

我想强调的第二个方面涉及我所提到的“明智而清晰的愿景”，它导致了一种方法的创建。在美国或英国完成研究生学业后选择回国的学者中，形成了亚际的最初动力。上世纪90年代初，这并不总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就像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从巴黎回到悉尼，试图在那里运用我在国外学到的东西一样不那么容易。如果你有机会做出这样的

.....

12 特别参见 Kuan-Hsing Chen and Chua Beng Huat, eds, *Th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Meaghan Morris and Mette Hjort, eds, *Creativity and Academic Activism: Instituting Cultural Studies* (Hong Kong and Durham: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and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2); Tejaswini Niranjana and Wang Xiaoming with Nitya Vasudevan, eds, *Genealogies of the Asian Present: Situating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New Delhi: Orient BlackSwan, 2015)。以及，“Teaching Cultural Studies”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9:3 (2008), pp. 429-517; 十周年纪念特刊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1:2 (2010)。

选择，长期住在其他地方的经历会让你在回来的时候看到不一样的东西。陈光兴观察到，曾在欧洲或北美学习过的亚洲人共享一个“西方”大都市文化之都（我们都可以谈论福柯），但对周边国家的历史、当地的政治斗争和我们今天的邻居所面临的文化问题却知之甚少。对这些的探索是1992年“轨迹”的一个起点，在一个相关的宣言“来自外部的声音：新国际主义地方主义”中，陈设想了一个基于“地理和区域逻辑”而不是基于国家的项目，提倡“互相结盟、相互影响的人民的支持”，包括那些被民族主义边缘化的和不可见的群体——女性、种族和性别少数族群，例如，土著居民。¹³

下一步是提出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急迫的问题：欲望的缺乏。抽象地承认学习邻国的重要性是一回事，但真正想了解别人的经验和问题又是另一回事，这些似乎不仅离自己很远，而且比起我们自己的首都城市或者像纽约、伦敦、巴黎这样的全球多元文化的学习中心，它们要逊色很多。我们如何通过听演讲和读报纸学习参与到其中，这些演讲和报纸都是关于地点、人物和事件的，而在一开始我们可能感觉不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在1996年的一篇后续文章中，陈光兴设想了一种方法，不仅可以理解造成这种缺乏欲望的历史力量，而且可以采取实际步骤“摧毁”这种缺乏的原因，从而集体地对我们作为学者所共有的主体性进行改变：

这种新的国际政治道德的地方主义……试图从精神分析角度破坏欲望的自恋结构和“原始情绪”的神话（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质询），以敦促对话的方式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有意识地将他人内化，融合形成一个至关重要的复合体。¹⁴

13 Kuan-Hsing Chen, “Voices from the Outside: 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ist Localism”, *Cultural Studies* 6:3 (1992), p. 483.

14 Kuan-Hsing Chen, “Not yet the postcolonial era: The (super) nation-state and transnationalism of cultural studies: Response to Ang and Stratton”, *Cultural Studies*, 10:1 (1996), p. 59.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由殖民主义和冷战在亚洲造成的欲望与知识生产之间关系的观点，将有助于塑造陈的重要历史批判著作： *Asia as Method: Toward Deimperialization* (Raleigh,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虽然是用八九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偏理论的硬英语写成（不像陈光兴现在受到文学滋养的散文风格），这篇文章设想一种克服自我（自恋）和民族主义，使陌生人之间的“联盟、相互影响的支持”情感获得可能。这个方法很实用。例如，不鼓励亚际会议的小组设在一个机构内，也不鼓励讨论同一国家或省的问题。我们必须混合在一起：挑战在于构建主题，以便不同的“本地”视角能够走到一起。¹⁵ 更有挑战性的是，在最初的几年里，要求学者们对我们最初一无所知的地方、国家和问题进行公开回应，这种做法十分盛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激活我们自己的本土知识，重新构建它，以认真回应演讲者提供的内容，从而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我们最熟悉的问题。这就是在实践中“内化”他人的意思。

1960年，竹内好开始研究中国和印度如何应对现代化，从而了解战后日本所面临的问题。¹⁶ 通过“内化”彼此（不仅仅是一起吃吃喝喝），我们改变了自己的欲望：人们建立了友谊，而这些不是我们在历史中“注定”会拥有的（这里要记住，*techne* 是保护我们免受机遇影响的因素）。如今，既然亚际文化研究是一个成功但脆弱的机构，新同事们都在寻求常规的专业成就，这或许是最难维持的基本原则。撇开民族主义不谈，全球化学术生活协议中的一切都促使学者们远离与不知名人士的互动，转向“我的大学、我的国家、我的历史、我的人民、我的研究”这种自恋的自我表达。然而，尽管这一原则困难重重，但值得重申和捍卫。对这一原则的坚持使我有幸在生活中经历了一些最持久的文化转变。¹⁷

毫无疑问，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所盛行的条件（比如为文化项目

15 “地方”作为一种介入模式的灵活意义可以延伸到“跨越国界、区域、甚至洲际”（而不是空间上的一个有限的固定区域），参见 Kuan-Hsing Chen, ‘Living with tensions: notes on the Inter-Asia movement’,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1.2 (2010), pp. 311-318.

16 Yoshimi Takeuchi, ‘Asia as Method’, in *What Is Modernity? Writings of Takeuchi Yoshimi*, ed. and trans. Richard F. Calich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49–166. See also Kuan-Hsing Chen, ‘Takeuchi Yoshimi’s 1960 ‘Asia as Method’ lectur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3:2 (2012), pp. 317-324.

17 参见 Meaghan Morris, ‘Inter-Asian banality and educatio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1:2 (2010), pp. 157-164.

提供资金)使这一实验得以启动。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此外,在一些邻国(包括澳大利亚),当时有一种更为放松的学术生活方式,让学者们感到轻松和自由,他们可以尝试新事物,而无需事先承诺取得怎样的“成果”,这种感觉后来被新自由主义的审计文化和绩效要求挤出了大学。然而,感知这些条件,理解它们的潜力,然后找到行动的方法,就是我所说的“明智的”清晰的视野。这种能力是独立于特定环境的。它使我们能够掌握周边的环境,不管它们是什么。即使有时它让我们意识到,目前没有太多事情可做,我们也可以在其他任何时间和地点培养这种能力;它让我们有信心去寻找改变,抓住新的机会。

因此,最直接的问题不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复制或模仿曾经成功过的实验,而是:在你希望建立一个更好的机构的地方,现在的条件是什么?扩大、缩小或扭曲你的“地方”的边界,如何有助于改变定义和感知这些条件的框架?¹⁸你能从别人对类似情况的反应中学到什么,不管他们所面对的情况有多么不同?而且,在你今天的处境中,“自觉地内化他人”(如陈光兴所建议的)容易吗?如果不容易,是因为什么?你能做什么?

让我们考察一下与体制功夫实践相关的学术劳动条件。高等教育中的跨国共享政策(“全球化”)使我们今天的生活充满压力,而不仅仅是走我们认为是基于“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老路。我国政府正在引进“国际推荐期刊优先”、“不发表就淘汰”、“提高产量!努力工作!”在该地区大多数大城市(由于我们当地的开发商和资本家),住房负担能力形成了一场危机,在这个时候,它们要对年轻学者的随迁和就业不安全感的加剧负责。它们这样做的原因可能不同,正如采用这些政策的地方环境的多样性使政策执行产生不同的效果,即使是在一个国家系统内也会这样。然而,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全职学者都参与了这

.....
18 实际的实践,参见 Doreen Massey, “A Place Called Home?”, in her *Space, Place and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p. 157-73.

一实施。第一步是承认这一点，并批判性地思考我们该如何处理它。¹⁹

在这些政策所创造的跨国势力范围内，智力劳动已经发生了变化。曾经有一段时间，教育和服务人民（西方的“公共利益”）是学者的首要职责。上世纪 70 年代初，当我还是悉尼大学的本科生时，情况依然如此。我们的讲师大多博览群书，但除了参加当地的文化活动外，几乎没有人发表过别的东西。令我最受启发的英语文学老师 Bill Maidment 先生 (1924-2005) 没有博士学位，但他是一位教授文学批评的大师：博学、机智、原创，并能够通过对于当代澳大利亚人关注之事的解读，为我们激活英国历史的意义。将近 50 年后，在我的脑海中，我仍然能看到他站在讲台上，听到他的声音，他已经被我“内化”了。这些老师是文学教育学的实践者，在陈冠中的理解中，这就是功夫。他们大多努力学习，在大学毕业后对成人教育课程的投入中，他们确实表现出了陈所说的“坚定不移的服务意愿”。然而，他们有时间通过不紧不慢的阅读和修订讲稿来培养知识，磨练技能。他们没有做“战略规划”。他们不只是为了保住饭碗而大量炮制文章，其“中介者”的角色也不为人所知。他们不用面临业绩评估、常规课程和项目评估，也不用改写往年的“毕业生核心能力”(graduate attributes) 清单，以符合最新的管理术语。最重要的是，当他们回家时，没有电子邮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智能手机让他们一直忙个不停。

在上一节中，我向你们展示了 20 世纪 70 年代大学里文学功夫的理想化形象。虽然我的描述并非不真实，但正如上图所示，我排除了旧学院的一切沉闷、精英主义、限制性，以及（尤其是对女性而言）虐待。如图 4，亚历山大·傅申 (Alexander Fu Shen) 在《少林弟子》(1975) 中的训练序列，将少林之美从汗流浹背的重复性劳动中抽象出来。然而，

19 参见 Meaghan Morris, “On English as a Chinese Language: implementing globalization” in Brett de Bary, ed. *Universities in Translation: The Mental Labor of Globaliza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77-196.



图 6 香港功夫电影中的情感时刻

叶文峰认为，身体赋权的幻想，以及上世纪 70 年代功夫电影为工人阶级观众提供的“感官现实主义”，都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快速进程中生活和劳动的感觉相吻合。²⁰ 那么，看看图 6 中这些情感时刻的拼图吧，选自最近几部香港电影。²¹ 这些图片抽离了其叙事背景，但它们都展现了江湖中闪现的情感，它们发生在知识驱动的“新经济”时代——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以来（《少林足球》在 2001 年首映），中国的金融、信息和服务业蓬勃发展。这些电影都是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社会变革，它们的“感官现实主义”带我们穿越漫长、低调、漫无目的的生活场景，进入过去的电影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的抑郁和焦虑的地带。

这些形象是否与今天的学术工作者产生了共鸣？它们当然和我的经验有关；虽然我在我的职业中享有特权，但我也是那个在公共汽车上忧心哭泣的人，转过身去隐藏沮丧，疲倦地独自吃饭。压力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

20 Man-Fung Yip, *Martial Arts Cinema and Hong Kong Modernity: Aesthetics, Representation, Circula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57.

21 Stephen Chow Sing Chi's *Shaolin Soccer* (2001), Johnnie To Kei-fung's *Throw Down* (2004), Felix Chong Man-keung's *Once A Gangster* (2014), and Chapman To Man-chak's *The Empty Hands* (2017).

模式，影响到我们目前所处经济体系的各个部门，因为工人们必须满足不断提高的生产率需求，同时在长期不安全的状态下，尽管精疲力竭，仍要努力提高绩效。这是这个体系的一个结构性特征，我们将一个不可能的责任的重担个人化，并“内化”（用陈光兴的话说）一种焦虑的性情，而不是竹内好所实践的那种开放、探索的精神。我们可能会对自己的性格产生一种令人麻痹的焦虑：“我真的适合这份工作吗？”“我是否足够坚强，及时完成这一切？”“我是一个称职的学者吗？”或者，“我只是个骗子吗？”

关于所谓的“骗子综合症”，目前已有大量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这是一种信念，常常折磨着那些成就斐然的人，他们认为自己的成功不是应得的，是因为运气而非 *techne*，即自己的美德和和努力得到的。在严重的情况下，人们会因为害怕自己的欺骗行为被暴露出来而困扰。²² 对于学者来说，这种综合症的一个方面（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时有遭受）是对我们学术的深度和质量缺乏安全感。正如露丝·巴坎 (Ruth Barcan) 在一篇精彩的文章《感觉像个骗子，或，知道自己永远不够好的“好处”》（“Feeling Like a Fraud: Or, the Upside of Knowing You Can never Be Good Enough”）中指出的那样，这种感觉对教师尤其有害。²³ 当我在做其他杂事的时候写一篇演讲稿，当我在维基百科上查找比尔·梅德门特先生的时候，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见上面的脚注 21）。巴坎讨论了这种现象的一些“结构性因素”——当今大学的混合形式（部分是学术，部分是官僚，部分是公司）；“后学科”的培训；全球化；生产主义、过度工作的迫切要求；学术劳动的随意化，以及阶级、性别和种族等“社会因素”，都可能会破坏我们在大学里的归属感。然后，巴坎练习了制度功夫。她制定了“反思欺诈”的策略，使其成为一种教学.....

22 这一现象首先为两位女性学者所发现：Dr. Pauline R. Clance and Dr. Suzanne A. Imes. See the Wikipedia entry on “Imposter Syndrom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mpostor_syndrome

23 Ruth Barcan, Chapter 5 of *Academic Life and Labour in the New University: Hope and Other Choices* (Farnham, UK: Ashgate), pp. 191-216.

资源。这些包括通过在社交中与他人谈论这种感觉；通过公开地从错误中学习，认识到知识的局限性，并批判性地研究现代大学学术权威性质的真正转变，来分析它在机构中的作用。显然，这些策略在某些制度文化中比在其他文化中更容易采用。然而，同样的，真正的挑战是：什么有可能在你的工作中起作用？

露丝·巴坎寻找感觉像骗子的“好处”。那么，这是否让她成为了一个“波莉安娜”，在充满抑郁、焦虑和压力的学术氛围中追求乐观（“希望”）呢？是的，的确如此，但只有在特定的意义上，我们才需要回到埃莉诺·波特的小说中去欣赏这一点。



1920



1960



1986

图7 埃莉诺·波特不同时期的小说

我们不能误以为好的制度性功夫一定需要快乐的性情。这需要耐心、精力，或许还需要一点技巧，但无论是获得技艺，还是发展一种见多识少的清晰愿景，都不需要任何特定的性情。我认识的一些最有效的实践者在私人生活中都很忧郁。然而，分布广泛的“现代”文化体制使我们倾向于将个人的行为与性情（或“性格”）联系过于紧密。这是一种通过典型性（英语修辞学中的“转喻”）来组织社会肖像的文学现实主义制度。想想

跨语际传播的文学中的男性妄想人物——乐观、盲目——他们代表着在危机时刻指出我们的愚蠢的行为或思维：在法国，伏尔泰的《老实人或者乐观》中的(1759)邦葛罗斯(Pangloss)博士(“在理想的美好世界中，一切都是为了最好的目的”)；在英国，查尔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1850)中的米考伯先生(“事情总会有转机”)；在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1921-1922)中的“精神胜利”；在美国，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的小说《沃尔特·米蒂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1939年)中的白日梦想家。像波莉安娜一样，“沃尔特·米提”已经成为一种人格综合症的名字：这是一个在现实中少有作为却成天幻想着做出英雄事迹的人。

这一先例让我们倾向于认为，波莉安娜也代表了一种性格——阳光、天真，而且(正如《德干纪事报》(Deccan Chronicle)所言)“认为一切美好，无论多么可怕”。这一趋势被好莱坞电影中波莉安娜的形象进一步加强了，在其中，她被塑造成一个金发小天使。在我们的流行文化中，金发女郎通常与迷人的智力缺陷(“我的脑袋一片空白”的英文表达是I'm having a blonde moment)联系在一起。²⁴ 正如美国儿童文学史家杰里·格里斯沃尔德(Jerry Griswold)所言，《波莉安娜》似乎“很少有人读过，但每个人都不喜欢，主要是因为它的声誉”。²⁵ 为了不骗大家，我特意读了这本小说，而波莉安娜根本不是一个天真的甜心。她生活在一个全是白人的基督教社会里，而且在整个小说中只有一个简短的、疏远的黑人角色的描写，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生活在一个白人至上的社会里。然而，在她的世界里，波莉安娜像大头针一样锋利，善于操纵(对格里斯沃尔德来说，她是“美国儿童读物中出现的最狡猾的骗子之一”²⁶)，她是一个善良的活动家；她

24 一个颇具喜剧性的攻击，参见Robert Luketic根据Amanda Brown's的小说改编的电影*Legally Blonde* (2001).

25 Jerry Griswold, *Audacious Kids: the Classic American Children's Story* revised edi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50.

26 Griswold, p. 252.

知道如何让事情做成。她需要这样才能活下去。波莉安娜·惠蒂尔的世界一点也不“美妙”。小说中，她是一个贫穷的传教士的孤儿，被送到一个富有但冷酷无情的姑姑家，姑姑不想要她，但觉得有责任收留她。从历史上看，她是一个边缘人物，介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对穷人施以惩罚性残忍，以及 20 世纪初创造的一个多愁善感的家庭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女性被封闭起来，并受到训练，以表现家庭的“美德”。

为了适应这个世界，她的父亲教她一种认知和情感的功夫模式：“快乐游戏”。这个游戏的规则很简单；无论她面对什么样的悲伤、失落或失望，她必须从中找到快乐。这条规则的应用可能会很困难，故事情节不断给波莉安娜增加压力，直到挑战变得近乎滑稽的极端（她被车撞了，跛了一段时间）。在这里，波莉安娜也是资本主义流行文化史上的一个边界人物：她将 19 世纪中期英国对穷人“态度”改变的崇拜（开始于 1859 年宪章派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自己拯救自己》，比如，鼓励工人不要用工资酗酒），转变为一种情感自我防卫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当今“感恩”游戏的祖先，由服务行业超负荷工作的工人扮演，他们通过寻找每天可感恩的事来管理过度工作。然而，波莉安娜并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主人公。她是一位无私的老师。她用快乐的游戏来保护自己免受那些控制她生活的成年人的冷嘲热讽和消极情绪的伤害，但她也通过向他们展示游戏规则，改变他们的欲望，改变那些成年人，进而改变他们共同的社会。

对于露丝·巴坎来说，在“新大学”的严酷条件下，希望是一种选择，或者是我们可以学会做出的一个举动，而不是某些人与生俱来的性格，也不是一种美德。希望必须产生。与波莉安娜一样，巴坎也是一名教师，她寻求与他人合作，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制度体系中，为生活创造更人性化、更富有成效的条件。这既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也是一项挑战，正如巴坎的例子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她在一本书中写道，“在无数的对话中诞生”），²⁷

27 Barcan, p. vii.



图 8 香港电影《功夫》（2004）

这样的工作是群体性的，是坚持不懈的。

在结论中，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为这次会议所征求的一些集体智慧。下面的话没有科学依据。我只是给我在不同国家认识的一些资深、中年和年轻学者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请他们简要地列出他们在当今学术界取得成功和生存的三大策略。²⁸ 在回答中有相当多的重叠，为了简洁起见，我将它们分为三个类别或领域：1) 照顾自己；2) 作息 / 习惯管理；3) 如何获得自主性。

1. 学术工作者的自我照顾

大多数受访者强调耐力的培养和重要性，以保持你的投入，坚持你的激情和坚守目标的实现。实用的建议包括：

- 每一天都花点时间写点东西或做点研究
- 分清轻重缓急，以便有效地同时处理多项任务
- 周末不要工作！（或者至少请一天假）
- 每隔6年对工作重点做出重大调整

28 诚挚感谢：Paul Bowman, Chris Connery, Catherine Driscoll, John Erni, Lawrence Grossberg, Mette Hjort, Kim Soyoung, Fran Martin, Tejaswini Niranjana, Nur Wulan, Gietty Tambunan, Andy Wang Chih-Ming, Handel Wright and Audrey Yue.

- 知道何时撤退和复原
- 知道什么时候拒绝或者逃跑

王智明博士的回答完美地总结了许多人对自我保健重要性的看法：

在我看来，投入和毅力是当今学者最重要的品质。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士气低落的时代，我们很容易被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分神——气候变化、长时间的工作、糟糕的政治气候、缺乏认可，各种你能想到的事情。人们很容易对自己失去信心，尤其是对文化研究项目失去信心，而如今“政治参与”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数字环境的限制和解放。无论一个人做什么项目，他或她首先必须相信它是值得的，并坚持下去。是否会有回报是另一回事，但如果没有这种“无知 / 天真”的信念，任何人留在学院都没有什么意义。

2. 栖息地管理

我们中很少有人能控制自己所处的机构环境或其中的集体劳动条件。所以：

- 你必须做行政工作。迅速自愿地承担最不坏的那一项工作！
- 合作与结盟；不要对他人采取“集体报复”或陷入不和
- 建立并实践信任，并将之作为一种机构基础
- 学会吸引外部资金；建设人际网络；做你自己的公关人员（换句话说，创造你自己的微栖息地）
- 在不鼓励交叉学科的地方发展交叉学科，并 / 或知道如何通过既定的学科规范和网络来定义自己（用功夫术语来说，扎稳自己的马步！）

3. 创造主体性的感觉

主体性，或者说拥有行动的权力和能力，以及定义我们行动理由的自

由，这并不是由机构赋予我们的，而是在这些机构之内实践的。²⁹ 培养获得实践所必需的主体感：

- 积极主动；提出建议（亲自践行）
- 培养慷慨的气度，为他人捧场“现身”
- 结交不喜欢权力游戏的同志
- 维持非市场价值的友谊和同事关系
- 培养广泛的智力和文化素养；问一些你真正感兴趣的大问题；学习新的语言
- 追求一种对时代的不偏激的理解，你可以用非官僚的、非国家的或主流社交媒体以外的语言来表达你的理解。

最后，让我回到我的基本问题：在今天的状况下，如何勇于向文化上的陌生人敞开心扉，探索你的眼前环境之外的世界？

- 培养一种世界性；与政策决策者、非政府组织人士和激进人士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无论你是否为此受到赞扬。
- 具有历史思维（过去并不美好），避免“末日”思维
- 培养“相互参照”的技能。³⁰ 积极地研究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情况，同时深入思考可能具有可比性的东西。
- 创造性地将个人情感转化为集体情感（就像露丝·巴坎那样）。
- 为他人寻求赋权。确保你在的体制里的生活可以为社会正义服务。

在结尾处，我想对 Audrey Yue 教授说几句话，她很好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尤其是通过功夫来进行机构思考：

- 练习功夫的偏转力。为没有保障的教师们找到改善工作条件的方法，

29 参见 Mary Douglas, *How Institutions Think*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6)。

30 一个实用的指南：Beng Huat, “Inter-Referencing Southeast Asia: Absence, Resonance and Provocation” in Mikko Huotari, Jürgen Rüland, and Judith Schlehe (eds)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Practice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 273–88.



图 9 2018 Crossroads 文化研究双年会闭幕演讲

或者用非直接对抗暴力的方式应对缺乏信任的工作场所文化。功夫的优雅、小心和轻盈是必要的精神疗法。

- 功夫的弹性练习对我们的教学 and 研究的长期投资很重要。与其把弹性理解为对紧急情况的应急反应（例如“为了帮助学生毕业后找到工作，我们还是来教短平快的职业吧”），不如把它看作是通过转型技能获得的一种长期效应

- 功夫的韧性不是适应（即融入、融合），而是适应能力（即学习如何具有足够的创造力和灵活性，以寻找新的资源和新的代理形式）。

除此之外，我只能补充一点，无论是阅读《波莉安娜》、看武侠电影，还是与同事分享经验，通过讲述故事的偏转、韧性和适应能力来起到振奋精神的作用，对实现目标都会大有帮助。

朝解放之歌迈进的听觉笔记

——听新工人乐团和《从头越》¹

■ 刘雅芳*



《从头越》专辑：2019年9月4日线上发行。

115

朝解放之歌迈进的听觉笔记——听新工人乐团和《从头越》

* 刘雅芳，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研究系博士后研究员。

¹ 本文的书写契机，得感谢两位友人促成的平谷之行。书写过程中，感谢新工人乐团的支持，尤其是团长许多提供了丰富的线索，并热情催稿，孙恒和路亮的鼓励，以及世新大学林慕真、陈品存的协助与阅读反馈。我想特别感谢姜国良大哥，感谢他在忙碌的工作之后还为我们张罗了丰盛的晚餐。

今年夏天，随朋友到新工人乐团位于北京平谷的工作基地参访的时候，得知乐团正在紧锣密鼓地录制、配唱全新专辑《从头越》。²很幸运地抢先听到他们的几首新歌，以及在某个夜里参观了他们在平谷新设立的“大地民之谣录音棚”进行的配唱过程（也可说是音乐与文化的生产过程）。在同行友人和乐团成员的“催促”之下，他们希望我能写一篇新专辑的乐评。我不算是一直关注着他们的乐迷和研究者³——况且他们的歌唱与各项行动实践常年有很深切的“在地”连结性，因此我将这一篇书写作为“听觉笔记”来进行。

一、我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了这是以“音乐”开始的文化运动？

唱出打工者 / 新工人 / 劳动者的声音

在中国大陆、两岸之间、亚洲、甚至以“世界”为范围，但凡对2000年之后中国大陆打工者、新工人的劳动生存处境有所关切的人们，以及关切民众文化运动的朋友，应该没有人没听过新工人艺术团、北京皮村与工友之家。⁴在“打工青年艺术团”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2004）的专辑小册子内容当中，即有着以“打工青年文化合作运动”为题的详细说明与介绍。开头的一段话是：

这张CD不仅代表着打工青年艺术团，艺术团只是另一个目标的组成部分。在艺术团的背后，是发生在由成千上万的农民移民构成的

2 新工人乐团的新成员阵容：许多（主唱 / 节奏吉他）；路亮（主唱 / 节奏吉他）；孙恒（主唱 / 口琴）；姜国良（主唱 / 鼓手）；姜杰（和声 / 贝斯）；薛勤帅（主音吉他 / 唢呐）。

3 因为2013年从台湾到上海参加文化研究学术会议，我有机会初识新工人艺术团，看到他们现场的演唱会。（第一届“热风”学术青年论坛“新文化与中国未来”，日期：2013年12月7日-8日，主办单位：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热风学术》丛刊编辑部，地点：上海大学乐乎新楼。）

4 新工人乐团的团名从2002年创办至今历经过几次变化：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2002年5月1日成立；同年11月北京农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成立，2006年更名为“工友之家”）；打工青年艺术团（2003年春天更名；2004年推出第一张专辑）；新工人艺术团（看过些资料，有说2006年更名，有说2008年更名，但可以确定的是2010年推出的新专辑已印上“新工人艺术团”）；新工人乐团（2018年巡演到遵义并开会后更名，2019年劳动节推出的EP正式印上新团名）。

新工人队伍中的文化合作运动。只有您把听到的声音——艺术团放到这场生机勃勃的运动当中去，您才会理解，为什么这些歌曲是如此的普通，以及这些普通的歌曲所起到的作用。⁵

这一段文字清楚地说明，艺术团的文化实践主旨是要和广大的新工人 / 打工群体 / 农民移民共建“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声音”，也就是“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声音”。其直指的大的社会文化状况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新的社会形态形成的过程中，劳动者（尤其指的是“新工人”）其自主的文化与精神生活的萎缩与匮乏。在艺术团推出第二张专辑《为劳动者歌唱！》（2007）之时，我们可以发现其CD封套上团名下方开始出现很简明的一句主张“用歌声呐喊 以文艺维权”。这也指出了艺术团的音乐与歌声和“听者”的关系，并不简单地只是消费社会中歌手、明星与阅听众的关系，他们企图以歌声、歌曲和新工人群体创造新 / 心的连接，进而促进这个群体能有创作自己的诗歌、唱出自己诗歌的能力。⁶

爱音乐，做一百件事继续爱音乐

从2004年至今，新工人乐团已经制作和参与制作超过十张原创专辑（不由得感叹，主流乐团都不见得有如此持续的创作能量）。2019年劳动节推出的是他们第一张EP《新工人》，而最近即将推出的是乐团的第十张专辑《从头越》。在《从头越》的专辑说明，我们可以发现乐团给自己新的定位：

5 打工青年艺术团：《天下打工是一家》。北京：京文唱片，2004年。

6 如同新工人艺术团《家在哪里》（2012）这张专辑中《这里不是我的家乡》歌词所诉说的那样：“哈哈，稻香稻香，周杰伦他也唱过稻香，我们唱的不只是稻香，还有家乡家庭和亲人。”而周杰伦的《稻香》歌词里“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却是这群打工者、为了谋生离开家乡而漂泊的群体只能好好地收拾在心底的一句话，因为他们所离开的家乡和现在的家的“最初”和“现在”都不意味着简单的美好——“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

2018 年，新工人乐团经过娄山关，巡演到遵义，在那儿开了个会，明确了“城乡文化互助”的新路线，团队名字由之前的“新工人艺术团”更名为“新工人乐团”，更专注于音乐发声。⁷

一般而言，我们可能很难想象一双按着、刷着吉他和弦的手，大清早才采收了赶着送到北京市区餐厅的桃子；敲打着架子鼓的双手正忙完为暑期童子军营队三餐有序地切煮菜肴；深夜里配唱歌曲的嗓子在白天才打了无数次电话给农园果树的认养者们；踩着乐器效果器的脚板，可能才因为开了一整天的车送货送人而踩了无数次的油门和刹车——这才是他们真实的“乐队的夏天”。这是新工人乐团日常的一部分与创作状态，他们以所思所感与一直以来采用的工人书写所唱出的叙事也互为“唱和”。这正是他们音乐的现实质地——收容着并挑战着我们被音乐商品拜物教统治已久的耳朵。

自 2002 年开始，以乐团成员、工友之家为核心所开创的文艺实践，尚有：新工人文化艺术节、影像作品、戏剧作品、新工人剧场、打工春晚、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皮村文学小组、创立“大地民之谣”品牌等。与新工人群体的维权和支撑工友之家运作有关的社会实践事业则有：同心实验学校、同心互惠公益商店、工人大学（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同心女工合作社、同心互惠社会企业、同心农园、同心童子军等。十几年来，新工人乐团的歌声与音乐创作就是在这多向度的实践中打造的。

除了看符号也要听他们的声音

也许是身为歌者又是文化与社会实践的多重组织者身份，他们时常“被忘记”与音乐的关系。连研究者有时都会突然忽略了这一点，认为

7 新工人乐团：《从头越》。北京：“大地民之谣”音乐厂牌与滚石移动，2019 年。

他们的歌唱相对于主流音乐的价值观来说并不是音乐甚至与音乐无关。也有参与式的研究者在与乐团成员谈天，聊到成员少时对于欧美摇滚乐团的热爱之时，感受到了摇滚乐流淌在其血液里的情感张力。郭佳这么写道：

我当然并非意在着墨孙恒，重要的是如果不是这段讲话，我几乎已经忘了孙恒是一个音乐人，忘了音乐始终是他要表达自己时最重要的方式，忘了今天的工友之家也是以一个乐团为基础的。⁸

七月在平谷的时候，我对孙恒的一句话印象深刻，他说：“很多人已经忘记我们是搞音乐的，我们到现在都是很喜欢音乐的人。”⁹ 这一个忘却的危险或许跟艺术团当初的立意有关，孙恒和许多都曾在不同的地方表示过类似的想法：

这么多年，如果说我们有什么总结，我觉得我们是在摸索，实践一条民众文艺的路线，民众文艺相对主流的精英文艺，民众文艺首先是把发声、表达的内容放在第一位，你要表达什么，有什么话要说，这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怎么更好地表达。¹⁰

在艺术团成立后，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知识界看重的是他们的“符号意义”。¹¹ 这似乎也是 199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世界工厂”化、市场经济而来的商品化、城市扩充而来的工地化之后直指的一个欠缺，即在新社会形态中，缺少一个对与新工农主体的生活处境更有现实连结的文化生产

8 郭佳：《追问新工人及其中港台民众连带：从“新工人艺术团”形塑“新工人阶级”之文化行动入手》。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16 年。

9 2019 年七月在平谷，孙恒与友人对话时听到的。清楚的原话不记得了，大概是这个意思。

10 崔柯等：《新工人艺术团：创作与实践》，《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 年第 4 期。该文是 2013 年 4 月 25 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举办的第 23 期“青年文艺论坛”的发言记录，主持人是崔柯，孙恒与许多参与了对话，其他还有多位学者参与。这部分引文是许多的讲话。

11 参考昆鸟：《新周文化：中国左翼摇滚青年》，《新周刊》第 406 期，见网址：https://mp.weixin.qq.com/mp/appmsg/show?__biz=MjM5ODMzMjM5MDMyMw%3D%3D&appmsgid=10000499&itemidx=1&sign=1a7a0acba57d1bbe1b3b269ab2e535d0&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uin=MjIxMzA0NzYyMA%3D%3D&key=a45a7c15a542fe6f19cb693f48e58c22259f584f95aa27ca652795c9a60327de3d57d80bcb2368f16c6d40cecded65aa&devicetype=android-15&version=25000104&lang=zh_CN。

方式的有力论述。当知识生产越来越走向指标化（市场化）与真空化（与现实有力的批判与连结的力量越小）之时，“知识分子”一方面日益回避参与与介入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则形成了关注社会议题的“专业分工”，丢失了改变文化须有社会整体观以及与不同群体产生连结的精神。因此，对于大多数的人（包括所谓“知识界”）来说，所谓的“看重”有可能不意味着想多听、多了解，而是眼睛和眼睛、耳朵和耳朵、手脚和手脚之间竖立着一道道隐形的墙——我知道你们（有人）在做就好了，我知道有人在关心这社会高速运转下伴随而生的残局就好了。

在这稍有一点点热情（不管是兴趣或是关怀），就很容易被判定不够冷静的理性幻觉时代，怎么听新工人乐团的音乐却成了一个不简单的问题。他们一直拥有的那份热爱音乐的初心催促的不是我们仅“各取所需”地解读他们的实践，而是把身体（我们时常忘记听觉也是身体的一部分）、情感、想象也交给他们的音乐——更是理解他们整体实践的钥匙。这是平谷之行给我最大的感触。尤其听到孙恒大哥在介绍同心农园的桃子树从垦荒到养成树林的过程中，国良大哥因为几年看守桃园与照护桃子的手（感）差点打不了鼓了。孙恒大哥半开玩笑地说，那不行，我们赶紧把他叫回来重新练鼓了。果桃树一般要种植到第四、五年才会进入盛果期，而“老鼓手”（好鼓手）的节奏感与稳定也需要长年的练习与现场经验的累积。好音乐是从人的劳动与持续创造所长出的果实，能连结更多人的现实体会且具有情感与知识含量的好文化也是。

二、怎么听《从头越》？我们更可以跟着唱！

打开耳朵，接收新工人乐团的声响

在北京待了一周，返回上海之后，我开始对新工人乐团出版过的专辑展开“沉浸式”的聆听，走路听、吃饭听、发呆听、地铁听、睡觉听，即

便在我心里，他们的专辑并不能以典型的乐团作品论来看待。¹² 以新工人乐团的音乐为线索，让我更为相信理解、聆听、做音乐的现场性的重要，而音乐作为表达形式、精神、情感与现实的载体，它又往往可以超越与穿越现实——创造共感。这个现场性是基于历史、地理（地域）、现实、主体的姿态——我统称为“时代感”。新工人乐团的音乐时代感是多样的、更是移动的，除了乐团成员创作、音乐里所含纳的新工人诗歌、“事件”，还包括了他们想连结的——三十多年以来，三亿打工者，及其子孙后代的存在历史。作为音乐研究者、评论者，时常忽略了这一层时代感赋予音乐的“本真性”。¹³ 因此，这十张专辑，我们更可以把它视作以音乐为方法而展开的，打工者、新工人视野中的时代记录。这也是受新自由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支配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忍（想）正视的夹缝中的日常现实与共享的精神状态（假如我们还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不只是强者和富者的世界）。

试着移动一下你的听觉系统

新工人乐团的音乐叙事主题归属，已经有一些研究先行者进行了不错的分类。张慧瑜在一次“青年文艺论坛”提出其印象深刻的为两类，一类与劳动、打工者身份相关，一类是关于个体的生命之歌。¹⁴ 郭佳根据乐团成员与每张专辑加入的不同成员所创作、演唱的歌曲所提出的歌曲属性：书写打工者状况的歌曲（乡愁、个人精神、工人苦难现象批判、以议题带动现实批判）、口号歌曲、打工子女主题歌、抒情励志歌曲、关于孤独、

12 在这里提到“沉浸式”的聆听并非自夸或自耍幽默，而是我（不会乐器的人）长期以来采用的“方法”，你要说音乐的好坏、分析它，都是得从聆听开始，这也是基本功课。我想“做音乐”的人，不论是主流或非主流，最难受听到的就是讨论的人根本没听过就开始议论好坏，当前这样的评论者为数不少。采取“沉浸式”的主动聆听还有一个理由，我们当前的社会空间不假思索播放、喂养给我们耳朵的仍多数是“悦耳”动听让你更关注自我小世界而背离社会的新自由主义之声。

13 英文“authenticity”，通常用来判断解析民谣、摇滚音乐或原创音乐的美学和聆听感受，但是分析者又往往落入音乐作品内部所建构的本真性，而忽略了音乐类型与制作过程所根据的社会条件与物质基础。

14 参考：同注 11。

都市民谣、女性 / 女工书写等。¹⁵ 在音乐的编制上则是以民谣吉他、口琴、电吉他、电贝斯、键盘等作为其民谣、摇滚的基调，偶尔会加入中国传统民间（民俗）乐器声。然而，最精彩的莫过于这些充足的民谣摇滚调性的乐团编制，并没有让他们只演唱出极易辨识的当代（西方）摇滚和民谣曲风。他们的曲调有时在吉他的弹奏指法展现了无法拘束的中国民谣灵魂、劳动号子改编、时常滔滔不绝的（说）唱词推动曲调的运行（而不是旋律决定唱的方法）、有时连键盘的弹法都能唤起听者民间歌舞剧团的听觉记忆。当然，还有歌唱者因为家乡地域不同而展现出的夹带方言与不同的普通话语感。

如此艺术团式的音乐制作基调，他们却也以此录制了八张专辑，树立了阶段性的风格。第九张《红五月》（2017）已经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风格的转变。80年代、90年代以来，流行音乐文化工业树立了明星体制。由此衍生的个人的或单一风格所模塑的大众的听觉，应该很难适应风格这么“杂”的“专辑”。但是一样米养百样人，打工者地处（来自）四面八方，我们可有意识到这两种听觉的感觉结构背后的问题？听着他们专辑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想，这几个来自不同省份的70后青年，音乐养成的背景各自不同，他们创团时是怎么有办法不只各执己见地，且不只追寻他们个人心中的摇滚乐和抒情？但是换个角度想，我是很羡慕他们的。他们的成长过程至少经历着几种音乐思想资源：欧美经典摇滚（包括后来的“英摇”）、“中国摇滚”、港台中文流行歌曲、传统音乐、地方民谣、革命（文艺）歌曲，他们却能有所选择而又自如地创造出一种其他乐团都无法复制的风格。他们所表达的直接与不扭捏，也是我在1990年代开始听到滚石魔岩所推动的“中国火系列摇滚”很直接的感受，当时也是因为有这个“参照”经验我才知道台湾摇滚乐的形式化和扭捏。

我们的听觉永远联结着世界，如果我们的耳朵能收容更多异质的声

15 参考：同注9。

音，也意味着我们的心灵有更大更多开放的可能。而面向着亚洲 / 第三世界的民谣摇滚更深深地烙印着这样的印记：鲍勃·马利（Bob Marley）的雷鬼始终离不开黑人的漂泊离散和贫困、被压迫的历史；韩国安致焕（안치환）的民众歌谣歌唱着劳动者之路与反美的怒火；日本民谣之神冈林信康早期的民谣与布鲁斯的叙事歌唱着东京山谷地区底层劳动者与边缘族群的故事；越南郑公山（Trịnh Công Sơn）的民谣则歌唱着越战战火之下平民无家可归的悲惨世界。对我来说，面对新工人乐团的音乐质地，与其较真于他们有什么样的音乐美学观点，不如提出他们的音乐与创作可以再展开什么样的音乐参照谱系。我也必须说，上述我列举的音乐人与创作者不只基于他们歌曲的叙事，还因为他们都是西方民谣、摇滚很有能力的操演者，同时也能自在调动所在地域的音乐节奏与调性，包括在地语言的吟唱、呼喊特质——他们的音乐非常的动听，亦能触动大众的听觉与穿越时代。我热烈地期盼新工人乐团在转换方向的路上也能继续朝这样的方向累进。更何况民族的大地上仍存有许多不朽的民间史诗、民谣与音乐质素，如今它们也需要当代文化的形式作为转化机制来到我们日趋丧失想象力与自以为是的“现代化”历史、生活。

吕途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2014）曾提道：“迷茫、浮躁和精神分裂是我感受到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¹⁶ 这一主流化的精神状态除了是新工人、打工者的普遍状态，也是新工人乐团的成员曾经经历并奋力与之反抗的。“迷茫”这两个字与衍生的形容词频繁出现在乐团成员的访谈与专辑的歌词里（例如：漂泊、迷惘、孤独），对他们来说“迷茫”也许不会消失，但是却会随着实践的脚步而看得日渐清晰并找寻到更多的自己（我们）。

这种精神状态在主流话语里头也是频繁出现的。例如当红歌手李宇春

16 吕途：《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

新专辑当中《哇》（2019）这首歌的歌词，堆砌着出现：“家世 职业 身份 性别 肤色 年龄 文化 语言 时代 观念 标准 眼光 与爱 无关 无关 无关 与我 无关 无关 无关”等歌词。《哇》虽然是一首歌颂爱情与这些身份识别无关的流行电子音乐，但是同时也毫无重量地唱出与这些无关可以“成为自己”。相对地，这些关键字与衍义也会出现在新工人乐团的歌曲语境里，但是却拥有不同的重量（甚至负担）。这样举例对比的用意并不在于冒犯流行音乐乐迷，而是认为中国大陆社会的通俗音乐、流行音乐（产业）的阅听众体量已经是世界数一数二，作为知识界的成员与文化分析者，以音乐、听觉为线索进行当代普遍精神（情感）状态的分析似乎也是一个可行的实践目标。它同时也可以成为像新工人乐团这样的音乐创作行动者的社会内部参照，以期和更多不同社会属性的听众形成对话和音乐交流。正如住在上海大学周边，我常在路上听到外卖小哥边骑车边唱着张雨生的歌，有次听到学校门卫也唱，还有修脚踏车的师傅也唱；校外某一家生意非常好的水果店最常播放的是香港 Beyond 乐团的歌曲，我时常观察到店员情不自禁地一边跟着唱一边忙着摆水果。假使我们有机会了解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些歌，或是有机会和他们分享一些其他好听有意思的歌，是不是有可能产生一些改变？

三、《从头越》和大地民谣城乡文化互助计划

新摇滚的《从头越》与不变的“新工人”叙事

新工人乐团的《新工人》EP 专辑与《从头越》新专辑的音乐基调基本上延续《红五月》（2017）这张专辑采取的摇滚乐团编曲基调（Band Sound），和过去的专辑相比较最明显的差别就是电吉他音墙的声响。即便是民谣吉他配唱的歌曲，和弦的声响也比较高（以前编曲类似的歌曲，人声会略微突出）。专辑整体的音场在后制上更重视音响效果，带来的第



《新工人》EP 专辑：
2019 年 5 月 1 日劳动节发行。

一层听觉感受基本上与以往定义的民谣摇滚、抒情摇滚专辑差别并没有太大。我不晓得已经习惯以往“艺术团”音乐风格的听友、歌友是否能习惯这样的变化，这个转变也透露着乐团编制摇滚乐专辑的能力颇为游刃有余。¹⁷很神奇的是，这样的摇滚声响质地也让专辑的调性洋溢着一种说不出的青春感。另一个角度来说，却有时也让人觉得有些“刚”，尤其许多、路亮的歌声音域是属于比较高亢的，但是也仍有姜国良温厚的歌声，还有孙恒更为深沉的说与唱。

新专辑每一首歌曲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灵魂：许多的《冬天里的游击队员》、《新十月》¹⁸依旧以音乐的旋律与强度承接其长歌词的丰富思绪与情感（在《新十月》唐诗新诗交错的歌词里头，你会听到象征新生的五月和世界“变革”历史上每个十月的印记）；路亮的《矿工兄弟》、《起风的夜》与《这个冬天》¹⁹以歌唱出他原本拥有的身份 / 矿工的处境，以及到了北京的心情与目睹的某一年城边区残酷的寒冬（在他的音乐与歌声里

17 《红五月》当中有几首歌的摇滚吉他编制游走在车库摇滚与朋克摇滚之间。

18 听着《新十月》当然也会想起《红五月》专辑当中的《红五月》（许多创作、演唱），许多在“红五月”歌名下方的题记：“愿这首歌能鼓励更多志同道合的人、真正相爱的人，走到一起来！”

19 《这个冬天》和《新工人》EP 当中的《过客》（孙恒创作、演唱）有高度的互文性。

有着坚持以及大男孩的真)；孙恒演唱有着摇滚灵魂的新工人胡小海的诗作《我从未将自己找到》与福建诗人蔡其矫的诗作《距离》(我在这两首歌里分别踩到活泼但苦涩的 Qinqiang Funk Style Rap/ 秦腔放克说唱节奏，以及突然思绪坠入无路可去的尽头)；漂浪鼓手(歌手)姜国良所演唱的《西藏南路》依旧潇洒温暖(如果能和《皮村北路》一起听很有意思)；姜杰(也是录音师与音乐制作)首次担任主唱的《报春晖》则延续了新工人乐团的音乐当中思乡思亲的主题；新加入的团员薛勤帅的电吉他演奏，让这张专辑的声响质地多了一股新劲道(仔细听会发现，他的电吉他是与歌者唱和的关系)。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歌收录的是《想起那一年》的20周年纪念版，同时也是向鲍勃·马利(Bob Marley)致敬的雷鬼版。

再继续描述下去可能会“剧透”太多，还是请有兴趣的朋友、关心他们为什么转换音乐风格的朋友搜索来听听。你可能也会跟我一样，听到不同的生命和故事的足迹，以及新工人乐团充满力量的摇滚。

在多次听完《新工人》EP 专辑与《从头越》之后²⁰，不知怎么地我突然有些想念《红五月》之前的专辑里头那种可以走城市进工地，可以东西南北地闯，可以摇滚也可以有时号子、有时小曲儿一下的草根民谣气息。确实《红五月》以后的专辑在听觉上更接近专业的录音室专辑，我甚至有些担心那强烈爆发的吉他音墙会不会成为某一种听觉多样化的限制。但是对于一支面对着内外情势的转变而想要透过新的尝试而继续走下去的乐队，我们应该支持并对他们的革新给予意见，因为还会有下一张专辑，还会有下一次演唱会。然而，也因为音感的转变，他们的歌词与编曲里的口琴声更重要了，歌词继续承载着主流的音乐形式无法传达与唱出的——以新工人为主体的所看到的世界与身体的情感。我甚至有些期待因为近几年 Live Band Sound 与新一波乐团风的流行，有可能吸

20 许多叮咛，要把《新工人》EP 作为《从头越》专辑的序曲来一起听。

引到更多人们寻新工人乐团的摇滚之声而来——听到对现实更多的思考、更深的愤怒、更长远的期盼、更多的心情，以及对“志同道合者”的大声呼唤。

期待新一波的“乡”城互助文化运动

自2014年第一届“大地民谣音乐会”与2015年成立“大地民之谣”品牌以来，新工人乐团已经从北京的城边村到许多省份的城市与乡村巡演，在2018年也发布了“村歌计划”同时确立“城乡文化互助”路线。看着巡演现场照片与节目编排，我认为也很像移动于城乡之间的“文化艺术节”。从小在乡下长大的人，对于庙会节庆活动、野台戏，或是任何从村里某一处传出来的扩音器音乐声响总会特别感兴趣，现在想来那有可能就是一个人年纪最小的时候接受文化与艺术的开始（既然是开始就没有所谓的粗糙与精致，因为一切都是新鲜的）。

在新专辑推出之际，新一波的大地民谣巡演也正开始。如果巡演正好到你的家乡或工作的地方，请一定要去现场看看。对于乐团（尤其是新工人乐团）来说“现场”实在太重要了。而我也衷心地期盼，新工人乐团在城乡文化互助的路线中，能打破城乡合作却总又是城市化套路的魔咒。除了把“工厂的嚎叫”与城市的“距离”带到乡村（农村）、城中村、城边村，也能够把他们因为巡演、新的互动计划，再把农村与边乡的记忆、不一样的民谣（乐）、生活与思考带进他们的音乐来，也再一次地把民间、人间失落的和被遮蔽的声音带到我们的听觉 / 思想。²¹

21 在听到新工人乐团的“城乡文化互助”新路线的时候我确实在想，他们能不能如贾克·阿达利在他的书所提到过的，在音乐尚未进入商品交易的中世纪，有着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吟游艺人”（jongleur），他们的行踪不定没有固定“雇主”可却是歌者、乐器演奏者和艺人。阿达利提道：“他独自创造音乐，携带至各处而主导音乐在社会的流通传播。”参考出处：贾克·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宋素凤、翁桂堂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

代结语：想象孙恒与鲍勃·马利（Bob Marley）“对歌”

想起那一年 / 我离开故乡 / 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 / 今夜梦里面 / 我回到故乡 / 回到妈妈温暖的身旁 / 家乡的河水现在已上涨 / 远方的人儿在远方歌唱 / 门前的桃花现在已盛开 / 唱歌的人儿何时能回来

——摘录自孙恒与新工人乐团《想起那一年》（1998-2019）²²

Won't you help to sing（你不跟着一起唱吗）/ These songs of freedom（这些自由之歌）/ 'Cause all I ever have（因为我曾那样唱着）/ Redemption songs Redemption songs（救赎之歌 救赎之歌）/ Emancipate yourselves from mental slavery（将你们自己从思想的奴役解放）/ None but ourselves can free our minds（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自己）/ Redemption songs（救赎之歌）/ These songs of freedom Songs of freedom（就是自由之歌 自由之歌）

——摘译自鲍勃·马利与哭泣者乐团（Bob Marley and The Wailers）《救赎之歌》（*Redemption Song*, 1980-2019）²³

2019年8月21日初稿

2019年8月30日、9月3日修订

22 据悉《想起那一年》（孙恒创作、演唱）创作于1998年，后来收录在新工人乐团（当时是：打工青年艺术团）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2004）的第一首曲目，歌名的题记：“献给那些远离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为了生活为了理想而漂流奔波、奋斗不息的人们。”

23 鲍勃·马利（Bob Marley）在1945年出生于牙买加，1979年第一次“回到”非洲，1981年过世。《救赎之歌》（*Redemption Song*）是收录在他生前最后一张专辑《上升》（*Uprising*, 1980）的最后一首歌，传唱至今。我在这首歌标示“1980-2019”代表它从创作后传唱至今，寄语《想起那一年》唱了20年还要唱下去。

官僚风起之后

——高校学生会为何需要政治实践

■ 梁成林*

摘要

当下的高校学生会已经逐渐丧失了学生自治的功能，转变为学校行政体系的延伸，但是学生会“官僚作风”的出现，却与行政体系对于学生会的过度侵占没有必然的关系。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是资本侵入高校之后，就业市场对青年学生形成巨大压力的具体呈现，也是学生群体在各种限制条件下发挥能动性，尝试解决自身困境所导致的吊诡局面。它的最终形成，使得学生们丧失了依托学生会进行政治实践，扭转自己面对资本与行政力量之时不利位置的机会。而深化青年学生对于“就业”问题的理解，尝试将他们的真实诉求从市场的要求中区分出来，便成为了重启青年学生政治意识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高校学生会；官僚作风；大学商业化；意识形态

2018年7月，一条名为“中山大学学生会干部选拔公告”的公众号推文突然间成为了各大网络社群的讨论热点。这份公告模仿官僚体系的级别称谓，将两百多个新晋的学生会干部冠之以“主席”“部长”“办公室主任”等头衔，由此引发了网络舆论对于高校学生会“官僚化”的激烈批评。同年10月，热闻诸如“学生会干事管副主席叫学长被教育辱骂”、“学生会部长强制要求发短信祝福，名字写错要求抄十遍”集中曝出，再一次使得高校学生会成为众矢之的。在密集的新闻轰炸中，高校学生会的“官僚作风”俨然成为了受到网络持续热议的公共话题。

.....
* 梁成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研究生。

实际上，网络舆论对于学生会“官僚作风”的批评由来已久。早在2011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的陈伟副教授就曾在个人博客中发表过一篇名为《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的文章，直言高校学生会已经变质，成为一些学生效仿官场习气弄权谋私、贪污腐败的关系网络，激起了一系列相关讨论¹。当下对于学生会“官僚作风”现象的讨论，延续了当时的观点，指出学生会的“官僚作风”在两个方面的集中体现：一是学生会干部一味强调等级差异，借机打官腔耍官威；二是他们利用职权之便，为自己牟取灰色收入。在对高校学生会问题进行追责时，批评声音普遍倾向于将学生会的“官僚作风”视为高校行政体系孕育的产物，认为高校学生会是在与行政系统的频繁交流中受到了负面影响，沾染了一身官场沉痾。

然而，这样的归因是否符合学生会的实际情况，却还有待斟酌。简单地将学生会的“官僚化”解释为对行政系统的“上行下效”，并不能够详尽地说明学生会环境恶化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在今天的社会语境中，当高校学生会的问题无法脱离“大学商业化”的整体趋势时更是如此。毕竟，在资本、高校行政力量与学生之间的动态关系中，直接对学生会造成影响的，并非只有行政系统的干预；资本在尝试将大学与工厂之间的障壁打通之时，也有意识地对学生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高校学生会的“官僚作风”正是学生群体在面对两方压力时，能动地对于周遭环境进行改造后的吊诡产物。

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本文希望首先从上述的动态关系入手，简要地阐述学生会“官僚作风”背后牵涉的社会环境之变，理清学生会问题中

.....

1 2011年9月3日和4日，陈伟在个人新浪博客中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与《关于〈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一文的回应》（文章链接分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afcd70100tsv1.html 与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afcd70100ta16.html），前一篇文章被转载到天涯论坛之后引起了诸多网友讨论，并且引来了一篇名为《某学生干部回应陈伟的〈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链接为 <http://blog.renren.com/share/102952091/9100736034>）的文章的激烈批评。同年10月，凤凰网开设了“学生会的前生今事”的专栏（链接为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special/xueshenghui/>），集录了一系列从不同观点探讨学生会的文章。

各种力量间的联系，结合作者本人在高校学生会任职的经历，分析这一动态关系在学生会长一隅的具体运作方式。希望经由对“官僚作风”的说明，理清学生群体在当下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并依托学生会这一场所，思考激活学生群体政治实践的可能性。

一、政策之变与学生会长转型：官僚作风生成的大环境

学生会无疑是国内高校中最具争议的学生组织。它一方面作为学生群体的自治组织，需要承担“为学生服务”的重要职责，作为学生意志的体现与校方进行沟通对话；另一方面却又是高校行政系统的助手，负责具体执行学校指派的各种繁琐任务，甚至需要为种种不利于学生的学校政策背书。承担两种性质相互抵牾的工作，学生会势必在具体的工作当中面临着难以兼顾周全的尴尬。而就目前来看，这一组织总体上倾向于“为学校服务”，基本上转型成为了高校行政体系的延伸。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要对其进行探究，我们还需从 80 年代以来学生会定位与高校就业政策的转变开始说起。

谈及学生会在高校中的定位，我们需要首先通过章程规定对其进行了解。目前绝大多数高校学生会都是以 1995 年通过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² 为总纲制定具体的细则。这份章程大致规定了学生会的基本性质，其一是作为学校 / 政府与学生之间的纽带，“在维护国家和全国人民整体利益的同时，表达和维护同学的具体利益”；其二则是作为学生群体的自治组织，在高校学生中进行自我服务、自我管理与自我教育。这里先不论在现行体制下学生会的实际定位，仅将这份制定于九十年代的学生会章程范本与以往的章程内容相比较，即可发现很多内容上的简化删改。它们较为明显地体现在两个方面：政治意识的淡化与阶级意识的退场。在建国前夕留下的旧有章程中，全国学联的任务属性

2 此章程由 1995 年全国学联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2015 年全国学联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修订。

有着极其鲜明的政治意识，其中不乏“加强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³以及“与工农群众结合、为工农群众服务”⁴的讲法，总体上延续着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生运动的源流。尽管此后国内高校屡次面对停招与停课的危机，但及至恢复高考之后的80年代初期，高校学生会依旧承继着激进政治的余绪，被学生群体视为争取民主的重要场所⁵。学生会定位的彻底转型，实质上是与80年代末激进政治的退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这一时期政府对社会民主运动的严格管控，高校学生会一度被学校收编，成为对抗学生运动的一股力量。尽管此后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放松，经历风波的高校学生会却很难再拥有以往的自由度，牢牢地处于高校行政系统的把控之下。按照现有章程的规定，目前的学生会在名义上依然承担着“为学生服务”的重要功能，但就实际情况而言，各个学校/学院学生会已经被直接划归到学院的团委书记或是辅导员治下，与学生群体的诉求渐行渐远。这就使得学生会的主要任务不得不转变为实质上的“为学校办事”，参与到行政部门大量的形式主义工作与意识形态宣传的具体执行当中。

作为学生群体进行自治与话语权争夺的场所，学生会的转型对于高校学生而言显然是不利的。但几乎就在同一时间，随着国家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化，资本作为新的力量侵入了高校。在一系列配合市场经济的政策落实中，高校学生在政治诉求上的不满很快就被谋求个人发展的新诉求所掩盖了。这一组政策中对学生群体影响最大的，莫属从8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1995年的毕业分配制度改革⁶。

从建国以来到1980年代末，高校毕业生一直是由教育部和学校统

3 《中国学生运动的任务》，无锡市学生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宣传部编印，1949年版，第14页。

4 《中国学生运动的任务》，第18页。

5 翁衍庆：《中国民主运动史：从延安王实味争民主到西单民主墙》，新锐文创2016年版，第238-240页；该部分谈及八十年代初争取民主时北京大学学生会的选举活动，当时的学生会还被学生群体视为政治实践的重要场所。

6 关于毕业分配制度在这一时间的变化可参见赵晔琴：《从毕业分配到自主择业：就业关系中的个人与国家——以1951—1999年《人民日报》对高校毕业分配的报道为例》，《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第73-84页。

■ 来稿

一的划拨分配，它们充当了学生与事业单位之间的中介。但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纛下，高校毕业生与企业之间的供需关系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随着国家经济调整的持续进行，向企业下放权力并且促成更加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成为了使市场继续扩张的关键。流动性不强的“包分配”制度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型格格不入，势必在市场经济的压力下被逐步取消。企业与高校学生则在旧制度的松动下，提出了各自的新诉求。一方面，以盈利为要的企业想要在竞争至上的市场环境中占据有利地位并且获得更加优越的市场资源，这就需要招徕专业更为对口、竞争力更强的毕业生以提升企业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一部分毕业生也希望通过自谋职业以寻求更好的出路。两方面的力量促成了高校内部的变化，最终导致的结果便是，一种强调相互竞争与个人发展的意识形态迅速在学生群体中落地生根，改变了学生群体的普遍想法。学生们不再满足于缺乏个人自主权的集体规划，转而开始各自为战，注重培养个人竞争力，希望能够按照企业的要求“锻炼能力”并且得到心仪企业的青睐⁷。

显而易见地，在大环境的整体变易中，不仅仅是学生会的性质，就连高校学生群体的心态也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生了巨变。但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回学生会一隅时，我们亦需看到政策制定者并不是有意将高校学生会改造成现在的状况。这一论断的突出证据就在于，高校行政系统对于改造后学生会的要求与就业市场对于学生的要求并不一致。行政系统需要的是能够帮忙执行大量去技能化的繁琐工作的学生助手，而就业市场对学生的要求则是具备出色的竞争意识和一定的专业能力⁸，两种要求之间的格格不入乃是两方面政策调整之后形成的罅隙，这对于高校

.....

7 高佩馨、黄家泉：《毕业分配制度的改革》，《广州教育》，1990年Z3期，第67页。该文谈及了80年代末的广州某职业大学毕业生中有30%存在自谋职业的意向，另描述了部分高校学生通过修习双学位、参加知识竞赛等方式提升个人素质，以应对就业压力的表现。

8 学生会工作的性质与企业对个人的要求并不总是呈现出这么大的差异，但总的来说，学生会工作的性质决定了这一组织不太需要大量的策划者、管理者，反而更加需要工作的具体执行者。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的学生会成员都会认为学生会工作是在浪费时间的重要原因。

显然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首先，自主就业的出现使得就业率成为了评价高校水平的重要标准⁹，如果企业对于学生的要求与行政系统对于学生的用法大相径庭，高校该如何产出更具竞争力的学生以“提高水准”？其次，随着学生就业自主性的提高，老套的学生会工作势必在学生眼中逐渐缺乏意义，此时高校行政系统要如何弥补它的劳动力短缺？当学校真切地把握到政策之变对于自身的挑战，制度的调整和面向学生的话语接合就成为了极为重要的工作。这种努力虽然无法真正解决学生会工作本身缺乏意义的实际情况，但却巧妙地在话语层面上完成了学生诉求与学生会的功能之间的初步缝合，帮助高校脱离了尴尬的政策罅隙，在源源不断地产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身发展的需要。

下面，我就以本人在暨南大学文学院学生会担任学生会主席时的经验为例，详细说明这些制度与话语是如何在细节处相互接合，并为学生会工作赋予新的意义的。

高校对于学生诉求与学生会功能的绑定，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学校的评奖评优政策和就业指导当中。这些繁杂的政策尽管在细部上有所差异，但总的来说都把学生会工作当作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从短期的潜在物质奖励来讲，高校的评优入党、评选奖学金乃至推荐免试研究生的名额不仅会考虑到学生的学业和学术成绩，也和他们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或者参与学生活动的数量多少紧密联系在一起¹⁰。从长期来看，学校显然敏

9 在教育部2003年4月签发的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当中，明确地写进了“地方和高校要把毕业生就业状况作为确定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规模的重要依据”以及“把毕业生就业状况纳入高校评估指标体系，使评估结果更加全面地反映学校的实际状况”的要求。该文件也被称为“18条与就业挂钩”政策。文件详见教育部信息公开专栏：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265/201001/xxgk_80062.html

10 例如，我用以举例的暨南大学就在优秀学生奖学金评选细则中明确规定了对“学生综合测评总成绩”的要求，而在一则名为《关于做好2017-2018学年度本科生综合测评的通知》的通知中，附件《暨南大学学生综合测评成绩登记表》的测评项目包括“担任校、院、系、班、社团干部表现分”以及“积极参与各项文体活动”，“无故不参加校院系要求统一参加的集体文体活动”甚至还会被扣分。（《暨南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评选细则》链接为<https://xsc.jnu.edu.cn/7d/6e/c5512a163182/page.htm>，《关于做好2017-2018学年度本科生综合测评的通知》链接为<https://xsc.jnu.edu.cn/e6/94/c5511a255636/page.htm>，附件《暨南大学学生综合测评成绩登记表》可在其中下载。）

锐地把准了学生对于未来的隐忧。通过与学生会招募新生的工作相互联动的就业指导¹¹，塑造了一套学生会工作对于学生个人的“远大意义”。

学校的就业指导工作早在每届学生的入学教育时就会将严峻的就业难题提给新生们。这一方面是因为就业率作为评价高校优劣的标准之一，的确对各所高校形成了实质性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学校行政系统需要将招募廉价学生劳动力的需求以就业的名号进行适当的包装，以便为学生组织招徕成员。在就业指导的相关论述当中，“参加学生会”不仅仅是加入学生组织那么简单，学生会工作在各种宣讲中都被和“锻炼能力”“学习技术”“扩展人脉”等功能紧密联系了起来，这些“好处”虽然看上去极为含混，但却成功地逼近了大学新生们对于都市精英白领的想象，使得“成为学生会成员/干部”和光明的就业前景在他们的眼中画上了等号。

最终，在学校行政部门对就业问题与学生会工作的接合之下，学生会在学生眼中的刻板印象渐趋模糊。从名义上讲，高校学生会似乎从“为学校服务”又回到了“为学生服务”，成为了帮助学生解决就业问题的平台。但就在这一来二去之间，学生会的职能以及意义已经完全被置换，它从一个强调维护群体利益的集体组织，成为了用以谋取个人利益和未来发展的“就业”试炼场。

然而，学生会的经历真的能帮助学生解决就业问题么？¹²在这一点上，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学生们对于学生会工作的失望和不满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不乏表现。

11 这里需要简要说明就业指导与学生会的关系。文中所谈及的就业指导，主要是高校行政部门提供给新生的一项服务。行政部门会通过就业指导这个环节，在学生会招募新人的过程中，帮助学生会等官方组织“站台”。这是因为学校的行政部门需要学生会来完成大量的执行工作，也就必须为学生会赋予一些类似“有助于就业”的意义，帮助其招徕成员。仅凭学生会单方面的力量，实际上是不足以完成吸纳新生的工作的。

12 对于这个问题，本文也无法否认学生会经历对于学生的就业可能存在一定的帮助。学校由于就业率指标的压力，还是希望学生会能够在作为行政系统延伸的同时，帮助学生提升就业竞争力的。但我们也必须了解，高校对学生就业问题的负责，也仅仅止于签订三方合同为止。它对就业竞争力的提升，可能只是让学生熟谙于大量的去技能化工作的执行方式。而这种帮助显然不符合学生对于未来的预期。

在笔者担任院学生会主席的整个学年中，院学生会最耗费精力、持续时间也最长的活动，通常都可被视为上文所述的“形式主义工作”。这些工作通常是指由学校/学院举办的大型活动，如晚会、嘉年华等的具体执行环节。类似活动常常被冠之以“表现学生风貌”的头衔，实际上则是学校各级行政部门的公务人员用来评奖的“成果”，抑或用来欢迎各级领导的手段。这样的活动对于学生而言缺乏意义，但却往往需要花费学生会成员的大量时间。例如当时学校举办的“校歌合唱比赛”以及学院举办的“语言艺术欣赏晚会”，两项活动都需要动员大量学生进行耗时一个多月的排练，然而到了真正的演出，比赛场地中除了其他的参演者和老师评委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观众（试想谁会对着一遍一遍重复的校歌看得津津有味？）。学生会成员们的全年工作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些缺乏意义的活动进行，其工作量的繁重自不消说，许多零碎工作的自由度也低得可怜，往往是辅导员安排什么，学生就要做什么，乃至一张海报的颜色都要按照上级的喜好反复修改。将这类工作视作为“锻炼能力”“学习技能”，甚至于解决“就业”问题的上佳办法，未免令人啼笑皆非。

与此同时，学生会成员们也相当明白，在进入正式的学生会工作之后，学生会之前的大半许诺都已经不攻自破。学校提供的看似丰盈的资源充满着“贫瘠”的漏洞。遑论虚幻的承诺过多，学生会工作与就业问题之间的相关性实难令人信服；即使是短期内潜在的物质回报，如奖学金与评优资格也是处于僧多粥少的状态，根本无法遍及到大多数学生身上。面对这种令人不满的学生会现状，学生势力的抵抗是普遍存在的。但在一套深入人心的强调竞争、强调个人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就业市场对学生所造成的实质压力面前，这种抵抗往往由于学生群体缺乏对于自身困境的审慎思考而被压制、消解，甚至转化成为对现有学生会机制的认可、补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学生能动性在各种限制条件下的吊诡发挥与学校策略相互配合，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促成了学生会“官僚作风”的产生。

二、官僚风起：学生群体为何让渡权利？

在转型过后的学生会中，学生群体如何发挥自身的能动性？总的来说，学生群体是以让渡权利的方式参与到了对于学生会的继续改造当中。而他们之所以作出这样消极的反应，则是因为学生群体在面对学生会现状时，既缺乏对于自身的权利的体认，也缺乏对于构成现状的诸种力量的清晰认知。¹³

首先，就学生群体的权利意识来看，学生们虽然对学生会工作产生了种种不满情绪，乃至通过消极怠工的方式来对抗这些工作。但总的来说，这些消极方式的运用反而呈现出了学生群体在认知上的巨大盲区：他们缺乏对于自身权利，尤其是结社权的自察。

按照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放之于高校一隅，这就意味着学生有权合理合法地组织团体，并且能够通过这一组织参与到学校公共事务的决策当中去。高校学生会作为学生的自治组织，本应是学生结社权的集中体现。但是在它被收编控制的实际状况下，学生不但让渡了自己对自治组织的控制权，更是在学校严格的意识形态管控下，倾向于服从现实情况，逐渐失去了对于自身权利的基本认知和维护意识。当下的高校学生大多是将高校学生会完全当做行政系统的下设部门，几乎不去思考学生群体是否有控制、主导学生会的合法依据与可能性，因此也就很难意识到学生会的改造实际代表着学生群体权利的丧失。

其次，高校学生们虽然在身处困境的情况下进行了消极抵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地理清了构成现实阻力的各方力量。

在今日高校中，行政力量对于学生权利的侵占的确存在，但是将所

13 这里谈及的种种缺乏，总的来说是由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去政治化”的社会大环境所造成的。日益成熟的市场机制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制造了一种“自然化”的市场概念，它掩盖了市场机制背后权力与资本的相互媾和，使得“服从企业的要求进行竞争就业”在学生群体看来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也使得他们在校内校外进行工作时，很难分辨自己被剥削的原因何在。而在避谈政治的高校氛围之中，学生服从于学校安排更是早已成为了心照不宣的原则，这就意味着学生对于自身权利的意识必然存在短板。

有行动的阻力都归结到行政系统上去，将它视为不可通融的铁板一块，显然是一种过度流畅的简单思路。在强调高校行政力量的同时，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的是，就业市场及其背后资本的力量似乎完全地被自然化了¹⁴。大部分高校学生都在尽力按照就业市场的要求提升自己的学历，考各种证件，丰富自己的实习经验，并且试图在学生会中学习所谓的管理、交往等能力，乃至学生们对于学生会的抱怨往往不是它不够“民主”，而是它难以提供自己想要的工作机会。由于对资本力量缺乏察觉，学生群体在就业市场的各种要求下耗费了大量时间学习一些对自己缺乏意义的技能，同时也长期地处于无酬或低酬劳动当中。行政系统对于学生会的肆意挪用，恰恰就是建立学生们对于这套被掩盖的剥削关系的盲目服从上。

通过对于上述两个方面的“缺乏”的描述，我们可以尝试对高校学生群体在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普遍想法做一个简要的概括。学生们所服膺的，是一种以就业（更确切地说，是所谓的“好工作”与“未来发展”）为主要导向，强调相互竞争、利益至上的个人发展模式。在这种想法的影响下，他们即使目睹学生会环境的渐趋恶化，也不会选择将整个组织的发展势头向“自治组织”的方向上矫正。与之相反，学生们对于学生会工作的不满最终所引发的是一种极其吊诡的“反向运动”，他们既没有尝试与行政力量展开对抗，也没有产生对资本力量侵入的自觉意识，而是通过对学生会进行内部调整，试图在学生会内部塑造出种种更为可观的潜在回报，在为乏味的学生会工作重新赋予意义的同时，缓解不确定的未来前景所带来的不安感。

那么，这一调整到底是如何具体实现的呢？总的来说，它是以学生

.....
14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在这里对行政力量与资本力量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只是为了强调就业市场的存在被“自然化”的现象，特意将其截然地划分开来。实际上，在大学商业化的过程中，行政力量与资本力量在更大的层面上往往是合谋的。没有政府的默许，资本是无法肆意入侵高校的。高校就业政策的多次调整以及此后1999年教育产业化概念的提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点。

会干部作为主导力量¹⁵进行的学生会内部的调整，其方法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对学生会内部资源的再分配，其次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合和再加工。

对于大多数新生成员而言，学校有关学生会工作的美好承诺会在半年以内迅速被打破。而作为学生会的干部，也是高校学生会中率先得到评奖评优优待的部分学生，他们面对该情景的时候，通常有着更为复杂的想法。一方面，在面对缺乏工作动力甚至想要离开团队的学生会成员时，作为领导者的学生干部必须思考如何重新激活组织的活力，维持组织的日常运转；而另一方面，身为学生会内部的既得利益者，学生干部个人也面临着“承诺的破产”¹⁶，希望能够从学生会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如何将这两方面相互抵触的诉求整合起来？学生会干部主导的组织内部调整由此必须在物质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相互配合、共同推进。

在物质层面上，学生会的内部调整需要首先为学生会干部谋取“好处”的诉求服务。这里的“好处”，一是指各种实习机会、评奖优待，二是类似“贪污”的灰色收入；前者能够通过与学院老师更为亲密的关系轻易获得，而后者则与学生会的现行机制有关。各院的辅导员/团委书记虽然限制着学生会的总预算，但由于学生会面向学生代表大会的负责制度名存实亡，这笔预算就成为了只有少数“主席级”学生干部知悉，并且无需向学生会成员通报的学生会“机密”。干部们只需稍加运作，商业赞助的费用、活动剩余的经费就能统统落入他们袋中，充当学生会特权阶层的工作“补偿”。

物质利益向组织中的少数人倾斜显然会造成多数人的不满，它会使得学生会内部产生严重的分化，一部分人开始消极怠工，另一部分人则

15 学生会干部在失活的高校学生会中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和权力，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是学生会内部调整的主导者和受益者。不过，学生会干部也仅仅只是在学生会或是高校行政系统的末端作为受益者，相对地享有一些有限的特权，他们本身也并不外在于学生群体所面临的危机。

16 学生会干部有时反而需要为院系的活动垫更多的钱，做更多的低酬劳动；这些付出与他们收获的回报相比同样差距悬殊。

尝试挤进学生干部的关系网络攫取利益。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分化是学生会资源再分配所无法避免的结果，但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补足，往往能够激励更多的学生会成员加入后者的队伍，间接地起到动员学生会成员的作用。

在上文中我们谈到学校对于学生会工作的承诺最终落脚于一个成功的都市精英白领形象，这一远景在实际工作中的渐趋破灭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学生们对于学生会的疏离。但就在此时，攫取了大量“机会”与“好处”的学生会干部作为组织内部的既得利益者的出现，反倒意外地为学生会的现有机制提供了合理性的支援。这个干部形象虽然是通过种种难言正当的方式，借由他人让渡的权利获得了更多的工作经验、奖项和物质回报，但它同时也作为学生会成员眼中的“成功榜样”，验证了学生会工作的意义所在。学生会干部在讲台上“挥斥方遒”的场面、在学生会等级制度作用下的权威不像一线城市的房价那样难以企及，一个学生会成员只需要两到三年的业余工作，就有机会站在那样的位置上扮演既得利益者的角色。这个“能力过人”的幻象虽然在外界看来或许像过家家一样可笑，但作为一个能够触摸到的“成功”的象征显然对高校学生们有着相当的效力，不断地吸引着学生们积极地投入到学生会的工作当中，以看得见的“成功”缓解有关就业的远虑。¹⁷

最终，高校学生会的内部重建在学生会干部的推动下，同时也是在学生群体的默认中完成了。在这样的学生会中，学生会干部因为学生会成员对于自身权利的盲视，在组织内部获得了更大的权威和更多的回报；而学生会成员们则在缺乏对于现状的认知的情况下被干部们的“成功”所蛊惑，并且渐趋将学生会干部的权威，乃至过分的颐指气使视为常态。

17 高校学生会的内部调整还有其他的形式，譬如学生会成员之间的情感因素就经常被挪用为学生们对于学生会的归属感和对学生会工作的责任感。学生会的干部与成员之间不仅仅是上下级关系，同时又可能是同院系的亲密朋友，这种情感关系在学生会中会被用作于掩盖低酬劳动的剥削本质与意义短缺，它亦是研究学生会时需要重点关注的另一议题。有关这种挪用的叙述策略可参见公众号文章《对不起，我想退出学生会》，http://www.sohu.com/a/148120295_736659。

从这一视角探勘学生会的“官僚作风”，我们便能发现，学校行政系统仅仅是为学生会的“官僚化”提供了一套照本宣科的样板；学生会“官僚作风”越来越盛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高校学生在面对就业市场的压力时，缺乏审慎的思考与分析所导致的能动性的滥用。在官僚风起的全过程中，学生群体关于学生会所能提供的“个人发展”未必不充斥着幻灭感，但是这种可能清醒的意识却总是在大环境的限制下难以展开。一方面，面对强势的国家机器，当代中国青年总是抱着一种回避尖锐问题的犬儒心态，久而久之便习惯于过度简单地归因问题，不去思考自身困境的复杂成因；另一方面，日渐起势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便趁虚而入，借着人们对于“政治”“官僚”的反感，打着自由竞争的名号获得了人们的认可。于是，抱着未经理清的想法，学生们最终只能沿着既有的社会逻辑，试图通过学生会中的“成功”确证自己在面对资本侵袭时具备足够的能力，想象性地为就业问题寻找答案。

不过，这样的办法并非长久之计。与一套拥有稳固体系的科层制度截然不同，高校的学制天然地限制了这种想象性方案的保质期。当学生会成员们不断成长时，学生会工作被赋予的大多数意义都会逐渐丧失。且不论只在学生会中试水一两年的普通成员们，就算学生会干部有时也必须面对就业与就业之后的种种挫折。由此，新的议题随之出现。如果说学生会的现有体系无法为学生群体提供面对就业问题时的有效方案，那么他们究竟应当如何应对这一难题？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更进一步地审视“就业”问题中更深的意味及其与学生的政治实践之间的相关性。

三、“就业”背后：学生会政治实践的可能

当下高校学生群体面临的“就业问题”究竟是什么？如果仅仅将其定义为学生们最为关心的“找份好工作”，学生会的工作经验当然能够

作为阅历起到一定的帮助。然而，“就业”显然不只是入职瞬间的如释重负，作为当下高校学生群体的首要追求，它为学生们带来的真正困局潜藏在“就业之后”。

今时今日，当“钱”字当头的主流逻辑越发深入人心时，“找份好工作”成为了公认的人生重要目标。“找份好工作”不仅意味着好的生涯前景，意味着买车买房的资格，甚至还是获得幸福的前提。不过，正是在这过度简洁而乐观的通约当中，人们往往容易忽略“就业”背后的一系列变化：“就业问题”逐渐成为学校和学生的头等大事的过程，实际上正是资本侵入高校，并且打通校园与工厂之隔的过程。

在资本有意识的运作下，大学的价值与学生的个人目标都不可避免地遭遇降格。高校开始转型为一个加速产出学生商品的机器，通过鼓励学生尽早实习、缩短学生的在校时间来推动学生走向就业市场；而学生则开始将大学视为临时的停靠站，终日忙碌于实习考证之类的琐事。在这些繁忙中，学生或许能够得到暂时的成就感，但随着大学商业化的步伐越迈越大，我们必须注意到，留给学生群体深度学习、思考个人意义以及扩展生活圈子的空间正在迅速缩小。这就意味着，学生们往往是在对“就业”一词背后企业对个人的剥削一知半解的时候，直接被推向了各种高强度的工作。在新的环境中，不存在“成为学生会干部”这样经济适用的“阶层爬升”，绝大部分青年学生都会长期地处于一种难言满意的工作环境下。“就业”之难恰在此处，个人从学校踏入办公楼的那一瞬间并不代表着问题的解决，想要在这个远比商业化之后的高校严酷得多的场所中集合力量抵抗资本的侵袭，青年们既缺乏以往的练习，也缺少相应的平台和精力。由此，个人面对企业时的不利位置便长此以往的存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稳固。

那么，如何针对这个“真正的”就业问题提出可行的方案？我们不妨将视野重新拨回到学生会一隅来推进议题。

■ 来稿

在前述的文字中，我们一再强调学生会“官僚作风”的形成是学生们对于就业问题想象性解决方案的一种呈现。那么对于其他不相信这种“幻想”的高校学生而言，放弃学生会去各大企业实习来积攒经验，就成为了主流的想法。诚然，如果是按照就业市场的要求来评估这类学生，他们无疑会更加适应企业的要求。但是，这种以无休止的相互竞争来获取相对有利位置的行为，绝非面对资本剥削时的长久之计。要想真正地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就必须以集体的形式组织能够与之抗衡的力量。在此，学生会作为学生群体的自治组织，既是能够提供充足机会以便学生进行思考与实践的场所，又是以往学生群体与学校进行权力斗争的凭借，无疑是尝试为学生赋权的最佳选择。

指明了学生会内蕴的潜力，我们也必须指出这一赋权所面临的困难何在：高校学生们在面对资本与行政力量时，在诸多方面都显露出明显的弱势。前述的种种“缺乏”自不消说，对于90后与00后的高校学生而言，这些缺乏还需加上一条：无法得见有别于目前社会现状的局面，本身也构成了他们想象力上的限制。

当下的学生会乃至社会氛围，总体上处在一种去政治化的，人人各自为战的状态之中，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认可资本推动的竞争、追求个人层面的发展，似乎成为了一种无需思考就能做出的选择。相对而言，向青年学生空泛地强调政治意识的聚合乃至学生会政治实践的重要性，要求他们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且去和学校的行政力量角力显然与当下青年的认知相去甚远。面对这样的言说困难，寻找更加贴近个人生活的思路，从学生个体的需求出发帮助他们体认自己“缺乏什么”“想要什么”，反而可能更好地帮助他们辨认现实的阻力何在，激发出他们改造学生会的愿力。

如果突然被问到“缺乏什么”或是“想要什么”的问题，人们通常都会将自己的稀缺之物通约为“钱”或是“自由时间”这种社会的共同

追求。但绕过这些过于简单的答案，体察学生目前的困境，更为清晰的需求实质上不难看见。就拿学生会各类招新中打着的“锻炼能力”与“扩展人脉”之流的幌子来说，我们通常都将其归纳为学校接合主流话语对于学生会工作进行的包装。但是学生们真正的需求恰恰就黏连在这些资本所主导的话语，正紧迫地等待我们将其与市场的要求分割开来。譬如，学生们对于“锻炼能力”的模糊指向的盲信，实际上暴露出的是高校学生因为难以清晰地认识社会的动态趋势而产生的焦虑。面对高失业率与去技能化的工作，人们下意识地希望以能力的提升来缓解落伍之忧，而既然学校无法真正地帮助学生解决这些问题，学生会是否能够加强学生们深度学习的能力，帮助他们组织起有效的思考或是掌握更加“硬核”的技能？与之类似，“扩展人脉”的说法虽然将友谊功利化，但是它本身也呈现出青年人真切的孤独感受与缺乏志同道合朋友的尴尬处境。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不仅能够将学生的诉求从就业市场的要求中分拣出来，也得以将这些诉求细化到不同层面上去，作为重启学生会“为学生服务”职能的重要基础。就以我曾任职的学生会为例，高校学生会虽然在学校分配的任务中看似缺乏空间，但只要通过细部的操作，学生群体完全能够依托这一平台，在不同合力的缝隙，甚至是在行政系统的支持下完成一些“想做的活动”。我们在举办上文曾提及的“语言艺术欣赏晚会”时，曾被要求准备一系列的小型活动作为铺垫。但是这些小型活动的具体题材并不受限，学生群体因此拥有了一定的经费按照自己的意愿举办活动；此外类似朋辈分享会、就业指导会之类的日常活动，其内容更是完全由学生群体自决。面对这些可以把握的机会，学生们常常习惯于选择放弃，但在更加了解自己的诉求之后，我们就必须利用它们来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

上述的零散活动虽然是在不同层面上为各类议题提供解决方案，但它同时也是促进学生群体与学生会之间互为主体性，为失活的学生会赋

予活力的必经之路。在此基础上，学生群体对于学生会的利用也能够逐渐走深。例如面对学生会历来“信息不透明”的问题，我们可以尝试先行要求实习岗位、助教工作等消息的公开，限制辅导员与学生干部对于这些机会的垄断，随后再逐步谋求财务信息的透明化。这些细微步骤的渐次实行，既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群体维护自身权利，也是学生们利用学生会进行政治实践的开端。

诸如此类的尝试恐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完成，但是它所具有的意义也绝不仅仅局限在学生会长一隅。长久以来，高校学生会一直被视为“小社会”，作为就业市场主导的生产流程中的一环，参与到学生商品源源不断的产出当中。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学生会细部的改造，尝试中断现有的运行机制，我们是否能够改变社会主流的认识，甚至为许多人脱离困境的尝试提供帮助？这一契机看似毫不起眼，甚至是被暂时掩盖在有关学生会的诸多负面评论中的。但我认为，从微观处对其进行的文化分析，正是将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展示出来，使得我们能够真正地切入到眼前的细碎小事，完成改造社会的宏愿的最初一步。

墨守成规的生活会更容易吗？

雷纳 · 温特教授谈文化研究

146

墨守成规的生活会更容易吗？——雷纳 · 温特教授谈文化研究

受访者：雷纳·温特 (RW)*

采访人：《热风学术（网刊）》（热风）

时间：2019 年 4 月 30 日上午

地点：上海品尊明捷万丽酒店

录音整理：张少璞**、张淳***



在去年的 Crossroads 大会上，《热风学术（网刊）》曾经采访过 Rainer Winter 教授，请他介绍了他对文化研究建制的一些看法。这一次，趁 Winter 教授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做系列讲座之际，我们从文化研究的建制和代际交替、文化研究的社会干预与批判资源，以及他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基本印象等几个方面入手，再次对他进行了采访。希望可以进一步增进中国读者对于欧洲脉络下的文化研究的了解。

.....
* 雷纳·温特 (Rainer Winter)，文化研究领域国际知名学者，德国社会学学会传媒分会主席，现为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 (Alpen Adria-Universitaet Klagenfurt) 传媒系主任。

** 张少璞，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研究生。

*** 张淳，文学博士，研究兴趣为文化研究、批判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电影。

一、文化研究的建制：理想与动力

热风：首先想请您从您个人的学术训练背景开始，介绍一下您为何选择从事文化研究？当时的欧洲社会是否有什么特定的问题和原因成为您研究的动力？

RW：从一开始我就对批判理论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开始从大学开始就寻找传统马克思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的区别。后来，我有机会旁听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的讲座，关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我自己的学习是从心理学开始，然后进入哲学和社会学。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如果你想了解社会生活，文化，还有主体和文字，你必须把不同的学科视野联系起来。所以，心理学是不够的，心理分析也是不够的。社会学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哲学是思想的源泉。这是非常重要的。但你也需要一个社会的和文化的背景。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对跨学科很感兴趣。如果你想了解各种关系之间的复杂性，或者马克思的意义上的总体性，你就必须把不同形式的知识联系起来。这些奠定了我后来的治学发展的方向。

热风：您认为文化研究跨学科的批评视野和方法的优势和挑战在哪里？

RW：也许我应该提一下，我后来来到伯明翰学派学习文化研究。当时我刚开始做媒体研究的一些工作，那个项目是关于媒介体系和传播技术的演变和发展及其对人际关系和文化的影响。然后，我就开始读文化研究方面，斯图尔特·霍尔的书，等等。当我开始做媒体研究时，很明显，这需要跨学科的工作，以及跨学科的感觉。然后，我开始进行一些媒体文化研究的项目。比如电影的接受，尤其是恐怖电影，还有80年代末的电脑文化，

黑客、游戏，等等。这些研究项目都是受解释性社会学的影响或基于解释性社会学，例如，符号互动主义、文化研究、伯明翰的项目和定性研究。这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然后我开始研究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热风：是，跨学科的方法在分析和理解社会文化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文化研究会因为跨学科的特点面临怎样的挑战？

RW：我认为跨学科的难点就是如何把不同的视野联系起来。例如，在电影研究中，你必须是电影方面的专家。你得掌握电影研究的方法，了解符号学，一种阐释学形式的解释。但另一方面，如果你对电影的社会意义的传播和影响感兴趣，你也必须知道社会学的方法，如何做定性访谈，如何做屏幕图像研究，等等。但我认为这是理解电视剧、电影等社会和文化意义的必不可少的方法。

热风：的确。但是在学科细分的情况下，各项学术评估对发表的要求往往导致跨学科的成果难以归类和呈现。所以我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机构，由于社会的改变、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关闭，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文化研究的机构都在萎缩。您对这一点的观点如何？我们如何在没有一个机构空间的情况下继续我们的研究？

RW：是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新的基地来继续进行文化研究，就像你们中心（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做的这样。我所在的文化研究所是传媒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可以在这里自由地学习英国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历史以及方法。所以这是大学的一次新的自由的重组。但这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批判性分析并不为政治家所欢迎。但随

着文化研究的诞生，西方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学术氛围。现在人们对社会 and 文化的批判性分析很感兴趣。今天的学者总是被要求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但是学术工作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功夫，需要学习各种各样的方法，尤其对于跨学科领域，学习各种不同的学科和理论，从而在这些背景下展开自己的智性研究项目。我认为在我们的语境中找到新的文化研究方法是至关重要的。

热风：能说说当时是如何在传媒系建立起文化研究的项目的吗？
您是如何将文化研究融合到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课程和培养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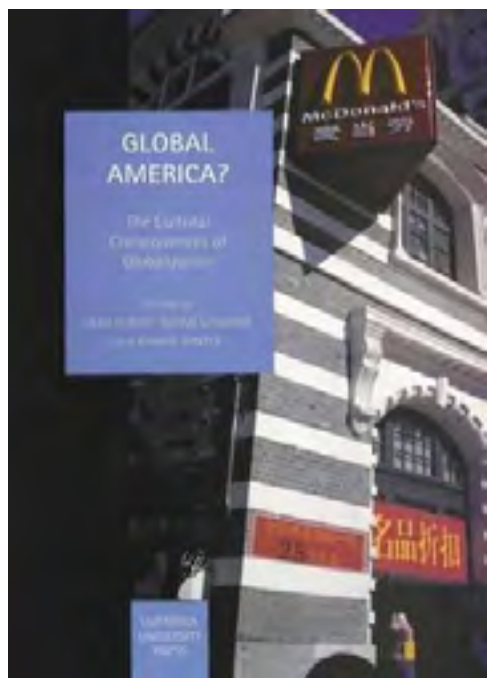
RW：当时来到克拉根福大学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的一位同事，她对文化研究也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对美剧的研究。当时还有几位同事也对这个领域感兴趣。当我开始做文化研究的时候，我正在写我的第二论文——在德国，你必须写第二论文才能得到全职教授的位置。那个论文就是关于文化研究的。然后我开始经常组织文化研究会议，编辑了一系列读本，在德国出版。

热风：那大概是什么时候？

RW：1997 年。1997 年我出版了第一个文化研究读本《文化、媒体与权力：文化研究与媒体分析》，出版了四个版本，现在仍然可以买到；紧接着出版了一系列读本，有《任性的文化：文化研究的挑战》（1999）《快感的政治》（2000）《固执的艺术：作为权力批判的文化研究》（2001）《制造大众：约翰·菲斯克读本》（2001）《文化研究工具箱》（2001）《媒介文化、批评与民主：凯尔纳读本》（2005），等等。所以，我是从出

版一系列读本开始，后来出版了不少专著，包括《全球化的文化后果》(英文，2003)《网络抗争》(2010)《文化研究的未来》(德文2011，中文2014)等。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同事都对文化研究很感兴趣，他们和我合作出版了很多书。2001年开始，我们合作主编了4套“文化研究系列丛书”，包含40多个品种。

Global America?: The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Globalization
ULRICH BECK
NATAN SZNAIDER
RAINER WINTER



热风：所以这些都可以作为教材。

RW：是的，它们都是教材。而且，在2001年，我得到了德国最大的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的邀请，让我编辑一套文化研究的丛书。到今天，我已经出版了50多种文化研究方面的书籍，还有在其他出版社出的三个系列的丛书。然后，我得到了去克拉根福大学任教的邀请。这是德语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文化研究的基地，Brigitte Hipfl教授¹当时已经在那里了。但她更关注性别文化研究。我去了克拉根福之后的两三年，也收到过瑞士和德国的大学的邀请，他们请我去从事社会学和媒体研究方面的工作。但我决定留在克拉根福，因为我真的很想做文化研究。在克拉根福，我可以全力推动文化研究，各个方向的文化研究，这是我所感兴趣的。

.....
1 Prof. Brigitte Hipfl，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传媒系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文化研究和女性主义，以及媒体文化与身份政治。

从那时起,我为本科生开设了关于文化研究的研讨课和其他课程,也为博士生开设了不同的文化研究课程。我认为,在任何时候,你都需要找到有着共同旨趣的人帮助你一起达成目标,尤其是在德国的朋友,他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对文化研究感兴趣。我们一起去了1996年第一次ACS会议,那是在国际文化研究协会成立之前。然后我们开始组织自己的会议,例如,在社会学领域,我们有一个工作组,一直延续到今天。德国的社会学学会会有一个媒体研究的分会,是我们做文化研究的联盟。但在德国的传播学和社会学领域做文化研究的很少,因为整个学科比较保守,相对来说对文化研究感兴趣的人没有占大多数,因为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没有直接的助益。

二、墨守成规的生活会更容易吗？

热风: 那么年轻一代的情况如何? 或者说青年学者, 他们对待文化研究的建制有什么想法? 比如说, 在您退休以后, 年轻一代会有您这样的热情吗?

RW: 是的, 你知道, 我在媒体与传播系, 文化研究是它的一部分。我是研究所的所长。我不知道如果我退休了会发生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情况。但我知道需要寻找的是那些对文化研究有热情、真正感兴趣的人。我已经找到了一些。你知道, 有些人主要对自己的事业感兴趣, 那也没关系。但也有一些人对思想和文化研究充满激情, 或者试图将两者联系起来。

热风: 这说明德国的代际差异没有那么明显? 中国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 年轻学者对于理想可能没有什么热情, 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大多成长于新自由主义的时代。

■ 现场

RW: 德国也是一样。我的学生对我的体系或批判理论不感兴趣，但他们对文化分析感兴趣。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文化研究项目也会非常感兴趣。也许，文化研究会有一张新面孔，它会改变。

热风：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是一门非常流行的学科，但实际上大多数都是文化产业研究。那么，在德国或欧洲的文化研究与政府或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当他们试图做文化政治分析时，会不会有任何联系？他们会支持当地政府的计划，还是会对自己的决定有自己的看法？

RW: 学术研究仍然是独立于政治或政府的。它虽然由国家资助，但它是独立的。所以我们可以与政治家或政府合作，但没有必要。这仍然是学术工作应该是自主的想法。但是现在也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应该为我们的作品或公司资助的研究项目找到赞助商，等等。这仍然是不必要的，但你可以做。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认为许多在媒体和传播研究领域的人为文化产业等工作，没有批判性的观点。此外，学生毕业后可能还会在文化产业工作。我认为这是主流观点，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不采取批判态度，而只采取一种职业视角。我们也有一个媒体融合管理的硕士项目——如果你对传播研究感兴趣，那就把你的兴趣和公司联系起来，比如跨国公司。当然，我们试图引入文化研究的视角，因为这是必要的，虽然我和许多同事都认为文化研究不会来自于经济学、广告等等，但许多学生认为他们必须学习媒体融合管理，因为他们认为将来会赚很多钱。我认为这是一种幻觉，但他们相信。

热风：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教会学生一些批判性思考的方式，或许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会用上。

RW: 当然，我认为批评理论是必要的。如果你在公司工作，你必须

理解经济学、计算、新自由主义等之间的勾连。我认为文化研究会帮助你去理解这些联系，以及各个领域的机构之间的联系。

热风：在中国具有很强的批判思想似乎很难。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学院外，都有权力结构的限制。而空间是有限的，政府、企业、高校，都是这样。很多学生会说他们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去享受生活。但是学了文化研究他们就会发现生活很痛苦，无法再像普通人去享受生活。所以他们会怀疑文化研究理论和批评理论是否有用，还是只会令他们感到痛苦。

RW：我不认为墨守成规的生活就真的会更容易。生活中会在关键的时刻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这个时刻我们必须思考自己所生活的社会背景，思考自己的选择和责任。当然，人们肯定可以享受消费文化的许多可能性，一直到老。但我认为文化研究或批判理论总体上是想帮助你理解整体性，或更好地理解生活。我认为这很重要。

热风：人不可能永远逃避思考，一定会有需要直面问题的时刻。

RW：是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一整天都在思考。日常生活对我们也有好处。因为如果你总是批评它，或者把它和其他可能性进行比较，它就不能正常运转。但你应该知道，如果你写文章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分析整体性。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有区别的。

热风：那么，您认为对于文化研究学者来说，他们有可能创造另一种不同于消费社会的生活吗？

RW：我认为是这样，我认为文化研究学者的成功也是基于一种生活方式。我想很多人都有另一种生活方式。你应该研究一下。我认为这和伦敦的左翼政治生活有关，和英国不同地方的生活有关。

热风：有时有一些人会批评说，因为学者们虽然在做看似批判的文化研究，但仍然生活在城市，生活在消费社会。你对此有何回应？

RW：在 20 世纪 90 年代，文化研究分析了与消费文化相关的快感，还有通过阅读书籍、观看麦当娜的视频等方式获得自我赋权的形式。约翰·菲斯克是最畅销的作家，但他也因为左翼人士而饱受批评。约翰·菲斯克也是左翼人士。但他更开放。他认为消费文化是我们的一个背景，我们生活在消费文化中，你无法逃避，除非你生活在另一个社会。消费文化是我们的一个经验视野，我们必须应对它。在消费文化中也有新的可能性。这也是文化研究反对激进左派的观点，你必须思考我们在消费文化中有哪些赋权的可能性。

热风：菲斯克展开其研究的时代，是电视的时代，而现在是网络时代。您认为菲斯克的结论在这个时候仍然是正确的吗？

RW：我认为他的许多想法在今天都是正确的。比如他对电视文化的分析，他研究了很多他那个年代的电视剧，例如《迈阿密风云》。但是今天，我们有《黑道家族》《权力的游戏》等高品质电视剧（quality TV）。所以，电视也有不同的审美群体。我们在这个严肃的问题上所需要思考的东西是非常复杂的，比如有趣的情节，人物的发展，等等。他提出的许多观点至今仍适用于电视文化。现在我们要讨论或思考并分析数字文化和模因（meme）。例如，对于参与性文化，对于文本，对于消费者的创造力，会如何改变形象的意义。有很多形式的创造力、生产力，你都需要重新思考。有时对网络文化的数字文化分析是非常乐观的，过于乐观，因为今天我们知道网络文化也是监视的文化。但我认为我们需要辩证的观点，我们必须看到两种可能性。我们必须对活跃的数据进行评估，我的意思是另一方面，监控，控制，等等。

三、文化研究的社会干预

热风：您在昨天晚上的讲座中说到，在德国或者欧洲，线上和线下之间有很强的联系。当年轻的学生从网上得到信息时，他们可以在街上聚集在一起。那么，您认为社会实践和媒体研究有什么联系？在我们的研究之外，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社会实践？

RW：视情况而定。这取决于不同的情况。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理念是社会干预，是公共教育学的一种形式，做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最好的例子是斯图亚特·霍尔，他一生都是英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他为《卫报》写文章，批评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他从事学术研究，并把他的学术研究与政治干预联系起来。但你必须找到像《卫报》这样的平台邀请你写文章的可能性。但我认为这是文化研究非常重要的面向，而且，你们所做的已经为文化研究找到了一种公共形式，例如，在书店里的论坛活动。顺便说一下，两年前我被邀请去杭州，去了一家很棒的书店。他们有很多阅读材料，可惜都是中文的我看不懂，但是那个书店就举办了有很多观众的讲座。

热风：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我们都知道它起源于德国，后来旅行到美国，并在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想知道现在德国的文化研究学者怎么看待法兰克福学派？

RW：是啊，我的一些朋友，出身于文学的和社会学的，都对法兰克福学派非常感兴趣，但令人惊讶和失望的是，英国文化研究没有读过法兰克福学派。我在刚刚发表在陶东风教授主编的《文化研究》杂志上对斯图亚特·霍尔的采访中，问到过法兰克福学派在英国的接受情况如何？他对我说，由于当时大部分的文本都没有翻译，影响并不大。他们后来读了一些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书。在文化研究领域有很多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持批判态度，认为他们非常精英主义，认为大众文化都是同质性的，不可能改变任何东西。如果你阅读大量文化研究学者

的文章就会发现，即使他们提到法兰克福学派，也是从消极的角度提。他们对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批评，以表明他们自己的方法是更好的。因为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感兴趣，文化研究对利益进行干预，而法兰克福学派对公共干预不感兴趣。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阿多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回到德国后，就在电台和电视台工作。他做了很多努力寻找更广泛的受众的工作。我认为这很遗憾，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之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媒体文化》这本书的很多文章中都提到过这一点。由于这两种方法都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且从一开始都是跨学科的，因此，将不同的方法联系起来是非常必要的。

热风：听说很多德国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表达不满。他们说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看法在当今社会是完全错误的，人们正在改变。但我仍然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仍然具有有效性，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或重新参与。

RW：对。上周，我来到中国的第一天，又读了一遍《理智的月蚀》，这是霍克海默于 1947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给学生们做的系列讲座。我认为直到今天它都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但是没有人读它，没有人研究文化。因为伯明翰学派和我都能理解，他们有兴趣有自己的方式。大多数人主要对流行文化感兴趣。但我也曾在霍尔家的客厅问过他，我在他的家里看到了很多书，他对我说，他对流行文化感兴趣，但是是出于政治原因。因为这个想法就是，如果你分析流行文化，你可以了解它的影响，人们的感受，然后你可以介入，分析当前的情况。我的印象是，很多文化研究从业者真的认为流行文化比其他形式的文化更重要。我认为流行文化里也有一些有着的非常好的品质，不应该僵化地区分流行文化和高雅文化。有些具有娱乐性质文化也可以很好，像《权力的游戏》《广告狂人》等美剧。它们的制作也是非常严肃认真

■ 现场

的。它们的原著都是非常棒的小说，作者都是值得尊敬的，所以流行文化也是会制作精良的。所以，这是相对的。

热风：您认为文化研究的学者应该同时是公共知识分子吗？

RW：可以试试。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是很困难的，你需要一定的，怎么说呢，为报纸写作的能力。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也会受到严厉的批评。如果你认为你能做到，你就应该去做。但这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即使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可以成为文化研究学者。

热风：您认为对有些人来说，如果他们有能力，他们仍然有可能做互联网时代所说的那种公共知识分子吗？

RW：是的，当然，这很容易。我们有博客，会有观众，现在的公共领域是非常分散的，你不知道谁读了你的博客。过去比较容易。你为《纽约时报》和《卫报》写了一篇文章，每个人都会在看。但今天，《纽约时报》《卫报》只是众多媒体的一个选择。人们还有其他海量的选择。所以这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我们仍然有公共知识分子。

热风：那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呢？

RW：有机知识分子也很重要。它与公共知识分子不同。在葛兰西时期，社会上有鲜明的阶级差异。有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但今天，西方的工人阶级是分裂的，他们有的也支持右翼。

四、社会主义文化会是一种资源吗？

热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有一个社会主义时期。德国也有过西德和东德的时期。我想知道东德的社会学或批判哲学是什么，你会把它们和文化研究联系起来吗？

RW：是的，有一些项目。在西德也有类似的文化研究项目，他们也发

表了很多斯图亚特·霍尔的文章，这也是一种文化研究的形式。但是在东德，据我所知没有学校在做文化研究。你知道，东西德统一对许多在东德大学工作的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们都失去了工作。所以，可以说西德殖民了东德。我认为这是一个遗憾，因为东德学者的很多想法和项目都失败了。东德也有流行音乐教授，但我想洪堡大学可能是唯一一个。当然，会有很多人对此很感兴趣。我见过他们中的一些人，他们对批判性思维很感兴趣。但西德对这些传统或马克思主义并不感兴趣。所以我们解雇了所有的人，非常残酷。

热风：在中国大陆，有时一些学者会尝试研究社会主义文化。他们试图从当时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寻找一些思想资源。所以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东德曾经的社会主义文化将成为一种武器或者不同的资源，来对抗消费社会？

RW：你知道，我们在西德也有社会主义传统。西德也有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我得说我以前从未去过东德。因为，我认为它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同的国家。所以，我在西德也对批判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很感兴趣。但是，在东德，我不确定你今天能否找到社会主义的传统，我认为它们已经消失了。据我所知，很多东德的人都支持极右的政党。我昨天提到了所谓的反难民的运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每周都在示威，也许就在今天。但是对于我来说，对于移民和一个国家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以前的东德地区现在完全改变了立场，过去我们在西德没有这样的右翼立场。但现在他们来自东德。

热风：那么您认为一些人在一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从极左变成极右的原因是什么？

RW：很难说，我们应该分析一下。这很难说，因为动机是不同的。我从

从来没有做过关于 DDR² 的研究，我认为很多年轻人在东德感到沮丧，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认为移民应该对此负责，这是很典型的心态，移民是替罪羊。东德也被西德去工业化了，在很多地方已经停止了生产。但在统一之前，人们都有工作。所以他们一定很沮丧。但我们不批评有权势的人。官方的说法是，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在德国，你不能说我是社会主义者，别人会说你疯了，因为媒体、学者都来自西方。所以这已经不可能了，社会主义国家被污名化了。西德完全殖民了东德，他们关闭了原来的工厂，承诺给他们塑造一个消费文化。

热风：在当前全球右转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能站得住脚吗？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代能做些什么呢？

RW：我认为追随马克思，思考马克思，分析今天的资本主义危机、广泛的危机和右翼的回归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也有过类似的现象。这也是一场资本主义危机，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国都出现了右翼回归。德国右翼回归的基础是希特勒与国家社会主义党和企业的联盟。他们不得不用利益宣传来操纵人民，这是一个背景。今天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操作。昨天我们讨论了社交媒体，尤其是在东德，出现了拥护极右政党的人，其实他们一直在操纵人们。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批判地看待马克思。但我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很重要的是找到另一种基础，用反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来替代当前的经济状况。我们必须理解资本主义是如何运作的，但这仍然是我们当下的处境，它变化得如此之快。今天我们发展了一种新的文化，你可以看到它。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贸易、经济关系，都具有了数据和社交媒体的表达形式。在西方，我们私人领域的信息会被卖给大公司。资本主义的支柱是经济，我们必须联系起来，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和文化研究

.....
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语：Die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简称“民主德国”（德文缩写：DDR），俗称“东德”，是 1949 年 10 月 7 日到 1990 年 10 月 3 日期间存在于欧洲中部的社会主义国家。

的理念，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联系起来，或许还有精神分析、文化分析的形式，等等。因此，单靠马克思主义是不够的。我认为这也是马克思的思想，因为马克思一生都在尽可能多地阅读和写作，今天我们文化分析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五、中国的文化研究

热风：您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研究？

RW：我想我来中国是为了更多地了解这里。我看到许多像你们这样的人，对文化研究非常感兴趣，致力于各种文化研究项目。这是我来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我认为做文化研究真的很有趣，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这里也许很难，或者说更难。

至于区别，我想我在中国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人，他们对我说他们做文化研究，但他们做的是文化的形式、文化符号，但不是文化研究、跟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等等完全没有关系。我对文化研究中的政治条件更感兴趣，因为文化本身是不够的。我想国外很多文学研究者都是通过阅读小说来学习的。例如，在我的大学里，英语系的学生很少有文学方面的课程了，詹姆斯·乔伊斯的课程几乎没有了，但是他们有关于网络游戏和电影电视的一系列课程。我认为这很糟糕，就像我对他们说的，应该学习英国文学或美国文学等课程，应该学习乔伊斯，而不是网络游戏和电影。

很多从事文学研究的人说我们现在在做文化研究，但他们只对看电影和电视剧感兴趣。但是，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比如社会问题，城市化问题，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等等。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此，文化研究能做些什么？这是文化研究的起点。

我在多伦多送外卖

■ 徐道衡*

我从硕士毕业到现在基本一直呆在加拿大多伦多。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给我最多收获的经历不是别的，而是一份我曾经想也不会想的工作——外卖送餐员，虽然我干了只有半年不到。这个并不稳定，也不那么典型的海外工作状态，让我对工作有了比以往更复杂的理解。而因为身居加拿大，也让我以工作为中介，对这个在我们的全球视野中常常没什么存在感的国家，以及异国生活，有了比曾经丰富得多的认识。

一．我为什么不工作？——一份未完的答卷

比起工作，我没工作时的状态和想法或许更值得一说。

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工作状态很不稳定，工作伦理也正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但“具备工作能力的人，在到达一定年龄后，就必须工作”这一对于人和工作关系的基本认识，依然是大多数人的共识。然而，“必

* 徐道衡，前外卖小哥，现自媒体工作者，音乐评论人。

须工作”的“必须”两个字，其实暴露这样的工作动力常常不是主动形成，而带有某种被迫接受的意味。事实上，从本科实习开始，我自己的工作经历和对工作的理解，就一直围绕着这一被动的“必须性”展开。

实际上，不管对于有工作还是没工作的人，这种“必须性”总被假设不工作所导致的各种消极的自我认识支撑着。比如，“不工作就没钱”，“就算有钱，不工作就是不给社会作贡献”，“就算有钱，游手好闲也是不对的”，等等。而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些各式各样保障“必须工作”的消极认识并不是无差别的——它们的“保障力”完全不同，其中最有力量的“不工作就没钱”。而对工作和挣钱的解绑，恰恰构成了表述其他不同消极认识时，那个总是相同的让步状语——“就算有钱”。这一表述办法的确很直观地反映出今天遍及全球的社会现实，许多人工作的首要诉求是谋生。

然而我刚来多伦多时的情况是，我太太的收入基本可以维持我们两人的生活。因此，把我推出门去工作的力量就必须依照上面所说的方式形成——就算我暂时能顾温饱，不工作怎么能让我觉得不对劲呢？对许多人而言，这种“不对劲”可以是懒惰，不独立，“寄生”（比如“啃老”，我这里是“啃老婆”，似乎更加恶劣），缺乏对他人的贡献，逃避社会现实等各种“不良”感觉。而对我而言，这些都不奏效。因为好巧不巧，我来加拿大之年刚刚读完文化研究专业的研究生。虽然最后的论文和“工作”议题没有直接关系，但以“工作”为核心的学术理论，尤其是其中那些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作的方式、制度和文化，及其历史原因和社会条件持批判态度的知识成果，是我和同学们的重要学习内容。于是我开始了一种围绕我为什么不出去工作的“学以致用”——利用这些学术知识进行有时诚心实意，有时也虚弱狡辩的讨论。而讨论对象基本就俩人——我太太和我自己。

先说我怎么在脑子里和自己打架。其实无非就是调动所知的批判性的理论来自我说服。这一过程最让我伤神的，倒不是自己对于这些“工具”明显带有自欺欺人嫌疑的选择性使用——因为很少有全盘否定工作意义的学术理论，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摘选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最难过的其实是，即便面对某些相当激进，十分有利于“合法化”自己不去工作的论述时，我还是底气不足。

这样的底气不足当然和许多人试图逃避工作时的常有情绪类似，但对我来说，它更麻烦的一方面正恰恰源自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文化研究强调社会实践和以学院为主要场域的知识工作的同等重要性，鼓励我们在更广泛的实践活动中推动自身和社会的进步。这么说起来，我躲避工作这一最常见的社会实践方式，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似乎都在违背自身所学。这带给了我一种知行不一的羞愧。而且，我还把曾经学习到的知识用作自我辩解，简直有点欺师灭祖了。但每当这时，我就会就拼命思考真正具有批判力量，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实践和“常规”工作之间的“根本区别”到底在哪，仿佛想以此作为自己不积极面对工作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令我颇感绝望的是，其实我心里明白，这根“救命稻草”不会已经长在某个地方，等待我找到，而应当通过不断的亲身投入和探索逐渐“培植出来”。我们几乎无法将各式各样的工作按照所谓“批判性”和“进步性”从高到低分类排序，大多数工作应该都可以通过参与者自身的努力，从而具备对人对己的有益力量。想到这里，我似乎应该欣然而热情地投身工作，但实际情况却是，我还是没什么兴致去找工作。

而当我和我太太讨论时，形势则更为“严峻”。因为她也从事批判性的人文研究，而且论学力，论对于工作思考的深入程度，甚至光论辩论的能力，都比我强得多。我自己尚且矛盾重重，无法自我说服，

加上“吃人嘴短”，在和我太太的辩论中，更是几乎“屡战屡败”。但她的反驳、建议、理解和耐心，也没有让我有多少变化。

之所以如此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根据自己已有的工作经验，加上对周围人的观察，让我觉得在现实中，很多工作并没能帮助参与者和
社会进步，甚至有时在参与者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后。相反，许多工作依然有力地维持着并不让人满意的现状，甚至时常让它变得更加糟糕。这样的判断当然掺杂着我理解工作和现实关系时的“短路”，自身的“洁癖”，甚至懒惰，但它并不完全虚假，它反映了部分的实际情况。

不工作，或者说不愿面对工作的状态，让我对自己的研究生学习和它与工作的关系也产生了在学校时完全不曾有过的想法。文化研究既教会了我如何对工作进行批判性思考，也鼓励和告诫我应当勇于投身社会实践。当我在校园里时，这两方面从未形成对立。但走出校园直面工作时，它们总是在我脑子里不停地“相互搏斗”。如此之外，还有说来有些令我哭笑不得的事。那就是我为自己不工作辩护时的底气不足，其实暴露了自己的“学艺不精”。正是在离开学校后，我才切实意识到自己对很多关于工作的学术理论其实一知半解，以至于我常常无法有效地使用它们来进行讨论。坦白说，我在多伦多的这两年里，对于学界关于工作和后工作的讨论比以前上心多了。真的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好像只有切身遭遇时，才开始对相关知识有了真情。

我无法说清自己在多伦多呆了两个月迟迟不工作的原因。即便到现在，我也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坚实的工作“必须性”。虽然正在从事自媒体工作，但怀疑和踟蹰还是时不时冒出来。或许这样的“必须性”本身就很可疑，又或许对于工作的信心并不能预先建起，而需要在工作本身中慢慢形成。可如果是这样，那我要怎么开始呢？

二. 我干了什么工作？——外卖小哥和“占路运动”

最终，在持续不断的自我苦恼和时而出现的夫妻争执后，我还是出门工作了。我很难说清当时决定工作的原因，其实无外乎还是那些常见的“不工作就意味着……”的被迫性认识在起作用。但工作过程中的种种经历却带给我很多思考。也许工作就是这样，不必找寻动机，干了再说，而工作中的乐趣和苦恼很快会冲淡开始前的苦思冥想。这么理解工作，似乎有些回避问题，甚至有点反智，但我的实际经历大约就是如此。

着重说说我在多伦多第一份工作，“优食”（Uber Eats）外卖送餐员——虽然在很多人眼里，这不算一份“正经”差事。“优步”（Uber）公司在中国大陆只开展过实时共享的载客车辆租赁业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优步”计程车。但其实在全球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在北美和西欧，“优步”的另一项重要业务是送餐，也就是“优食”。“优食”分两种，骑车送和开车送。我没有机动车，于是买了辆便宜的自行车送，前前后后累计过了几个月的外卖小哥生活。

和很多国家情况类似，在加拿大，像我这样没有当地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最初是来陪伴家人的外国人，想要找到一份工作并不容易。但很快，加拿大这个移民对其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影响巨大的国家，就对我展露出它特有的一种和工作有关的制度。加拿大政府对已取得学生签证或工作签证的外国人的配偶，也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允许其申请一种叫作开放工作签证（Open Work Permit）的身份。开放工签使我们可以长期驻留加拿大陪伴配偶，同时保障合法工作的权利。而这种签证的签发成功率非常高。在官方的对外宣传话语中，这是加拿大向世界展现友好和体现人道主义的表现，也是作为其根本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化多元主义的证据。但毫无疑问，这也是这个长期依赖移民的

国家保持经济活力的一项必然政策。

虽然在工作权利的层面，开放工签持有者和普通工作签证（Work Permit）持有者没有差别，但很显然，我们这群人在加拿大的身份更不稳定——一旦配偶的签证到期，我们的开放工签也将同时到期。而且，如果我们有能力找到一个能为自己申请普通工签的雇主，几乎没有人会申请开放工签。那么，种种现实情况决定了开放工签持有者中的很多人只能去做流动性较高，收入较低，风险较高的工作。而这些大多是本地人不太愿意从事，却对加拿大社会运转同样重要的工作，比如送餐员。实际上可以说，开放工签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底层工作机会，还降低了政府打击“黑工”的行政成本。作为一名持开放工签的中国人，我就一开始被镶嵌在了加拿大特定的某种“移民工作结构”中。

这份工作最大的问题是钱少。以我的体力，在大多伦多的用餐高峰时段，比如周五晚上，每小时最多也只能挣差不多 25 加币，折合人民币 130 元。当然，这和我一直不高的工作积极性有关。我每天固定午餐和晚餐时间工作，加起来工作四到五个小时，工作时间在我认识的工友中算平均值偏下一点。工作收入完全不可能养活自己。这也可以看出我并不处于典型的工作状态中，有一点像是没有温饱危机，闲着也是闲着，找个活干。除了钱少，这份工作对我而言，看上去没有什么缺点——工作时间高度灵活，无论业内业外都没有明显竞争，没有人事上的顾虑和烦恼，几乎不存在工作监督（送餐过程中甚至可以停下来休息，“优食”给顾客预计的送餐时间对于骑手而言还是比较宽松的。而且晚一点不会有任何惩罚，顶多是顾客埋怨一下，当然这和多伦多相对温和的民风有关），甚至没有想象中那么累（我的体力虽然不差，但也绝对算不上好）。除这些以外，还有一点很关键，我当时没有尝试去找任何其他工作，就径直去了

位于多伦多新兴企业聚集地 Liberty Village 的“优食”办公室申请成为骑手。其实重要原因之一是申请流程简单，并且几乎不存在淘汰。经过调查之后，我发现在能干的工作中，即便是去中国城的超市和餐厅后厨做杂工这样一些对我而言入职成功率较高的工作，也都需要面试，并且存在竞争。但我只在“优食”办公室呆了五分钟，就顺利上岗了。在五分钟内，一群看上去也不是固定雇员的年轻人中的一位南亚小哥接待了我，没有问任何面试性质的问题，只是录入了我的护照信息，给我看了一个介绍工作流程的视频，让我在一份很短的工作协议上签了名，我就拿着25加币买的送餐包离开了。

然而实际上，这个看上去对求职者十分“有利”的地方，对于包括加拿大在内，大多数国家的送餐员来说，正是这份工作中的最大隐患所在。

“快捷”的入职方式一方面反映出送餐员在目前多伦多工作市场中的供不应求，但更重要的是，隐藏在它背后的是我们和“优食”极为松散和权责不清的关系。可以说，这恰恰是以“优食”为代表，今天广泛存在的，依靠网络平台提供即时日常生活服务的新型中介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关系的核心问题。

“优食”不仅不提供劳动工具，也不提供任何福利，更重要的是，“优食”也不为送餐员提供实质性的工作安全保障。干过的人都知道，这可是一份相当危险的工作。工作没几天，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坐在 Trinity Bellwoods 公园等接单时和工友们聊天，得知之前英国伦敦的一位“优食”骑手送餐时出车祸受重伤，“优食”推诿不理。最后在地方工会和劳动维权组织的干预下，才很“委屈”地赔付了伤者的部分损失。我当时恍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向老资格的工友询问，加拿大人权状况之好，几乎可以说闻名世界，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工会或者类似组织。我也在之后几个月的工作中，时不时问工友这个问题。综合大家的看法和自己的调查，最终发现，这是一个很复杂，并且和加拿大具体国情有关的困境。

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我慢慢发现和某种刻板印象不同，在加拿大的外卖骑手（不只是“优食”，也包括其他公司）并不只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及地区的外国人和移民。实际上，在大多伦多的这一群体中，有相当数量的本国人。更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些本国人也不是我们想当然的经济状况一般甚至欠佳者，其中有不少来自中产阶层。甚至有少数相当富有的人在做外卖骑手，我曾在 Harbord 街见过一位骑手结束工作后，把他昂贵的自行车固定在更昂贵的沃尔沃 V60 旅行车后，驾车扬长而去。我无法完全说明这一情况形成的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和加拿大的自行车文化有关。和很多非发达国家不同，在加拿大，骑车更多时候不是一种更经济的通行方式，它常常是一种惬意自得、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不要说专门骑车锻炼和休闲的人，在大多伦多的马路上，即便是骑车代步者，一眼也可看出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穷人。

因此，多伦多骑手们的经济状况、社会阶层，乃至身份认同都比较复杂，这决定了以行业和工作内容为纽带，以追求基本工作保障为主要目的的同业者联合体并不容易形成。我的工友中既有像我这样暂时不愁温饱，不太计较收入，工作积极性不高的中国人；也有努力接单，要以此养活自己甚至家人的难民；还有骑着他一年送餐收入也买不起的高级公路赛自行车，经常暂停接单，坐在公园长椅上喝啤酒听音乐的本地有钱人。而从之前说到的工作安全保障角度看，我可以部分享受我太太学校提供的配偶健康保险，难民工友必须依靠政府提供的最低相关保障（事实上，他们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受不受得起伤”和“生不生得起病”。而是如果一旦出现健康问题不能工作，即便不用自己掏钱养伤看病，他们也将没有收入，这才是最大的问题），而有钱工友除了加拿大的国民医疗福利外，可能早已拥有一份，甚至几份高级私人健康保险。

无法向“优食”索取工作安全保障，我还是开始琢磨在工作之外寻求依靠。其实我的动机也不全是落实自身的工作权利，而是想借此更快

更深入地了解加拿大。有一天，我去多伦多一家很有名的自行车行 Bike Pirates（“自行车海盗”）修车。这间车行以 DIY（Do it yourself，自己干）精神为本，免费提供工具、场地和全城搜罗来的二手配件，也售卖少数价格实惠的全新配件。“海盗”的原则是自己动手修，遇到困难有师傅指导帮忙，实在搞不定，也可以请师傅或者周围的人代劳。车行不收取劳务费，临走时按时间缴纳很低的场地及工具租赁费和修车所用的材料费，同时欢迎捐赠。“海盗”不仅聚集了大量有趣的自行车主，也是多伦多有名的 LGBTQ 性少数族群聚集地。我想这么个另类的地方，应该能找到点门路吧。果然，和坐在身边一起等空余修车架的哥们聊天，得知不久多伦多的一些骑行者将在市中心举行活动，抗议保守党主政的市政府削减自行车道的提案。

可能是因为对这样的活动太过陌生，有些拘促，那天的活动我并没有直接参与，而是在一旁观察。当天，近百名骑行者带着他们的爱车占领了地处城市核心，多伦多大学附近的 Bloor 街和 St. George 街路口。他们把自行车放倒在十字路口，自己则倒在车旁，将这个多伦多的交通咽喉封锁，表演一场超大型的“交通事故”。更让我振奋的是，其中就有来自包括“优食”在内的各大送餐平台的工友们。那些印在送餐包上的各公司标志，在那一刻格外惹眼。行动主旨显而易见——如果政府还要将不断被机动车侵吞，日益减少的属于自行车的城市道路空间和路权让给机动车，后果就是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所有骑自行车的人将面临愈加严酷的安全问题。很多滑板族也闻讯前来支持，不少路过的人也驻足声援，表示城市道路应该属于所有人——踩滑板的人，骑自行车的人，走路的人，跑步的人，坐轮椅的人，手执盲杖的人，而不应该只属于开车的人。

这场“占路运动”让我想起研究城市问题，积极参与城市空间抗议行动的知识分子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这位城市空间研究专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在 1960 年代末因为积极参与抵制美国纽约曼哈顿高速公路计划的活动而遭逮捕，后移居多伦多。正是在多伦多，



▲ 我的劳动工具：自行车和送餐包

为了保护城市公共空间和以此为基础的社区文化，她领导并参与了著名的抗议 Spadina 大街高速公路计划的一系列活动。这一活动对半个世纪以来多伦多的城市形态和日常生活文化都有着很深的影响。有意思的是，那次“占路运动”就发生在 Spadina 大街旁边。多伦多至今被公认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保证宜居的重要原因其实也包括“宜走”“宜骑”“宜滑”等这些很具体的空间使用感受。而多伦多的宜居也和在雅各布斯的影响下，一直以来当地普通人广泛参与的各种城市空间保护活动密不可分。

观察完这场“占路运动”后没多久，我就因为终究不太喜欢而停止了送餐的工作，开始计划做自媒体。但这个和我具体工作看上去几乎无关的行动，却是我“骑手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从自身的移民劳工身份所导致的非稳定工作状态及其安全上的无保障，到以传统方式难以诉求，再到接触多伦多当地的另类空间，最后到亲身观察这次行动，这其实是一次极为完整的经历。它从具体的关于工作的担忧和思考开始，

最终越出工作本身，到达更广阔、复杂和生动的现实中。这或许能回答我在第一部分的疑虑，对于工作的动力的确难以先验地存在，它更可能是在具体工作中通过探索而确立。而对于工作的信心，似乎也并非因为具体的工作成就而增长，它或许同烦恼、担心、焦虑，甚至恐惧的出现，以及在实践中对所有这些的思考一道生长。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无法被切分成工作和非工作两部分，那些所有看上去处在“非工作”部分，甚至和自己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可能恰恰决定了我们的工作状况。

就在我修改这篇文章时，一天在多伦多地铁上看到了下面这则宣传广告。



这是和“优食”类似的另一家送餐平台 Foodora 的工友们发起的联合呼吁，上面写着：“我们是给你送餐的快递员。我们需要：尊重，健康和安

两个需求很好理解，“合理的报酬”和 Foodora 的一项具体规则有关。使用 Foodora 的订餐者可以在餐点送达后给快递员小费，这曾经吸引了很多人加入 Foodora。但之后有不少快递员抱怨，自己的小费远远不及服务业的平均标准，很多时候甚至得不到小费——这就是“合理的报酬”这一需求的由来。在加拿大，餐饮小费一般会在总消费的百分之十到十五，而且不出意外，消费者都会支付。小费虽然有着名义上的“自愿性”，但早已成为一种必须的付出，是很多国家工作制度和文化的重要部分。它不仅激励普通的服务业从业者用心工作，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保障着“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朴素工作伦理，还象征着通过工作获得的认可和由此产生的尊严。

Foodora 工友们的遭遇，在我看来，一方面反映出，至少在多伦多，送餐依然常常不被当成是一个“正常”的工作而得不到应有的，和其他工作相同的尊重。另一方面，这其实是 Foodora 的一种诡计。通过虚假的奖励机制，Foodora 不仅吸引了更多人为其工作，还无形中压低了劳动力成本。同时，它还把因为收入工作的降低而可能引起的麻烦和风险转嫁给订餐者和送餐员——这是你们两方的事，和我无关。真的无关吗？这恰恰是今天以 Foodora 为代表的新式中介企业最障人眼目的地方。我们常常觉得它们只是一个作为中介的网络平台，甚至积极地认为它们在为我们的生活创造“便利”。而实际上，就如多伦多 Foodora 工友们所面临的具体情形，在这些中介公司参与搭建的新型工作关系中，受损的不仅仅是送餐员的健康、安全和收入，还有曾经深植于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而受益者，似乎只有中介公司。Foodora 的工友们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就像那场“占路运动”一样，希望这则呼吁能帮助我们所有人更深入地想想，在今天日新月异的工作形态中，我们能为自己和他人做些什么？

太太陈曦的回应：

这里仅表达一些有限的和临时的看法。我认为当我们在讨论工作的时候，实际上在讨论不同层面的问题，但往往容易混淆。如果说工作的本质很多人认为是“谋生”，那么这个“生”有几个意思。“生”的基础是生命，活下去，意味着要吃喝拉撒，衣食住行。人之为人的初始，是跟自然互动，生才继续下去。只不过现在这一过程被现代的城市发展，国家管理层层中介，大部分城里人的“生”被局限在非常有限的范畴，工作的形态也变得有限。从这一点上来说，寻找有意义的工作的确意味着寻找生活的意义。但不意味有限形式的工作就会局限生活的意义。我与徐道衡的观点不一样的是，我坚持不管什么样的工作，只有实际做了才能明白其中意义，并不存在先入为主的有意义或无意义的工作之分。

“生”也意味着“生计”，或者说是人与人基本社会政治经济关系。说的窄一点，现在的生计大部分受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所限。很多人的困扰是这个生计是由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决定的，从职业受训，工资价格，工作条件，工作时数，到个人成长都要受到这一市场关系的制约和剥削。因为有异化的过程，所以不喜欢工作，抵触工作倒是很好理解的人之常情。但是从大一点的方面来说，生计意味的是建立公共关系。小到自由职业，家庭作坊，大到跨国企业的工作，都是在参与公共社会关系的建立。我比较反对的是因为不喜欢“异化”的工作而退回到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只关注自己的爱憎，爱惜一个抽象的“自我”。而忽略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积极建立公共社会关系的一面。实际上在工作过程中，很多东西是无法用工资或钱来计量的。尊严感，成就感，人心的丰富，知识技术的积累，都需要在公共关系中建立。我认为不管什么形式的工作都有积极建立公共社会关系的一面，也是需要实践才知道。至于挣钱，我没什么资格说，我在我工作中贴的钱（交学费、开会的路费、付费请编辑帮我改论文等等）有时候比挣得还多。这是我自己的局限，这也不该是谋生的常态。

一粒原子的实践进行时

■ 树彧*

序幕

主要场景：一个安徽普通家庭

核心情节：学渣逆袭，考上大学

我出生于安徽，自小最大的本事就是闯祸。孩提时代整日溜鸡撵狗、上蹿下跳，少年期又迷恋上了动漫和游戏，更加无心向学。全家上下虽头疼不已，但也不奢望补习班、兴趣班之流，就能把我塑造成更好的人。

尽管是个出名的学渣，一番发奋后也顺利考上了大学。老家仍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旧思想，所以，自考上大学后，我在家中的形象就从“魔星”一跃成了“楷模”：每逢亲戚邻里因为孩子调皮、不爱学习之类的事情发愁，长辈们就把我搬出来做案例。然而，老人们不晓得，自从教育改革、大学扩招以后，学历早就不再是什么阶层跃升的天梯，大

* 树彧，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毕业生，创业者。

学生已没什么稀奇，而大学也只是一所“很大很大的学校”，主要目标是为社会和企业批量输送年轻廉价的劳动力。再加上就业市场上僧多粥少，想谋份合心意的工作很难，自己孤身一人在外念书生活，难免常有漂萍之叹。

每逢放假回家探亲，我都倍感尴尬：一面是家族的期待，一面是自身的平庸。当热闹褪去，独对孤灯时，就不免有几分捉襟见肘的困顿。

第一场

主要场景：一家上海动画公司

核心情节：放弃工作，决定读研

大三时，和其他同学一样，我也开始外出实习，由于喜欢动漫，我在一家动画公司做起了剧本文案工作。实习生活出乎意料得艰苦，我时常要和项目组的其他前辈们一起，被扣在公司里通宵开工。而更令人不解的是，明明执笔的人是我，但当剧本完成后，我却完全不觉得这些故事和我本人有什么关系——按照老板的要求，角色设定照搬自国内某知名 IP；故事内容抄袭自国内外各类相似题材；品质内涵没要求，数量效率更关键。

彼时，尽管只拿了非常微薄的酬劳，我仍然感到羞愧，觉得自己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于是，向老板谏言，想贡献一些“不成熟的小建议”，却被老板大手一挥驳回：“从没期待你能有什么创意，也不需要你有什么

创意，当时选你，就是看你对同类题材的作品还算熟悉，模仿起来该比别人像几分”。

老板说得明白，我却不明白。原以为编剧该是一份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怎么到了我这里，就跟在工厂流水线上拧螺丝似的？如果我变得更优秀、更专业，是不是情况就会不一样？

我决定，暂时先不忙着找工作了，还得继续学习！

第二场

主要场景：一所上海高校

核心情节：暂缓学业，入世历练

主意一定，我就开始四处搜索各类专业的简介与资讯，偶然在网上浏览“文化研究”专业的相关介绍时，看到有对“文化产业”和“生产机制”问题的讨论，顿时大喜过望。我想，要是读了这个专业，肯定能脱胎换骨、如虎添翼，从此炸裂地翱翔于文化产业的苍穹之上！

与本科时常翘课溜边儿混文凭时的心态不同，这次我决定，一定得学出个道道儿来。但可能是学渣做得太久了，硕士阶段的学习遍布挑战与荆棘。幸而，老师们毫不吝惜倾囊相授，又有师门同窗的爱护扶持，经过一番努力，我总算是摸到了些门道，也越来越沉浸在专业的魅力与学习的快乐中。只是，偶尔回想起求学时的最初目的，亦免不了发愁：越是深入研



图片取自网络

习，越会发现，“文化研究”的目标与理想，与更好地适应当下“文化产业”的游戏规则之间，不仅存在巨大的鸿沟，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脱胎换骨”有之，“如虎添翼”未必。

毕业那天，我在学校的小湖边坐了一整天，思考未来该怎么办。如果能以学者的身份继续思考、学习，做一辈子的“文化研究”，何尝不是美事？然而，家人的期待、落户的压力，如果我做出这样的选择，会不会太自私？再加上，我对所学本身也心存疑虑：通过对一些师友及其作品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有些论证虽然也有大量田野和实践材料作为佐证，但难免有剪裁现实、削足适履的嫌疑。如果真是这样，我在学校里所能学习、理解到的“文化研究”，会不会更偏于象牙塔内的建构与想象？作为一种以分析、理解现实，尝试提供优化方案为目的的学科，若是没有对现实的深入理解，而只是退回书斋，“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样浅尝辄止、留有退路的人生，真的足够吗？学功夫，总是为了上擂台的，不仅要上得了擂台，还要能打赢，如果招式无用，那干脆放弃也不可惜。

思来想去，我决定，先暂缓学业，充分入世走一遭，在谋生的同时，也尝试将我对文化研究的所学所思，在现实中找到可以具象落地的方法与途径。

第三场

主要场景：一家上海书店

核心情节：初入江湖，实践受挫

找工作很难，尤其是在没有明确就业目标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不是热门、技术型的专业出身，想在就业市场上找到适配度、满意度高的行业和岗位，难度就更大了。经过艰难地尝试与选择，我终于在毕业前夕找到了符合实践目标、谋生需求，同时也符合落户标准的工作。

这是一家集书店、简餐、画廊及文创产品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业务包含零售、餐饮和文化服务。面对文化与资本的融合大势，作为一名“新来的年轻人”，尤其是学过“文化研究”，却又才疏学浅、势单力薄、笨头笨脑的年轻人，我常常会有无能为力和螳臂当车的情绪，而职场环境中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更让人闷得喘不出气来。

书店在江边，有时我会趁着工闲，偷偷从琼楼玉宇的包围圈中溜出去，到江边走一走。被江风吹得晕头晕脑后，回头遥望卧伏在集团大楼最底层的那角小小书店，就会产生很多臆想：比如，尽管不起眼、不酷炫、也不那么挣钱、常被人看不起，然而文化的力量在于渗透、在于解构，在于那藤蔓似的生命力。水滴石穿，只要足够坚韧，一定能有所改变。

幸运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仅就周围的小环境来说，情况有所改变。我尝试了力所能及的所有办法：通过对店内书籍的甄选和陈列、微信文章与主题书单的撰写，还有各类主题读书会、文化活动的组织策划，

想尽办法以消费者感兴趣、企业能接受的方式，传播文化研究的视野与思考。我尝试给店里的同事、兼职的学生、熟识的客人、公司领导等我能接触到的所有人介绍、推荐文化研究方面的话题与思考，而后惊喜地发现，很多人对此都感兴趣！再加上书店的书籍采买工作我也有发言权，一些重要的文本店里都采有，他们可以自己买来看，闲暇时大家就一起讨论。除此以外，从我自己做起，努力建立人与人之间，除“竞争”、“交易”与“倾轧”以外的新关系。

由于每天都像打了鸡血似的等待每一位推门走进来的人，我很快就交到了很多志趣相投的新朋友。还有一些朋友，虽然大家的见解、想法都不同，但大概“严肃地讨论异见”这样的奇葩，也很少碰到，所以，也很喜欢跑来找我。再加上，师友同窗们得空会来店里寻我玩儿，下班后，大家就一起回到书店的员工宿舍里讨论问题：青年的话题、如何理解当前的文化与社会环境、如何看待生活与职场中的种种异象……由于有不同立场、不同视角，以及多元职业、身份的讨论者加入，有时我们的争论会比在学校开会时还激烈。遇到休息日，大家偶尔能聊通宵！第二天清晨，客厅里总是“横尸满地”——上班族就比较吃亏，再困倦也得艰难地爬起来，脏兮兮地出门搭地铁，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搬砖。尽管挺累，但大家仍然觉得，这样的聚会，为平凡枯燥的生活增加了不一样的色彩，所以一有时间，就要聚一聚。我也不知道这些讨论和行动能有什么作用和结果，但我真的喜欢这样的生活！

由于工作积极勤勉、受到领导赏识，我迅速由店面服务人员调升到管理岗。一时间，我觉得，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然而，我很快就用完了我的幸运。

书店毕竟是盈利性的机构，光是做乌托邦式的美梦，并不能解决经

营的难题。想要维持经营，就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然而，一个不能实现资本目的、满足资本趣味的项目，又凭什么让别人持续性地投资呢？

情况急转直下，首先是支持、帮助我的领导与同事，由于各种原因陆续辞职，工作氛围与实践空间随之骤变。接下来，市场与文化大环境，也逐渐发生越来越多令人担忧的变化，许多坚持独立思考、发声的书店，都因为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陆续倒闭，而存活下来的，多是与商业地产、资本市场深度捆绑的大型连锁品牌。再后来，由于我的职场发展、实践理想和情绪心理都遭受了挫折，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决定放弃书店，重新开辟新田野。

第四场

主要场景：一家上海民办学校

核心情节：再次受挫，困惑丛生

书店的工作经历，使我开始关注“文化服务”、“知识付费”等领域，积极探索文化和教育产品“自我造血”的可能性。而包含高校在内的种种体制内单位、国资企业的环境氛围及种种掣肘，也使我对社会资本与民营企业的运转模式更感兴趣。

很快，我就找到了新的探索与学习目标。这是一家由几位高校教师创立的民办学校，通过这所学校，他们试图在更宽广的社会领域打造和

提升自己院系与专业的知名度，与此同时，为不好找工作的本系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此外，由于近几年高校内部频繁改革，创办这所学校的几位老师，也希望通过这所民办机构，来化解因招生数量、预算缩减及院系专业合并删减等问题带来的“闭系”风险。

我在这所学校里负责的具体工作，对内是人员管理、客户服务，对外是品牌宣传、市场推广，以及与政府各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对接。通过这所学校的工作，我了解了民办学校的经营与管理困境，了解了非功利性目的下文化服务需求与市场的狭窄，了解了平衡“教育理念”与“经济回报”的艰难……尽管这些问题都是我迫切关注的，然而，这所学校的教学内容与核心产品是芭蕾，与我想做的事情之间还有很大差别。再加上，这里的情况与书店行业的窘境也殊无二致，除了令我更加深入地体会到什么是结构性的困境，从而越发失望，困惑、忧郁以外，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而我个人的身体与心理状况，也在屡次受挫的实践过程里、紧张孤独的沪漂生活中、长期透支的工作状态下，到达了某种临界点。

第五场

主要场景：湖南、香港、首尔、北京

核心情节：重新思考，创业维生

进已无力可进，退也无处可退。作为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成年人，我不禁开始焦虑，未来到底该怎么办——退回去做一个“幸福的社畜”，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但坚持清醒思考与实践探索又是如此令人心累心梗塞、脑疼脑中风。从田野的角度来看，我的两次探索，都是失败的结果。从职场发展与社会竞争的角度来看，我的两次选择，也都不是最“合算”的选择。“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但是，究竟何者是“鱼”？何者是“熊掌”呢？

此外，如果只是我个人付出代价倒也没什么，但这一路走来，那些不知是不是因为我的影响而改变了原有的生活目标与遭际、受到“惩罚”的人，我该如何补偿他们？我是不是也应该先想尽办法尽可能地适应这个社会、想尽办法多挣钱，待力所能及的时候，再想别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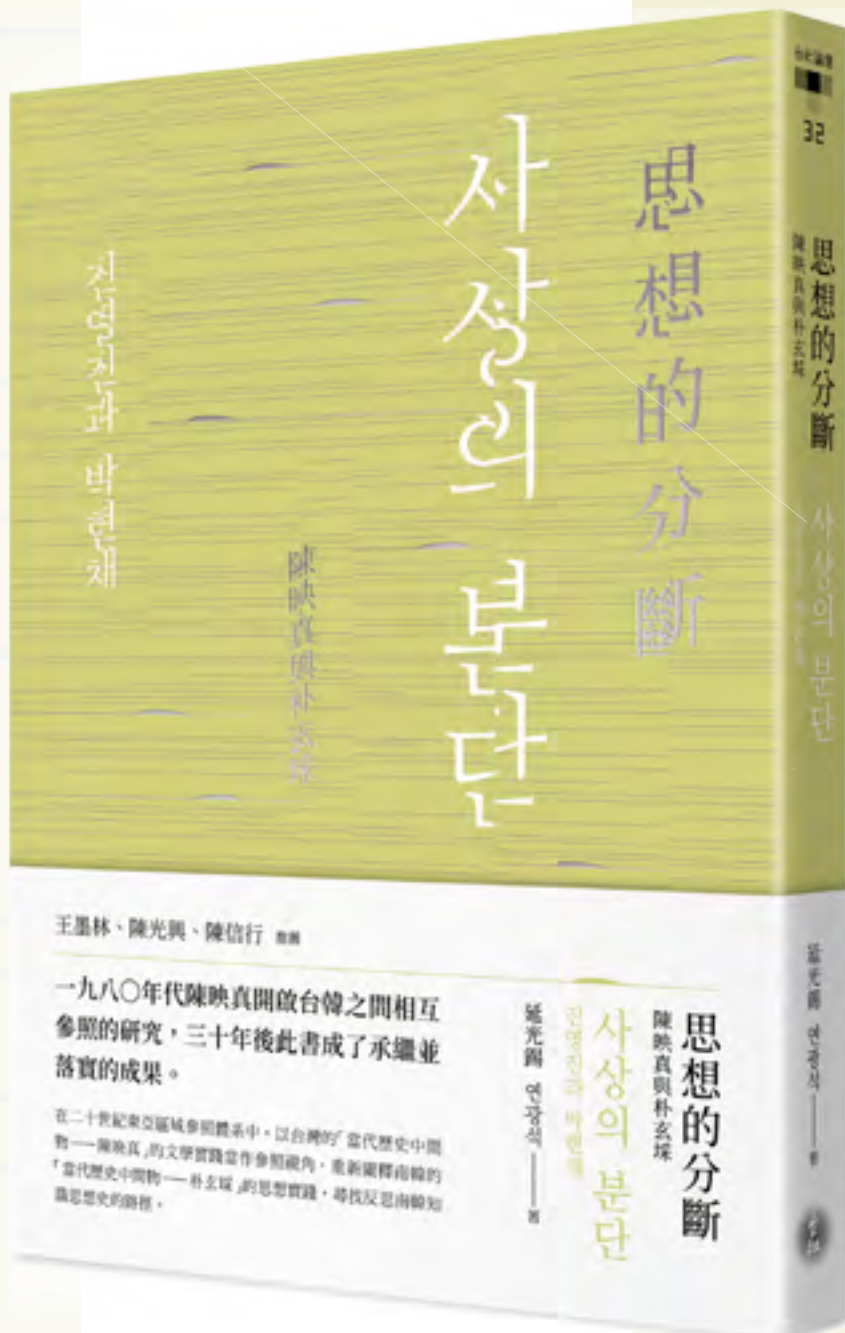
我实在想不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四处翻阅书籍资料、询问师友长辈，亦是徒劳。然而，我也不想就这么停下来。所以，从民办学校退出后，在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多座城市、多个行业之间幽魂似的漫游——在偏远大山里养猪倒卖矿泉水、在少数民族地区搞文旅（但可叹，真是“城市套路深，我想回农村。农村地也滑，人心都复杂。”在这里，也给其他希望从农村田野中汲取希望的朋友们提个醒，大环境都是一样的，光有幻想没有用，有脚踏实地、明明确确的方针方法才更重要。）跑回师门抱大腿、参加学术活动充电……然而除了累，东游西逛一番后的成果是，我终于发现，这可能不是选择哪条路继续走下去，或是什么“道路越走越窄”的问题，而是压根无路可走——我在文化产业的大逻辑之下探索文化研究，在“文化自由”等于“文化商品化”的大前提之下尝试独立创造，这个思路本身，是否就是个错误？那如果不这样，又该怎么办？

尽管脑子里一团乱麻，但日子还得过下去：饭还要坚持吃，觉还得坚持睡。在职场累积了一些经验和资源后，我自己开了一家工作室，平时接一些影视、广告、文化空间运营的活儿，聊以维生。时隔多年，我又重新

做起了编剧，资本的力量依然强大，有时会成为我笔下的一个人物，有时是一个段落；今天让我往右，明天又让我往左，经常不禁要在甲方面前潸然泪下。

我心里很清楚，创业并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比起在公司或机构就职，这更是一条险途——所谓结构性的困境，就是无论躲到哪里，无论干什么，问题还是那些问题，依然背在身上——然而未来到底会怎样，要怎么走、走到哪里去，我也没有答案。

To be continued...



《思想的分断：陈映真与朴玄采》

出版日期：2019 年 6 月

作者：延光锡

出版社：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

发行：唐山出版社

ISBN：978-986-90860-7-3（全套：平装）

延光锡

曾任韩国圣公会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兼讲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韩国北韩研究大学研究教授、现为交通大学文化研究国际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简介

《思想的分断：陈映真与朴玄采》是一本在亚际文化研究的历史脉络中所进行的实验作。此书从区域的视角出发，将分享殖民、分断、冷战和后冷战的历史经验的南韩和台湾，视作相互参照的对象，并通过台湾的陈映真（1937-2016）和南韩的朴玄采（1934-1995）的相互观看，试图打开超克现成知识体系的阶序和分割之新的讨论空间。尤其，在此书摸索与去殖民 / 去帝国的多元世界相配的知识实践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竹内好的“作为方法的亚洲”、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以及陈光兴的“去帝国”成为支撑此实验的核心思想资源。换句话说，若没有 20 多年亚际文化研究的历史所形成和深化的相互参照网络以及历史思想资源的累积，那么此实验根本无法进行。不过，对于 1990 年代末后冷战局势下，面对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需求而起步的亚际文化研究，此书亦是一个检验其 20 年的成果和局限的试金石。

目 录

【推荐序】——回望一个相信新世界的年代 / 陈信行

韩文版序

叙说：思想性巫祭

戏台：走进区域性参照

历史挂帅与区域性参照研究

反思当代的殖民性：以朴玄埰为线索

奉请：当代历史中间物

——陈映真（一九三七 - 二〇一六）与朴玄埰（一九三四 - 一九九五）

作为参照点的台湾：陈映真

作为历史中间物的朴玄采

如何历史化一九八〇年代？

灌浴：一九八〇年代与后冷战转型的悖论——“社会性质论战”

为何反思南韩社会性质论战？

光州五·一八与“民众论”的悖论

民众论的再历史化与朴玄埰的民众论

陈映真的南韩情结与社会性质论

朴玄采的社会形态论和社会性质论

反思“贫困”和“断裂”的相互内在化

奉送：新殖民 / 分断体制下思想继承

殖民主义现代性与知识的所有

新殖民性认识与思想继承的矛盾：朴玄埰与白乐晴的争论

被忘却的遗产：《民族经济论的基础理论》与新殖民 / 分断体制

民族经济论」与新殖民 / 分断体制

拆台：重新开启思想解放空间

朴玄埰的困惑：具有开放性的可能性

东亚去殖民主义：亚洲作为方法

回顾《思想的分断：陈映真与朴玄采》

后记

【读后】——延光锡的工作意味着什么？ / 陈光兴

附录

朴玄埰与陈映真年谱

参考书目

推荐序：回望一个相信新世界的年代

■ 陈信行*

在过去二十余年间，我有许多机会和南韩的众多师友、学生、社运工作者交流乃至进一步共事，光锡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这些经验给我更丰富的材料来思考台湾与南韩这两个在过去七十年的当代史里“形同实异”的社会中，人们试图理解现实、并进而改造现实的种种雄心与挫折。

《思想的分断》是第一本有系统地尝试分析、比较台韩左翼经验的著作。光锡用来讨论的虽然是两位具体的“形同实异”的运动中的知识分子：陈映真与朴玄埰，一位是逼自己学习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台湾文学家，一位则是挂心着想写小说的南韩经济学家。但是，光锡的分析容许我们以这两位人物为切入点，不仅仅理解他们的世代与时代，更能够进一步思索更抽象一点的大问题：改造社会的知识与行动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应该是什么关系？

十九世纪末进入东亚文化圈的西方知识体系，把试图理解人与社会的知识工作分为看似截然不同的两种：历史、文学与其他艺术创作在一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社会分析在另一边，而不像传统“文人”基本上既作诗词书画、又写治国方略、还会读史修史。在现代大学里，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多半如理工医农学院一样，分成了一个不

.....
* 陈信行，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

同的科系、专长、“领域”。“领域”这个说法尤其耐人寻味：原本是个指涉房地产所有权的词汇，当代学界人士以之来称呼知识的形态、课题与方法，却彷彿再自然不过。

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至少到了二十世纪，的确也几乎无可逆转地成了两种探究世界的途径。对照陈映真所身处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与朴玄埰所参与的韩国社会性质论战，这两个时代与历史脉络相似的知识事件，可以看得出两者的关键差异：

文艺垂直地继承历史所给予我们这个特定时空中的人们共享的感情结构来说故事，有影响力的作品也会成为后人所承继的感情结构的一部分。因此，乡土文学论战的核心追问的是“谁的历史？谁的感情”？——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庶民百姓的历史？而社会科学试图捕捉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常以横向比较作为方法，因此社会性质论战追问的是“南韩是不是个第三世界新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文学，尤其是小说与戏剧，谈问题的工具是人物角色与情节。好的文学里，人物固然可以有典型性、但绝不能平板，往往必须身负各种集体与个人的历史所带来的矛盾纠结的情感。

社会科学的工具是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性质”“依赖”等等理论概念，或许历史上是在研究十九世纪的英国、二十世纪中期的巴西或埃及等不同时空中的事物而发展出来，但必须对于理解另一个时空中的事物有用。从而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总是必须争论哪些历史特定性是在抽象过程中搁置、哪些又是不能忽略的。若不能搁置十九世纪的英国社会与二十世纪的南韩社会的种种具体差异，我们就不可能用“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分析概念了。

从知识的性质来看，一位习于打造生动而矛盾的立体人物来反应现实的文艺工作者，和一位习于操作抽象而力求准确捕捉现实的概念工具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互相羡慕彼此的工作，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更重要的或许是这种对自己的不足的认识所反映出的，二十世纪中期左翼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这也同时是那个时代的左翼运动对自己的要求。

投身运动中的左派没有那种奢侈的余地，来强分文艺与社会科学、垂直继承与横向比较。现实永远在对反抗者毫不留情的追问：你想要动员的“我们”是谁？“我们”在乎什么？“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值得“我们”追求的道路往何处去？中间有哪些曲折是必要的？哪些则是背叛理想？感性与理性、历史与理论，在反抗运动中是既矛盾又合一的。忽略了其中任何一个面向，运动就会失败：或许是韩战或台湾白色恐怖中那种大量血腥牺牲的失败，也可以是理想主义者纷纷去当官发财、群众们变得绝望犬儒的那种失败。

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分别在南韩与台湾成长、思索、奋斗的朴玄埰与陈映真继承的运动，是在之前全球各地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发展出来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民族解放运动。一九六〇、七〇年代或许是这个运动的全球性最高潮——1960年南韩四月革命推翻李承晚政权、日本百万人上街头反对日美安保协定；1968年越南战场上新年攻势重挫了美军的士气、全美国各地反战声音日益高涨，法国、墨西哥、日本，似乎到处都有反资反帝的学生运动在大规模抗议；而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看似正在把1917年在俄国开始的共产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推向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朴、陈二人固然当时都身处严酷冷峻的独裁政府压制下，但是可以想象他们与同代反抗者的思

想与情感火焰是如何在“黎明将届”的情境中炽热燃烧。

那种热切相信新世界即将到来的火焰是何时被浇熄，对于不同社会不同个人或许都有差异。确定的是：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初、中期，还相信革命的知识分子可以与劳苦大众结合、组织一个先锋党、画出一条正确路线、通过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走向世界大同，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少、越常被人视为食古不化。台湾与南韩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的政治民主化。进入后冷战时代、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又继续被冷战格局笼罩着的台、韩两个社会中反抗既存秩序的人们，面对的是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所面对的非常不同的情境。两地一代代的年轻人中都有人不放弃挑战现存的权威与秩序——在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抗争之后，南韩的2016 - 17年十二次浩大的烛光示威把保守派政府赶下台，并间接促进了2018年开始的两韩和平进程。

在从“太阳花”到烛光示威的这些年间，我看到台、韩两地的抗争青年非常类似的精神面貌与社会处境：不同于陈映真与朴玄埰所见证的经济高速增长年代，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南韩与台湾年轻人面对的经济前景是几近绝望的。各行各业绝大多数工作职位低薪又无保障。没关系没背景的，就几乎注定一辈子辛苦。“社会不公平”无需太多政治经济理论与分析、几乎伸出手就摸得到。抗议者依循的是民主化过程中逐渐成为大家共享的价值观与感情：公平、正义、民主、人权、尊严……很多人知道这些理想受到威胁，也愿意站出来以行动捍卫这些价值。但是，朴玄埰与陈映真那代人如此认真辩论的社会形态分析以及理论分析所应该能指导的路线与口号，在我们这个时代严重地萧条贫瘠，完全无法负担抗争者的行动热情，以至于大量对自己真诚的

青年行动者一面顽强组织着抗争、一面哀叹着“运动伤害”。至于什么是“运动伤害”？除了跟挫折有关这点是确定的之外，这个说法的方方面面都暧昧得难以穿透，自然也难以讨论有什么解决之道。这不仅是台、韩两地的特色，同时代的欧洲、南北美洲、乃至邻近的香港，都有类似的现象。

在这样的历史脉络回头看陈映真与朴玄埰，像他们那样的那一代各国左翼运动者固然为理想付出了鲜血的代价，但是至少在他们年轻时、决定步入运动的那个时刻，什么理想值得为之牺牲生命？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清晰得让我们后代艳羡。但是他们在工作生涯的晚期，也纷纷见证了我们这个尴尬的年代的到来。

光锡的《思想的分断》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课题拉起了一个十字坐标型的连结：横向比较两个历史人物与他们的学思、实践与时代，纵向地联系他们曾经走过、而我们现在继承下来的历史。我想，光锡与朴、陈二人一样，花了这么多力气去探究台、韩两地这段错综复杂的思想与社会、政治历史，并不是要思古之幽情，而是希望他们的经历能够有助于思索、理解当下我们所面对的课题。

光州“五·一八”与“民众论”的悖论

■ 延光锡

延续本书《戏台》一章所提出的问题意识，此章试图克服“光州起源论”式的断裂性历史认识，而将“五·一八光州惨案”放在殖民、新殖民、冷战和分断所构成的整体二十世纪脉络上，并透过重新访问一九八〇年代思想潮流中作为历史中间物的朴玄埰思想实践，以揭示一九八〇年代思想状况的矛盾和症候。同时，为了掌握朴玄埰思想实践的意义和矛盾，本研究采取以陈映真作为参照视野的方法。不过，在我们正式进入讨论之前，需要概括性地说明一九八〇年代南韩思想界的背景，包括“五·一八光州惨案”在一九八〇年代的历史意义，以及民众在理论和现实中的兴起之矛盾等。

一九八〇年“光州惨案”与思想运动的主体性问题

光州抗争给社会批判势力带来了一个冲击，因此，社会批判势力摆脱过去既抽象又朴素的民众论，而迫切感受到了关注具体资本主义发展，从而基于科学分析打造运动主体的变革理论的必要性。从此，“一九八〇年代”这么一个社会运动的时空才开始开放了。韩国战争后，被消灭的马克思主义也复活起来，而分析韩国社会形态的社会形态论战也展开了。进而，基于如此分析结果，按照优先变革课题，形成了以北韩主体思想为先例的“民族解放”和以俄罗斯列宁主义为模式的“民众民主”这两个派别。事实上，强调以北韩为中心的统理论之民族解放派，将现成的民众论理解为民族论（作为民族核心的民众），另一方面，提倡南韩单边变革论的民众民主派，则把民众论与阶级论接合起来，改变成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阶级同盟论（作为民众核心的工人阶级）。¹

1 参见【韩】金廷翰的《五·一八光州抗争以后，社会运动意识形态的变化》，引自《民主主义与人权》第十卷第二期（二〇一〇年八月），页一七五—一七六。

这一段落的叙述基本上采取事后追溯的典型格局，也就是将民族解放派和民众民主派这么一个后来形成的格局，视为通过一个正常分化过程的结果，因此并没有审视从中存在的断裂或扭曲面向。不过这种叙述方式仍然是一个材料，让我们知道后来的学术研究场域，如何透过社会形态论战与光州抗争的关系下，认识和记忆这场论战的意义。换句话说，光州抗争对南韩的知识思想界，是一个“冲击”，同时也是一个觉醒的契机，从此形成了一九八〇年代大规模思想和理论论战的格局。虽然局限难免，但在与现实社会运动空间的互动下，当时的南韩知识思想界还显示了更激进化的趋势。

不过，实际状况的展开却出乎意料地复杂。如同本书《戏台》一章所论及，作为一九八〇年代以后南韩学术运动核心组织者的社会学者金晋均，批判过当时的社会科学界缺乏主体性，因而试图从“文学”和“经济”领域寻找革新社会科学的契机。当然，主流文学和主流经济学仍然没有克服殖民主义的依赖性和冷战局限，但是至少从一九六〇年代以来成为批判思想的经济学基础之“民族（自立）经济论”，以及于一九七〇年代积极思考“分断”问题的“民族文学论”，为社会科学提供了重要的反思契机。

尤其在一九八〇年代的思想省思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社会科学方面曾经于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将“第三世界”当作一种迂回的途径，因为“第三世界”一方面成为批判现成“现代化理论”的理论工具，同时另一方面，“依赖理论”或“世界体系论”等某些第三世界理论所具有的局限，又成为另一个转型的契机。如金晋均解释，在一九八〇年代的转型中，第三世界只不过是一个迂回之路：

如此第三世界论的视角，成为一个知识工具，得以分析一九八〇年代韩国社会中全面化的负面面向，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共识。不过，我们接受第三世界论视角的过程，没有具备深刻的认识，包括它与韩国社会现实的距离、韩国社会变动的历史过程（尤其解放和分断的性质）、韩国社会资本主义化的本质以及后果（尤其阶级关系变化）。因此，当我们渐渐诚

实地掌握了韩国社会各种问题的本质性认识，我们因此将我们在一九八〇年代前半期认识第三世界论的面貌，定位成我们都该经历过的知识性迂回。我们现在之所以说它是一个迂回，是因为比起一九八〇年代前半期，我们更加深化了自己的认识，而且我们可以用更直接的语言来谈我们的问题。²

金晋均的概括就显示了一九八〇年代中后期，南韩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在于克服一九八〇年代前半期将“第三世界论（包括依赖理论）”当成“迂回之路”的初期状态，进而走向更具“主体性”的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虽然如此，如我们后面所分析，实际的展开似乎是充满矛盾的。

以一九八〇年“光州惨案”为契机，南韩社会科学掌握了作为历史范畴的“殖民”和“分断”。随后的一九八〇年代出现庞大的理论思潮和论战，因而被称为“社会科学的时代”。不过，虽然白乐晴等人积极提出民族文学论所关注的“分断”矛盾，³但当时并未有效地介入论战，反而等到一九九〇年代，经过白乐晴的理论化，“分断体制论”得以成立。相反的，“民族经济论”在一九八〇年代提出的“殖民性”和“资本主义”问题，超越了论战促发者朴玄埰的预料，引起了广泛的反响，造成理论论战与社会运动互相产生作用的结果，最后并出现了自我发展和扩大再生产的趋势。论战促发者朴玄埰却批评论战过程本身的“理论主义”，⁴

2 参见【韩】金晋均（一九八六）《第三世界和韩国的社会学—现代韩国社会论》（首尔：石枕）的《写在前面》，引自页七一八。

3 当时社会科学界回应分断矛盾的代表性文献，参见【韩】金晋均、曹喜昞的《关于分断与社会状况的相关性—为了分断的社会政治性范畴化之试论》，收录于《分断时代与韩国社会》（边衡尹等着，首尔：喜鹊，一九八五）。

4 朴玄埰在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四日座谈中，说道：“我国理论的过度观念化状况之所以依赖于分派利益，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并不参与社会实践场域，即他们带着某种知识分子的傲慢，而将理论性游戏，视为参与社会实践的行为……我认为，理论的观念化以及如此更高层次理论所造成的派别化现象，是利己地投合民主化这么一个现实状况，且谋求自我安慰的部分知识分子的手段”，参见【韩】朴玄采、法性〔法号〕、金昌镐的〈座谈：社会实践中思想的问题〉，引自《朴玄采全集·第一卷》（朴玄采全集发刊委员会编，首尔：Haemil，二〇〇六），页八四二、八四八。

而论战实际的展开过程，也把朴玄埰排除在外，并将他孤立起来。正因为以“新”的欧美理论思潮武装起来的年轻一代，也就是大约二十多岁或三十多岁的年轻研究者，在此时大规模的出现，形成了朴玄埰们无法介入的复杂和激烈的论战情形。⁵

不过，一九九〇年前后“后冷战”的具体展开，对当时迷恋革命论的南韩知识思想界来说，是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东欧社会主义的动摇和崩解作为后冷战的一种表现，也给南韩思想界带来冲击，结果，许多自称或他称的左翼知识分子开始抛弃“社会主义”，踏上某种“转向”之路，包括沉潜于纯粹马克思主义理论、朝向“后学”的逃走、投降于制度 / 形式民主主义（所谓“议会主义”）等。不过，严格来讲，促发如此转向的“后冷战”，毕竟是“外部”因素，因此，这个冲击所引起的“转向”也是非主体性的。或许这是过于冷酷的批判，但是正确地讲，南韩的“后冷战”局面，并不是透过主体性努力而得到的，反而是藉着“外部”所赋予的，因此，如此的外部因素却带来这么庞大的转向，似乎就证明了那些“转向主体”本身的历史轻浮性。

历史的轻浮性来自于历史断裂之因。与历史断裂的知识，就像暂时的“流行”一样，经过短暂循环之后，只能留下某种无力感，而后在历史中消失。即便知识分子试图回应“光州”对他们的要求，但知识分子的努力是否封闭地将“光州”固定于一九八〇年这么一个脱离历史轴线的时间点，因而最后背离了“光州”抗争真正的历史要求呢？如果是，我们不能把光州当成一个起源或目的，反而需要把它视为一个历史性事件。

“主体”的“民众”之兴起与去历史化

一九八〇年的光州事件所促发的知识思想界论战，产生了各种“民

5 有趣的是，此论战后来由论战促发者朴玄采和观察者曹喜昡，系统地整理成【韩】《韩国社会形态论战.I—IV》（首尔：竹山，一九八九—一九九二）。

众论”互相竞逐的状况。一九八〇年代，有关于“民众”的各种论述，基本上是以对主客观条件的新认识为契机，提出变革主体形成的问题。因此，从客观面向来讲，分断以后深化的“资本主义发展”需要被分析，而从主体面向来讲，经过一九八〇年的光州惨案而确认的主体力量薄弱的状况，则需要被问题化。面对这些课题，知识思想界同时思考着资本主义分析和主体形成路径，因此，朴玄埰在战后期间，在历史继承的脉络下，他藉着其积累的相关研究成果而提出的思想课题，自然得到广泛和公开的关注。因为于一九六〇与一九七〇年代期间，在南韩传播批判性知识和思想的知识分子当中，直接继承殖民时期和殖民之后的批判思想体系，进而对新殖民条件进行“科学”分析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几乎只有朴玄埰一人。

有趣的是，“民族经济论”以“新殖民性”或“半殖民性”，阐明南韩的历史性社会性质，进而以“社会形态”概念，提出“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么一个资本主义阶段的设定。此时，部分“社会学界”关注后者设定，努力实证符合“资本主义”的阶级阶层变化（即“资本－薪资劳动”关系的稳定化），以反驳依赖理论其中一种“边陲资本主义论”的立论（即“庞大的非正式部分”）。⁶另外，部分“经济学界”试图克服朴玄埰的“封建派因素”，而批判地传承“资本主义批判”的朴玄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⁷而且，这些社会科学的企图，后来成为“民众民主派”分立的重要理论资源。在此过程中，朴玄埰透过“新殖民性”或“半殖民性”所呈现的“民族性”（所谓“民族生活模式”）这么一个历史地理多元主义的取向，自然就消失了。“民族经济论”如此的命运，确实很能说明历史中间物朴玄埰的困惑。

事实上，这些社会科学界的努力，集中在证明南韩社会的“资本主

6 参见【韩】徐宽模（一九八四）《现代韩国社会的阶级构成与阶级分化》（首尔：Hanul）。

7 参见【韩】李炳天、尹邵荣的《战后韩国经济学研究的动向和课题—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收录于《八〇年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现阶段和展望》（首尔：历史批评社，一九八八）。在论文发表后，尹邵荣（윤소영）对于弘益大学郑允炯（정윤형）教授的提问，如下回答：“我认为，朴玄埰先生虽然把民族经济论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合起来，但是否没有完全清理掉过去封建派的残余？”（页七四）

义”性质，同时提出了作为阶级中心主体范畴的“民众”。在此论述中，“新殖民”或“半殖民”就成为外部因素，或者甚至被设定为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因此透过原本“半封建”分析到的具体的内在、主体改革对象，突然间消失，而且整体理论被化约为“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同时，虽然仍旧使用“民众”作为主体范畴，但“民众”已经变成“阶级中心”的抽象概念。相对来说，我们将不同于如此证明资本主义性质且强调民族矛盾的潮流，称为“民族解放派”，不过，这一派的理论和视角基本上奠基于“北朝鲜”这么一个历史内部和现实外部，因此至少在理论思想层次，它与证明资本主义的潮流与派别，无法形成对称的关系。如果把讨论对象聚焦于民众民主派，那么如此民众民主和民族解放的格局，基本上可视为由民众民主将理论上不能对称的思想潮流从理论场域拉过来，并形成假想的对称关系。从中，民族解放路线的思想，仅仅成了一个理论主义他者化和本质化的对象而已。⁸

事实上，一九八〇年代在南韩重新被关注的“光复”以及之后在北朝鲜发展起来的“民族解放”思想的意义，在于其能成为接近作为历史内部的（北）朝鲜的迂回之路；不过，因为它并不具备直接切入南韩现实的环节，我们只能视之为再发现或再诠释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当时仍然存在的“反共主义”体制，制约了此讨论的公开性展开。若用朴玄埰的语言来讲，当时“民众民主”和“民族解放”的论战格局，犯了将不同层次的议题放在同一平面上的错误。结果，以一九八〇年光州惨案为契机，努力回应社会运动需求的“社会形态论战”，环绕着是否承认资本主义现实以及认识方法等问题而进行，论战的主导权因此自然在于资本主义证明派。不过，这个潮流在尚未嫁接于历史的状况下，从资本主义、阶级等理论论证，进而直接演绎出实践和主体——这就是理论主

8 “民族解放”和“民众民主”的不对称，其实也反映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后学术界的发展。事实上，一九九〇年代以后“民族解放”思想在学术体制内的影响力几乎消失，而受到各种各样“后学”影响的，广义的“民众民主”则在学术话语场域的持续演变和分化，变得非常突出。

义偏向，亦即主要透过基于理论制造假想论敌的方式，促进了论战的扩大再生产，但实质上深化了与群众和现实的脱离。

这一部分的社会科学论述，基本上可视为将“历史性”和“民族性”排除在外的思想潮流。结果，经过了一九八〇年代后期，这些排除“民族”的理论取向，造成了理论脱离现实和运动的问题。不过，虽然出现这样子的“脱离”，但是基于以“观念性”和“激进性”为特征的学生运动势力和新世代理论家力量，此时的知识潮流造就了更为激烈的学术论战和分化，最终获得了某种“过度的代表性”。历经此过程，不具有“民族”的“民众民主”，背离了真正的“民众”，在现实中完成了以普遍范畴的阶级为中心的历史平面化。而在此一历史性特定条件被消灭的“后冷战”时期，一九八〇年代因民众的兴起而暂时潜伏的“市民”概念，重新在主体理论的某个角落浮现出来。⁹

早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前，“民众”一向与“民族”和“民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这些范畴之间的关系，仅只是透过与实践结合的形式表现出来。等到一九八〇年代，当“民族”被外在化或否定之后，“民众”虽然被看作主体，但是其内涵在资本主义的阶级认识下被抽象化。这个抽象概念基本上是藉由社会学或经济学理论演绎出来的民众，因此成了无法参与“历史开放性”（实践的场域）的抽象化的民众。也就是说，虽然社会学或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都具有马克思主义这么一个理论走向，但是因为它们的知识生产都以历史断裂为前提，终究不能确保理论的主体性，同时，它的实践性也自然而然地变得极为薄弱。结果，缺乏历史“民族”的民众范畴，只能依据理论而存在，无法与实践相结合，因此不能成为真正“民主”的主体。

9 我认为，如此市民概念复原的背景有二：第一，随着现实社会主义的崩解，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理论重新被引进来；第二，在认识南韩社会方面，批判知识思想界开始强调“韩国”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以及国家正常化（所谓加入联合国）这么一个“新”条件。

民众论的再历史化与朴玄埰的民众论

以一九八〇年光州惨案为契机而重新兴起的“民众”主体范畴，经历了上述的去历史化过程，不过如果我们从再历史化或者历史整合性的角度看，在南韩思想史中形成一定传统的“民众”概念，也可以提供阐明南韩社会特定性的线索。若我们通过区域的相互参照方法，便能够进而发现民众概念的实践性内涵。首先，我们可以关注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韩国民众论的现阶段》所收录的重要参考内容。

一九八〇年代以后，我们社会的学界和民族民主运动圈，都埋头于所谓社会形态论战。其中，一九七〇年代社会运动的水平，被批评为仅是人权层次的资产阶级浪漫主义阶段。接着，一种论点浮现在最前面：之后的社会运动需要摆脱简单的反政府斗争的局限，走向基于科学和历史的变革运动。此过程中，一九七〇年代在野人士的活动也受到重新评估，也表面化了运动圈的世代间矛盾。不过这不只留在世代间矛盾，更扩大成关于变革运动展望的路线矛盾，简直走上了思想斗争水平。¹⁰

这段内容的时间点是一九八九年，已经是社会形态论战或社会性质论战经历复杂过程而达到瓶颈期的时候。如前所述，朴玄埰也大约在此时期积极针对论战的理论主义倾向提出批评。大约在一九八〇年代后期，在论战过程中被边缘化的上一代学者，在阶级和民族二元的古典对立格局下，抱着“民众的抽象化”这么一个问题意识，试图重新提出与历史整合的民众论。

如同前述，从民众史的角度来看，南韩的一九七〇年代可以说以

.....
10 参见【韩】金圣在于《韩国民众论的现阶段》（韩神大学第三世界文化研究所编，首尔：石枕，一九八九）一书中的〈写在前面〉，引自页三。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全泰壹的自焚为起点。此事件给南韩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此，即使当时处于朴正熙的军事独裁政权下，知识分子和学生仍然提高了关于劳动问题的关心。但是，经过一九八〇年的光州惨案后，一九七〇年代的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就被评价为具有时代性局限。而且，围绕如此评价的论战，虽然从量的指标来看，具备相当大的规模，但在“质”上缺乏主体性的理论论述，后来就遭受上一代知识分子的批评。

世代间和路线间的矛盾表面化之后，取代一九七〇年代“民众”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之间的关系，如何被阐明，就成为一九八〇年代进步学界的中心主题。而且，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课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与现成学科的一定断裂。而且，一九八〇年代进步学界的小将学者主导此过程，结果跳跃到宣布以学术运动参与社会变革运动这么一个学术运动联合的层次。

审视这一系列进步学术运动的过程，我们只能沉痛地指出，晚近社会形态论战，虽然应该具有主体性讨论结构，但是与其说是我们学界自身的历史性，不如说是日本式讨论的直接反映以及活跃化。此点恰好具体地显示了一个悲惨现实：在学术的普遍性名义下，将拥有传统的自主学脉加以否定的第三世界国家学术的畸形性。

我们自问，面对我国进步学界如此学脉的断裂图象，从哪里寻找展望社会变革的进步学风的萌芽？民众论兴起的背景就是，在殖民地和新殖民地条件下，自主地阐明民族和阶级问题之努力。如果我们没有对如此“民众论”进行体系化的工作，那么今日社会形态的讨论，是否不能拥有内在于我们社会的历史性呢？以“民众”所呈现的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中，多方面地阐明民族和阶级问题，是否应该成为进步学术运动的道德基础呢？因此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一九八〇年代社会形态论战，应该

在一九七〇年代民众论的延长在线进行。¹¹（粗体字强调为本书作者所加）

这就是透过拥有历史性的主体范畴之「民众」论述，重构历史整合性，并试图克服我国学术与知识失去「主体性」和「历史性」的殖民性状况之言论。具体来讲，主要克服的对象，就是脱离实践的而仅仅是以民族和阶级形成静态的论战格局。

郑昌烈（정창렬，1937——2013）在南韩被视为奠基了民众史学的学者。从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与朴玄埰分享的某种共同的历史认识。这样的历史认识明确地提出了民族和民众的历史关联性。首先，郑昌烈认为：“韩国历史图象的重构，不能说是一九七〇年代和一九八〇年代韩国现实中突然被提出的。〔……〕我们发现了主体民族意识确立的历史中，基于现实需求而出现的民众观点的第一事例，就是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东学农民军对于政府军和地方军以及民众的如下呼吁”。郑昌烈接着引用了东学徒的呼吁：

今年〔一八九四年〕十月开化奸党与倭国缔结，乘夜入境逼迫君父，擅恣国权，并方伯和守令均属开化党，非对人民抚恤，却进行杀戮，百姓生灵涂炭之际，我们东学徒起义，消灭倭敌，控制开化，清平朝廷，安稳社稷，每次义兵到达的地方，兵丁和军校不顾义理，与我接战，……其实不意图朝鲜人相战，却如是骨肉相战，岂不伤心。……朝鲜人之间，虽道不同，但斥倭和斥华之其义相同，因此我用两个字解惑，各位流传后，若有忠君和忧国之心，就归于义理，一起商议，进行斥倭和斥华，

11 同前引注，页三一四。这一段是在一九八九年八月，韩神大学第三世界文化研究所所长金圣在（김성재）所讲的内容。此书的基本内容，以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七日举办的论坛「奠定作为学问的韩国民众论之大讨论会」为基础。历史学的郑昌烈（一九三七—二〇一三）、经济学的朴玄埰（一九三四—一九九五）、社会学的金晋均（一九三七—二〇〇四）、哲学的李俊模（이준모，一九三五—）、神学的金昌洛（김창락，一九三六—）和教育学的金圣在（一九四八—）所发表的文章，经过修补而编成单行本《韩国民众论的现阶段》。虽然此书的问题意识在于重构历史图象，即追求历史整合性，但是其构成仍然根据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现代知识体系的学科分类模式，这就反映着新殖民学术体制的现实局限。

不让朝鲜成为倭国，终究同心合力完成大事。¹²

接着郑昌烈提出如下判断：“如此对于韩国现实的掌握中，第一次成立了民众观点，其主要契机就是‘作为承担民族课题的主体之民众’这样的认识”。也就是说，他从东学农民运动，寻找民众论的历史渊源。¹³当时，朝鲜的内部矛盾引发了东学农民运动，而关系着对于朝鲜的主导权，区域内清朝和日本国于是介入朝鲜引发冲突，结果发展成清日战争。此时期，“民族”和“民众”形成密切关系，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关系论”意义上的民族概念，以及以此为前提的主体性范畴之“民众”概念，获得初步形成。

但是在这些后进地区，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尚未成熟，或者说资本主义关系尚未发生，因此作为人群的民众形成过程中，比起民族因素的作用，阶级因素的作用更微小。所以现代世界＝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中，发展落后的地区形成民众的时候，民族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发展落后的地区之民众的形成，与民族主义和民族运动的展开，具有非常有机的关系。¹⁴

郑昌烈认为，日据时代的史学界有着实证史学和唯物史观，但前者缺乏民族观点，后者则是少数，加上当时民族自觉薄弱，因此两者都以现代主义的历史意识为基础，而无法成立主体的历史学。而光复后的史学界经过分断和内战，延续了殖民主义史学，但是内容上有所差别。在冷战体制下，占有主流学术地位的史学，就是基于“现代化论”的实证

12 参见【韩】全琫准的《告示·京军与营兵而教示民》，引自《东学乱记录（下）》（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首尔：探求堂，一九七四），页三七九—三八〇。此文为国汉并用文，因此中文译文保留了原文的汉字。

13 参见【韩】郑昌烈的《民众史学在韩国成立和展开的过程》，引自《韩国民众论的现阶段》（同前引注16），页一三一—一四。

14 同前引注，页一四—一五。

主义史学。而后，以四·一九革命为契机，民族意识重新被唤醒，史学界试图克服以“停滞论”为核心的殖民主义史观。在这发展过程中，史学界重新照明并借鉴于日据时代申采浩（一八八〇－一九三六）和白南云（一八九四－一九七九）¹⁵的历史和经济思想。

申采浩提出了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民众意识、作为民众形成契机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有关认识、以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的认识，以及具有社会科学和现实意义的民族革命路线之奠基等，这些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¹⁶

有关于民族认识，白南云所揭示的意义如下：随着社会形态的内在发展，民众生活过程有所变化和变动，阶级关系也随之而有所变化和变动，因此韩国民族的解放之路，与基于如此变化和变动的阶级斗争的动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¹⁷

我认为，从社会和生活过程来看，人群是民众，而从民族立场和民族矛盾来看，它就是民族。也就是说，民众等同于民族，民族等同于民众。所以，我认为，白南云的民众概念，与申采浩的民众概念，几乎互为一致。¹⁸

值得注意的是，郑昌烈在此掌握的白南云的民族和民众概念的内涵，几乎是与朴玄埰的认识一致的。不过，虽然史学界有过如此这般重新照明过去思想的努力，但战后南韩史学界对于晚期朝鲜历史和开港期的研究，仅是片面地强调“资产阶级或现代市民阶级的形成和成长”，因此

15 白南云（백남운）是北朝鲜政治家，国内派，官至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及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委员长。同时，他也是一名专门研究朝鲜半岛经济史的学者。光复后，他参与南朝鲜新民党和民族主义民主战线，而后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参与南北协商后去北朝鲜。

16 引自【韩】郑昌烈的《民众史学在韩国成立和展开的过程》（同前引注19），页二〇。

17 同前引注，页二六。

18 同前引注，页二七。

呈现出某种“目的论”的历史叙述，结果造成在其中的“民众”不被视为“主体”。我们可以用“资本主义萌芽论”来概括这个战后史学的动向。等到一九七〇年代后期，史学界开始反思此问题，进而提出了“民众史学论”。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史学界以及思想界展开了关于民众史学的讨论。在此过程中，社会形态论并非简单提出“民族=民众”的立论，而是根据新殖民状况下民众生活条件再生产之物质基础的理论性分析，提出了具有“阶级”概念的“民族=民众”此一复杂立论。

那么朴玄埰怎么认识民众，又怎么看待一九八〇年代呢？《实践文学》（실천문학）杂志于一九八七年所收录的朴玄埰和小说家宋基淑（송기숙，一九三五—）的对谈，较为清楚地呈现朴玄埰在一九八〇年代对待民众论的态度。

大家常常说，民众的时代到来了。我的意思是，比起民众问题，大家首先思考一下民族问题。逻辑上来讲，在被赋予的此刻状况下，我们拥有民族主义的自我需求，那么在如此的需求下，我们一起追问今日为何民族性就成为民众性？应该这样追问吧。在此前提下，我认为，先提出民众问题，直接讨论民众的量的成长、民众在社会的比例以及民众的需求，似乎是不太恰当的。至少先从民众在韩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所担任的角色以及承担的课题等方面出发，试图解决问题，这样才是正确的吧？¹⁹

朴玄埰不只把“民族主义的自我需求”视为一个前提，同时也将“民族性=民众性”视为一个历史过程的产物。而且，他对于直接提出“民众性”的论述取向发出警告，因为在历史范畴的“民族”概念不存在的状况中，提出“民众”问题，事实上就像“没有民族的阶级”，将会产生某种“过度现实主义”（亦为理论主义）的偏向。因此，朴玄埰从民族主义观点出发，

19 参见【韩】朴玄埰、宋基淑对谈的《八〇年代在民族史上的意义》，引自《实践文学》第八号（一九八七年一月），页二一—二二。

提出作为“主体”的民众，尤其是当“民族解放”课题尚未落实和完成之际，朴玄埰认为这仍然是一个有效的课题。

严格来讲，八·一五以后并不是「解放后」而只不过是「战后」。换句话说，民族解放的需求，并没有透过八·一五得以充足实现。而且，八·一五没有带来真正的民族解放，从这么一个认识来看，今日的我们仍然抱着「统一自主民族国家建立」这么一个民族主义课题。而且，在此课题中，构成我们民族的各阶层中，能够承担此需求的阶层或阶级在哪儿？这就成为重要问题。²⁰（粗体字强调为本书作者所加）

事实上，“八·一五解放”或“八·一五光复”这样的名称，仍然普遍流通且被使用着。但是，如同朴玄埰所指出的，这些称呼本身即产生遗忘历史的效果，因此又反覆地成为正名的对象。朴玄埰应该早就认识到此问题。因此，朴玄埰从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之后到一九八〇年代，一向认为民族解放的课题仍然有效，而正因为如此的历史认识，他才能够把殖民和新殖民，看成具有连续性的历史。

因此，今日具有转型期意义的民众的兴起，之所以成为问题的核心，是因为它是作为民族主体的民众的兴起。也就是说，如果在今日状况下存在着健全的民族资产阶级势力，那么因为他们拥有的经济基础，他们能成为最能期待的民族解放的主体性承担者，但是今日我们的状况，就不存在那样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当下存在的资产阶级几乎都是买办本身。从对此事实的认识出发，我们提出了作为民族主体的民众之重要性。因此我们在当下要思考的应该是，在一九八〇年代这么一个转型期，由民众这么一个主体力量来提出恢复民族自主性的民族主义课题。这就是反外势的统一问题。我们在思考此问题的时候，不以观念性的自我需求，

.....
20 同前引注，页二二。

而是基于工人、农民和都市贫民的实际生活的需求，提出了自主、自立和克服外势支配的克服分断等课题。²¹（粗体字强调为本书作者所加）

民众在此脉络下，成为了历史的现实主体——因为民众被赋予了历史性民族主义课题，同时民众成为历史性所造成的现实矛盾的承担者，并成为拥有现实实际生活需求的主体。

《韩国民众论的现阶段》也收录了朴玄埰《民族经济论观点的民众论》一文。²² 朴玄埰在此文中，比较系统性地提出民众论。

首先，他介绍他提出民族经济论的背景。

民族经济论的提出，是面对着韩国民族主义的历史课题之实现这么一个社会实践的需求，努力说明和回应殖民地依赖所造成的韩国资本主义过去殖民地状况，以及今日新殖民地状况。²³

我们首先发现，这一段落的内容之中心词是“民族主义”。朴玄埰一向从民族主义的观点提出理论、实践和思想问题，而民众论也是在同一个脉络下提出的主体论述。再者，他把“过去殖民地状况”和“今日新殖民地状况”，当成一组说明对象，亦即首先强调“殖民”的连续性，同时又认知到当下“新殖民”状况的差异。基于这个认识，他想要面对“社会实践上的需求”，提出整合性说明。而在这一段叙述中，“资本主义”就成为该说明所运用的理论性范畴，朴玄埰更为具体地指出，韩国的资本主义类型是“殖民地依赖”型的。

21 同前引注，页二二—二三。

22 此文小标题如下：（1）民族经济论观点与民众论；（2）作为概念的民众；（3）历史中的民众；（4）今日的民众；（5）结语。

23 参见【韩】朴玄埰的《民族经济论观点的民众论》，引自《韩国民众论的现阶段》（同前引注16），页四一。

接着，他说明了“民众”在民族经济论中的地位：

作为民族经济论的主要构成部分，民众论将民众视为民族经济论的主体，因为民众基本上是历史的主体、进步的主体以及历史中人类解放的对象。民众向来是人的原初存在模式，而后来过渡到阶级社会后，它成为在阶级关系下被异化和压迫的直接生产者。今日，我们思考具体民族问题的时候，这些道理仍然有效。在我们今日的状况下，民众是民族自主独立、统一和民主主义的主体。因此，从民族经济论的立场来看，民众是关系着社会中主要矛盾的概念，而且因为民众的自我再生产基础，只能在于民族经济，所以我们指出民众性等同于民族性。²⁴

如此，民众的内涵包含历史主体、进步主体和人类解放的对象等多元层次。但是，在阶级社会里，民众基本上是被压迫和异化的直接生产者，而在朝鲜 / 南韩具体的民族矛盾下，民众成为自主独立、统一和民主主义的主体。成为“统一”的主体，就意味着成为克服“分断”（以及“新殖民”）的主体。也就是说，借助于历史性的照明，朴玄埰提出的“民众”反映了南韩社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也就是对应于“主要矛盾”的主体概念之民众。而且，因为民族矛盾的历史性，作为直接生产者的民众所追求的目标，是恢复并重建被（新）殖民所破坏且扭曲的生活模式。在此状况下，民众更具有民族性。而且，在新殖民条件下，只有民众民族主义能代表整体民族主义。不过朴玄埰也说明，在朝鲜和南韩的历史中，民众民族主义又反覆经历过挫折：

在我们社会中，国家权力的展开，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式的，但是即使美国民主主义被引进来，日帝殖民地统治下前现代遗制和总督府残

.....

24 同前引注，页四二—四三。从这个脉络来看，“阶级”对应于基本矛盾。对朴玄埰来说，在（新）殖民地下，主要矛盾终究还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则是阐明主要矛盾的“理论”范畴或形式逻辑。

余，却仍然残存了专制型警察国家的要素。在扩充自己一派的政治势力和对付民众势力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作为意识形态性分断逻辑的反共意识形态，以一九二〇年代中期藉由民族解放民族主义运动落队的右派民族主义作为自身基础，包括买办的巨大资本、前现代商人资本、前地主势力为主的买办知识分子，以及殖民地官僚阶级。如此反共主义的状况，经由六·二五〔朝鲜战争〕得以强化，而即使出现过四·一九〔推翻李承晚政权〕那样的民族倾向，但被五·一六〔一九六一年朴正熙军事政变〕所重编，结果造成了与之相伴的高度炒作大众的功能。一九六二年以来韩国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移，更强化了如此状况，而虽然一九八〇年期间的「首尔之春」²⁵和一九八七年的“六·二九宣言”〔一九八七年执政党总统候选人卢泰愚的宣言，以总统直选为核心〕，带来了今日的民主化逻辑，但是此状况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²⁶（粗体字强调为本书作者所加）

在此，朴玄埰再次强调殖民和新殖民在南韩的延续性。以此为前提，他指出了作为“意识形态性分断逻辑的反共意识形态”，而这具有高度炒作大众的功能。这样的反共意识形态，尤其在国家功能全面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更加受到强化并且持续到一九八〇年代。我认为，这可视为“分断”的内在化。也就是说，经过内战而巩固化的分断，借助反共意识形态的全面化，贯穿了整体南韩社会成员的意识以至情绪，包括从未经历过如此历史过程的世代。而且，朴玄埰在“民主化”运动蓬勃的时期，就指出此状况的持续性。由此看来，朴玄埰似乎早已认识到了“民主化”论述在理论或制度层次的局限。

25 首尔之春是指从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朴正熙总统被暗杀之后到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南韩社会出现活跃的民主运动的时期。

26 引自【韩】朴玄埰的《民族经济论观点的民众论》（同前引注29），页五五。

但是，他同时明确地指出民众论的局限。也就是说，他的民众论虽然可以指出“民主化”的局限，但是这样的民众论也只不过是“逻辑性”的。他认为，民众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一个在历史面前带着不确定性而开放着的课题，因此也对“民众”的浪漫主义取向发出警惕：

韩国资本主义的具体性、国家权力的偏向性以及基于这两者的矛盾关系，让韩国社会的民众，在部分买办巨大垄断资本和部分政权参与者之外，成为了一个全民族构成。但是，这只不过是逻辑性的，不一定具有现实性。民众透过民众意识得以觉醒，而社会实践才能让民众成为社会实体。民众性只能等同于民族性。而且这点在今日的状况下，只能是这样的。²⁷

换句话说，作为新殖民性具体表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层次产生了广泛的民众。但是在现实中，即使有“民主化”逻辑和运动，历史地持续下来的反共意识形态仍然起着强大的作用；因此，分断被整体社会成员所内在化，导致了逻辑认识和现实实践的结合可能性，充其量只不过是可能性。以此判断来说，朴玄埰总是注意到逻辑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同时也提出了以实践作为媒介来克服两者间差距的方向与路径。不过，针对“实践”可能性的政治形式条件（尤其是“党”问题），他似乎没有提出明确的答案。

27 同前引注，页五八。

n. n. n. n.

2019 “n 地域”投稿指南

2019 年，“n 地域”将征集围绕以下话题的稿件：

“财务处的故事” 在一轮又一轮的制度改革中，各类“奇葩”的高校报销规定，持续出新，变本加厉，构成了今天学术发展的巨大障碍。“n 地域”，不仅是要将这些规定记录在案、立此存照，以待未来 IT 考古学的研究，更希望由此引发现世的讨论：对于中国而言，今天的“经济基础”——财务经费，究竟如何决定了上层建筑——不仅是思想和知识的生产，更是对学院中人的再生产？

“国际化的，更国际化的” 新世纪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莫不以“世界一流”为旨规，致力于提高自身的“国际化”程度。中国大学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与之相伴随的一个新颖现象是，近年来，各高校纷纷出台规定，凡是在中国大陆举办的会议，一律不算国际会议。这个新颖而吊诡的现象提醒我们，“国际化”在今日之中国，早就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的定解，而是“俱分进化”为一个极具时代特点的混乱词语。记录发生在你身边的各种各样的“国际化”——学术交流、留学观光、“外国人”，将有利于我们更整体性地思考，究竟什么是这二十年来正在形成的中国人的“国际化”和新的国际视野。

“青年与工作” “青年人如何工作？”“如何通过工作走出自己的路，找寻未来？”是现代社会的常设话题。只是，倘若对照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一路陪伴人们的成长小说，便会发现，这个老话题，正面临新的社会状况和青年人自身变化的最为强烈的冲击。这不光是指，在互联网、弹性工作制、（伪）共享经济、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的或可能的制度设计中，青年人正面临看似越来越多的选择/限定，也是指，青年人越来越将自己细化为“**后”，企图以公元纪年来标示或凝结自身对于工作、生活乃至未来的基本态度。当国家和社会企图用“匠人精神”来填补漏洞百出的现代工作伦理的时候，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定义和想象“工作”已经成为争夺文化霸权的焦点所在。“n 地域”企图记录文化研究的师傅和学徒们，对这一问题的感受和思考，期待由此展开更多样的线索和探讨的可能。

“学以致用” 2019 年的“n 地域”，将在访学交流积累的经验之外，试图展开另一方向，即征集在学术体制之外展开文化研究，从而“学以致用”的各色经验。如果说，文化研究不应该局限在大学课堂和学术论文的话，那么，经历了文化研究的学习，投入到社会各行各业之中的那些文化研究的“种子”，正在如何发芽、生长和结果？它们如何展开和不同行业的对话和角力？如果说，文化研究不是一味的理论和情怀，而是希望和现实短兵相接的话，那么，散播在各行各业里的这些实战经验，如何被呈现、讨论和思考，并成为文化研究在学院建制之下继续前行的宝贵经验和鲜活刺激？当学院体制里的空间日益缩小，变得越来越和其他行业一样的时候，这样的积累，既是对于之前文化研究的正视和修正，也是后续进步必须澄清的现实条件。

1 本刊为立足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和思想议题的文化研究类刊物。这一立足，不仅是指聚焦于中国的当代性，关注中国问题，解析这一快速变动社会中的文化现象，更是指，在“亚际”、“第三世界”、“全球”等这一系列既是历史又是虚构的框架的选择和比照之下，重新放置和结构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和思想议题。

2 为保持文化研究的野气和灵气，本刊对来稿有两个“不在意”。一，不在意是否一定写成论文模样，欢迎以生动、恰当的文体形式，呈现“问题意识”和清晰思考的文字。二，不在意是否一定是首发稿，提倡各个友邻刊物和网站之间的资源共享和推广。

3 在此共识之上，本刊欢迎各类来稿，来稿请注明是否首发。凡首发稿一经采用，即奉薄酬。其中，“专题”一栏为特约组稿栏目。如有专题的组稿建议和想法，欢迎来信，来信请注明“专题”字样。

4 来稿请用 word 文档发送至《热风学术（网刊）》邮箱（refengxueshu2017@163.com）。本刊会在收到稿件的一周内确认收到投稿；并于收稿后一个月内，回复作者是否用稿。

5 来稿一经录用，除在本刊刊登之外，也将在当代文化研究网及其微信公共号陆续发布。同时，本刊拥有授权友邻刊物和网站共享的权利。

封面故事：《餐前娱乐时间》

比一个人玩手机更有趣的，就是两个人一起玩手机。

这事说起来有点悖论，但实践起来却很顺畅。比如此刻，小H和小J两个人约好了出来吃饭，在等饭菜上桌的过程里，两个人先是各自交流了一番最近生活里的琐事，接着便极有默契地掏出手机，各自浏览起来。小H喜欢逛八卦论坛，流量明星有什么最新动态，她都及时关注、点赞和转发，QQ空间里几乎都是爱豆的美图。当然了，最近她的头像换成了飘扬的国旗，和其他粉圈的人一样粉上了“阿中”。小J则喜欢在知识类社区里瞎晃，什么猪肉为什么涨价啦，最近讨论的四大发明是不是创新怎么就把老师处分了，XX明星代言的带有辱华信息的商品该如何举报……社会热点几乎可以一网打尽，一来增长见识，二来这样才可能有平时交流的话题。她顺手发了一张讽刺猪肉涨价的搞笑图片给小H。小H点开了这张图，虽然她已经对着坐在对面的小J说了一句：“这也太逗了吧！”，但还是顺手就在手机的社交软件上给小J回复了一个“哈哈哈”的表情包，并同时把这张搞笑图片转发到了另一个群里，引发了新一轮表情包斗图。

小H发完图片，便抱怨起最近常常收到各种骚扰电话，她疑心是前几天注册的论坛账号泄露了自己的信息。小J附和道，现在随便注册个账号都要手机号，有的还要更详细的身份信息，人脸识别也开始普及，真是吓人。可是如果不填这些信息，又怎么注册账号呢？难道填上今日天气，雾霾指数吗？两人哈哈大笑起来。彼此安慰道，担心风险说明自己的账号有价值，在网上漂了这么多年了，积累了多少感情和数据啊，说不定以后这都是传家宝；继承权的问题，现在就可以考虑起来了——如果还有后来，后人们还能从这账号里找到价值的话。想到这里，两人都觉得有点奇怪的感伤，仿佛自己刚才转发的信息，读到的新闻，都有点没劲了。

还好此时饭菜上桌，吃饭时间一到，也就没空多想了——还得趁饭菜没动，先拍张照片呢。



主 编 _ 罗小茗

学术编委 _ 包宏伟 Fran Martin（澳） 雷启立 孟登迎 潘家恩 朴姿映（韩） 王智明 章戈浩

责任编辑 _ 龚琛洁 美术编辑 _ 刘 睿 编辑助理 _ 许诺

《热风学术（网刊）》来稿邮箱 refengxueshu2017@163.com

本刊每年3月、6月、9月、12月15日上线。

版权声明：自由转载 – 非商用 – 非衍生 – 保持署名。 

请登陆“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下载《热风学术（网刊）》。



扫描二维码，回顾往期。